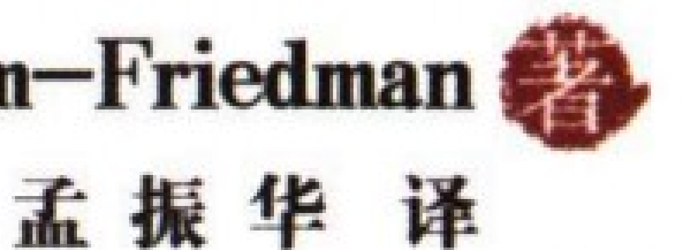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

地窖里的耳环

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

[以] Rachel Bernheim-Friedman 著



孟振华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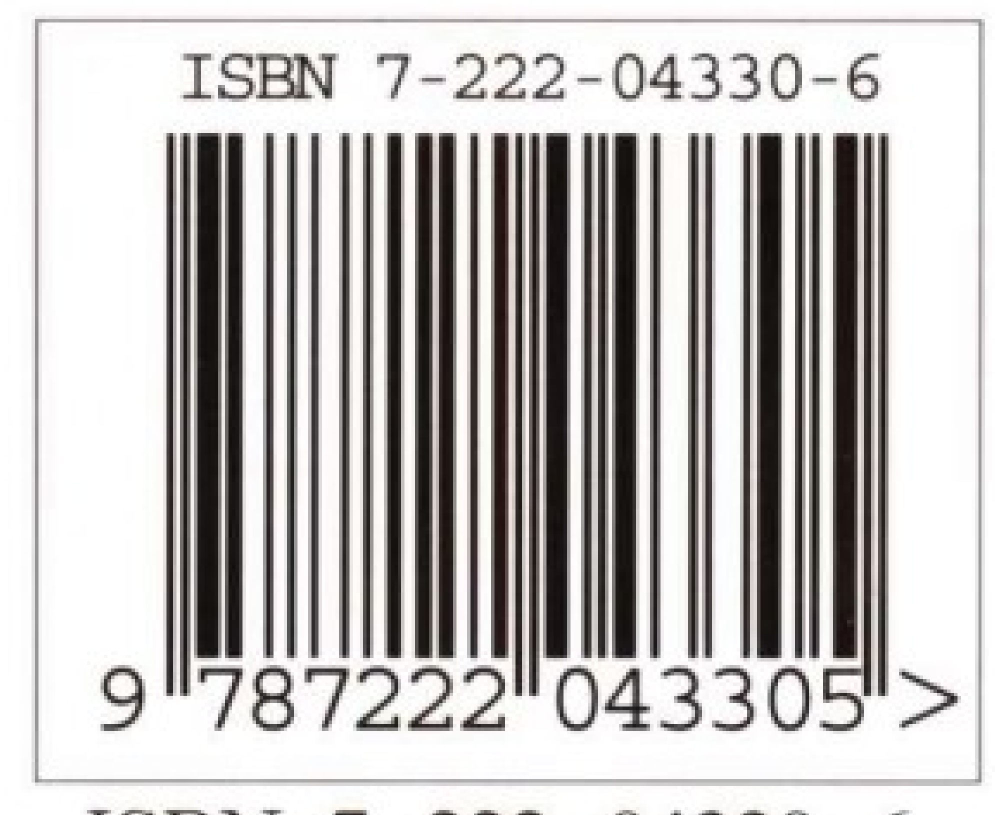
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

growing up in a world of destrution

本书荣获以色列大屠杀文学奖一等奖，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约旦亲王哈桑联合推荐。

本书是继《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之后，又一部揭示纳粹屠犹历史的力作。在全球已被译成12种文字先后出版。





ISBN 7-222-04330-6

定价：20.00 元



地窖里的耳环

——在毁灭的世界里成长

【以】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　著
孟振华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里成长/[以]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著;孟振华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

ISBN 7—222—04330—6

Ⅰ.地…　Ⅱ.①拉…②孟…　Ⅲ.自传体小说—以以列—现代　Ⅳ.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297 号

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里成长

[以]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　著

出　　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维　沈可甚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版　　次: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　1/18
字　　数:98 千字
印　　张:12 $\frac{2}{9}$ 印张
定　　价:20.00 元
书　　号:ISBN 7—222—04330—6

谨以此书纪念

我亲爱的父亲母亲
我的妹妹阿达列
我的哥哥什洛莫
和我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亲人

我们要时刻铭记
那些老人、父母和孩子
只因为自己是犹太人
他们便被夺去了生命

……我离开那里，再也没有回去，
我从不想回去，
我那并不喜爱的经历，
却偏偏成为喜爱的经历。

……就像我们的世界没有被毁灭，
就像我们再也不知道知道什么，
就像我们的老家依然存在，
白色的桌上摆好了餐具。

——莉亚·高德伯格：《我的老家》

内容提要

《地窖里的耳环》是以色列女作家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的自传体小说。女主人公拉海尔1922年出生在捷克城市穆卡切沃（今属乌克兰）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本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但挣脱了宗教的桎梏，让拉海尔和她的哥哥妹妹到世俗的犹太学校接受教育。这使得拉海尔从小就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穆卡切沃被纳粹附庸匈牙利占领，当地的犹太人也受到迫害，拉海尔的父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二战后期，江河日下的纳粹德国直接进占穆卡切沃，并把所有犹太人集中起来运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拉海尔的母亲和妹妹先后被杀害。战争即将结束时，纳粹把集中营的犹太人押往德国本土作为人质，忍受了痛苦煎熬的拉海尔也被迫参加了这场“死亡行军”。幸运的是她和两个女伴成功逃出了队伍，冒充匈牙利人躲进了一个德国村庄，直到苏联红军解放那里。痛苦的拉海尔几经周折找到了战争中幸存的家人，冲破英国的阻挠，辗转到达心目中的圣地——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在一个基布兹（集体农庄）定居。此时，第一次中东战争已经爆发，这时的日子也并不平静。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拉海尔唯一的儿子丹尼为掩护战友而牺牲。现在，拉海尔和她的丈夫泽夫在基布兹安度晚年。

《地窖里的耳环》文笔细腻，描写生动，以平实的文字把20世纪20到40年代欧洲犹太人所经历的苦难与挣扎真实地展现





出来。本书刚一出版，就得到了希伯来语文学界的一致好评，并荣获以色列大屠杀文学奖阿兰·基龙奖的一等奖。很多著名人物，如以色列前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94）西蒙·佩雷斯，美籍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86）埃利·威塞尔，约旦亲王哈桑等等，阅读此书后都写信向作者表示慰问和赞扬。该书已被翻译成英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波兰文、德文、俄文出版，法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瑞典文和丹麦文译本也即将问世。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纳粹屠犹的历史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但通过《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著名影片，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对此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二战中也同样遭受了侵略和屠杀，中国人很容易与当时犹太人的悲惨处境产生共鸣。此外，巴以冲突也是当今国际热点问题，书中对冲突的重要起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活动的记述，也为读者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中文版序言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献给那六百万只因为自己是犹太人便惨遭屠戮的冤魂。事隔五十多年，我终于能够坐下来写出自己的故事。是两个原因促使我下定决心：一是为了纪念我的父母。他们的精神品质是黑暗中的一缕曙光，给了我脱离苦海的勇气；二是我看见当今世界的民族仇恨愈演愈烈，新一轮的反犹主义似乎正在卷土重来。因此，我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被翻译成更多的文字出版，以阻止这一悲剧再次发生。

我由衷感谢孟振华先生辛勤的翻译工作，北京博爱天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和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的无私帮助，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得以面世。在此之前，本书已经有了11种文字的译本。而现在它能以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出版，我感到非常欣慰。我一直向往着东方这个伟大的国家，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她缺乏了解。但我知道，当反犹主义的浪潮席卷欧洲乃至全世界时，中国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歧视、迫害犹太人的事件。当纳粹的屠刀凶狠地向我们砍下时，本身就在与法西斯艰苦斗争的中国人民勇敢地拯救了数万名犹太难民。我和我的同胞会永远牢记中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在那样困难的时候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愿我的故事能够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共鸣。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

2004年7月



目　录

她慢慢收拾起纷乱的思绪，终于意识到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她用母亲特有的柔和的声音鼓励哥哥说："去吧，宝贝，去向你爸爸问好，他从战场上回到我们身边来了。"哥哥却没有照做，依然退缩不前。终于在母亲的帮助下，他才一步一步向父亲挪去，在他身边停下来，眼睛看着地下。

几年以后，当反犹迫害开始，大屠杀即将到来时，这位基督徒邀请一位圣经课老师的儿子阿摩斯到他那儿住，尽管他非常清楚带着一个犹太孩子将威胁到他自己的生命，两位父亲都无法想像很快将会发生什么。那个犹太孩子阿摩斯因此安全地住在一个基督徒家里，那基督徒从没有忘记老师对他的优待。整个战争期间，阿摩斯像他们家的亲戚一样住在那儿，基督徒挽救了一个犹太孩子的生命，而他成为被流放之前住在隔都[1]的犹太儿童中唯一的幸存者。

农场的生活非常俭朴简单，我们甚至都没有一面真正的镜子，只有男孩子们用来刮胡子的一小块镜子碎片。我一个



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也会对着这一小块镜子审视自己，除了我胖乎乎的脸，其他什么也看不到，而在布达佩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如此"尊容"。天哪！我想着，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哪！一切都是因为我对白面包片和猪油渣的热爱！

未来似乎不可预知。我们完全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但所有人都预感到灾难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每家都准备了一点食物和换洗衣服，准备出远门时用。一切都准备好了，而我们却茫然不知所措。家里很安静，孩子们不知为什么也都知道现在不是打架、哭闹的时候。

在恐惧和绝望中，我在礼堂里来回走动。我不认识周围的女孩子。我寻找着两个妹妹和我的朋友，但却无法辨认。所有人都被剃光了头发、一丝不挂，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只能靠脸蛋辨认。我们三个——哈娅、阿达列和我，在光头中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我们仍在为头发被剃光而痛苦不已。看到她们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阿达列那头漂亮柔软的金发没有了，那是我以前经常替她梳理的。我们安慰自己说，3个人还在一块儿，这是我们应该庆幸的。

一天夜里，我在草垛上辗转反侧，怕自己会沉沉睡去。我是很想休息一下，可那样的噩梦又吓得我不敢入眠。忽然我听到有人说话。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但他们一会儿靠近了一些，一会儿又离得远了些。好奇心驱使着我，我留神听着，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发出的声音。当



我对迷失的这6天实在没什么印象，只有些零散的记忆还比较可信，再有一些就是梦境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片断记忆。我在穆卡切沃度过了两个月，但我一点都记不得回来以后谁问候过我，我住在哪里，谁照顾我，还有我穿着什么。当我想到自己神志这样恍惚，也许有人给我穿衣服，碰触我的身体，甚至可能趁机轻薄我的时候，我就不寒而慄。

船开了，我几乎没有感觉到移动。船头无声地切开波浪，不久就在一块废弃的海滩靠岸了。海滩上空荡荡的，什么植物也没有，也没看见任何港口设施。我们来到了塞浦路斯——这就是我们被“拘留”的地方了。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已经在这里搭建了很大的木屋，跟这里的英国驻军的营房一样。

白天我在厨房工作，但那时我们并不生火做饭，只是为前线的将士和站岗的社员做三明治。一天我们正在做三明治，一发炮弹在厨房外爆炸，把墙轰塌了，炸出一个大洞。好在我们在厨房另一端，没人受伤。我们赶紧跑进壕沟。就在这时，另一发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在我身边不远爆炸，把壕沟旁的石头炸得粉碎。所幸这次也没有伤亡，但我的脸、眼睛、鼻孔和头发全被黄色的火药盖住了。

第一章

父　母

我出生于1922年6月4日。我的父亲雅各夫·弗里德曼和母亲玛蒂尔达·尼·玛齐在此之前已有两个孩子：我的大哥埃利泽和二哥什洛莫。两年后的同月同日，我的妹妹哈娅来到人世；又过了6年，我父母的幼女、我们的妹妹阿达呱呱坠地。那时，我们这个7口之家还被认为是个小家庭，因为周围的家庭都有十多个孩子。

捷克人管我出生的城市叫穆卡切沃，而匈牙利语中把它称作穆恩卡奇，它坐落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东部边境。这个国家分成几个地区：捷克（首府布拉格）、摩达维亚－西里西亚（首府布尔诺）、斯洛伐克





（首府布拉迪斯拉发），还有就是喀尔巴特鲁斯，俄国人把它叫做“喀尔巴阡的俄国”。喀尔巴特鲁斯的正式首府是奥兹霍罗德，但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说，穆卡切沃都被认为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

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种类繁多”。首先是风景。就像它的名字所提示的那样，喀尔巴特鲁斯坐落在四季常青的喀尔巴阡山的怀抱中，这里树木参天，芳草茵茵，无数条的小河（比如流经我们城市的拉特莱斯河）欢快地向南方奔流，注入蓝色的多瑙河。

这里的居民也如风景一般多种多样。不少上了年纪的人早在奥匈帝国时代就居住在此，他们操着德语和匈牙利语。此外，还有从周围邻国来的很多少数民族，他们来自北方的波兰，东方的乌克兰和俄国，或是南方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当然，还有我们的犹太同胞。

在我生活的时代，犹太人口几乎占了城市总人口的一半，居民37000人中有17000人是犹太人。这里的犹太人也是各式各样的，有些已经彻底同化，离开了犹太社区，抛弃了犹太教；也有各个派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宗教人士，他们之间同样分歧很深，矛盾重重，每个拉比①都有他自己的宗教法庭和追随者。他们中有

①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教育，系统学过《圣经》《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活犹太教教会的精神领袖或在犹太教宗教学院传授犹太教教义的人。类似于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



母亲和哥哥埃利泽。

些人非常极端，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萨特马尔”哈西德派[①]一样，其中不少人移居以色列，现在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倍区”[②]。

教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无休无止，异常激烈。一个典型的教派敌对的例子是，如果某位拉比的法庭中少于法定的10名男子[③]，他们宁愿到大街上去找一个犹太

---

①哈西德派是犹太教一个非常极端的教派，主要在美国和以色列活动。其信众反对世俗以色列国的建立，认为这只能是救世主的工作，甚至参加各种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

②“百倍区”，希伯来文“Meah She’arim”，位于耶路撒冷，是极端正统犹太教人士的聚居地。

③犹太教宗教活动至少要有十名成年犹太男子参加，否则被视为无效。





人而不是从附近其他的拉比那儿邀请。

我们中欧的气候也一样多姿多彩、四季分明，四季的分界点几乎可以精确到具体的某一天。开春积雪消融，独具风姿的野风信子最先欣悦地从皑皑的白雪中探出头，预报着春天到来的消息。随后万物生润，似乎给大地铺上了一条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色彩绚丽的鲜花点缀在深深浅浅的绿色中间，煞是好看。

夏季，园子里的黑莓树和桑椹树结满了果实，市场上满是五颜六色、口味各异的樱桃。儿时我非常高兴我的生日在6月，那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樱桃便宜得很，不但可以吃个饱，还可以挂在耳朵上，就像耳环一样；还有李子、苹果和梨。最名贵的梨被称作“凯撒伯尔内”——梨王，每咬一口，甜蜜的汁水就顺着嘴巴流下来。那种美味终身难忘。

我对祖父母没有什么印象。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过世了，我只认识祖父的两个姐妹：一位是矮小的费格拉（茨博拉[①]）姑妈，她瘦削的脸上布满皱纹；另一位是太巴拉（约娜[②]）姑妈，她眼眶深陷，但我总能看到她眼睛里闪烁的一丝微笑。小时候我们经常去看望茨博拉姑妈，这是父母的要求，但我们只是像尽义务，一点也不开心。她是犹太人称作“巴兹迪特纳茨”的那种

①希伯来语意为小鸟。

②希伯来语意为鸽子。

女人，意思是不能生育，它的另一个意思是对孩子缺乏爱心，也许这就是她处处井井有条、书生气十足的原因。我们还曾说她有洁癖。

我们家很穷，妈妈几乎从不烘蛋糕吃，惟一的例外是每年的普珥节[①]前。即使在那时，她做蛋糕也只是为了我们接受节日礼物后能有所回报。这是普珥节的流行的风俗。这一天演员们会来到我们家和其他犹太家庭表演“普珥故事”，就是模仿普珥节传统的滑稽戏。演员们将得到蛋糕作为演出的酬劳。我们的邻居、朋友或熟人也会给我们送来一盘蛋糕，妈妈拿了他们的蛋糕，换上自己烘的蛋糕或是刚收到的其他人的蛋糕回赠他们。

普珥节里我们去看望茨博拉姑妈，每当她给我们蛋糕后都站在一旁看着我们。起初我还以为她是想看看她的蛋糕是否合我们的胃口，但很快我便十分失望，因为她常常会弯下腰来，捡起我们从嘴边或是手上掉下的每一粒碎屑。由于我们对她天生的恐惧，蛋糕屑反而不停地往下掉。

相反，我很喜欢去约娜姑妈那儿做客，她对我们非常热情。她家里也不宽裕，但她心地善良，每次都很欢迎我们，还让我们吃东西时别让她丈夫发现。姑父其实

①普珥节是犹太人的传统节日，每年公历三月前后来临。普珥节是为了纪念犹太人王后以斯帖揭穿波斯奸臣阴谋，从而避免犹太人被灭族的故事，是一个欢乐的节日。





并不吝啬，但姑妈觉得让他看见自己“浪费”总归不好，因为他们的生活也很艰难。姑父的身材和他的红胡子都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很有才气，能作词作曲，再把歌唱出来，他唱歌非常动听。他在犹太社区里也小有名气，每当人们举行婚礼或是其他庆祝活动时，都请他去唱歌助兴。约娜姑妈有颗金子般的心，她总是站在边上劝说我们尝尝她做的发酵蜂蜜糕（一种专为婚礼准备的甜点）和其他食物。她对这些颇为自豪。

我的父母都来自极端正统的宗教家庭。当时没有相当于婚姻介绍所的“沙德汉”的媒人安排，女孩子出嫁前是不能见男孩子的。父亲满了18岁，也就是法定的结婚年龄后，媒人们便相继登门拜访他的父母，为他推荐合适的新娘。而父亲拒绝了他们建议的所有的美貌女子和富家千金，却打发他们去我母亲家里。因他曾看了她一眼，就牢牢记住了她。那一次，父亲在一家商店旁偶然看见玻璃窗照出母亲的模样。父亲走出几步，又回头打量她。几天后，父亲又到那家商店，再一次看见母亲在那儿。他凝视着母亲，暗暗决定非她不娶。

于是，当媒人再次登门时，父亲让他们去母亲家说亲。很快，他们按照宗教规定举行仪式结了婚。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见钟情。和常人相比，我母亲长得可算非常标致：身材苗条；迷人的脸蛋上挂着一双浅浅的酒窝，娇羞无限；一双湛蓝的眸子秋波荡漾；栗色的长发

如瀑布般泻下。父亲比母亲高半个头，总是神情严峻。他颧骨微高，一双棕色的眼睛上方长着两道浓眉。像当时所有的经学院的年轻学生那样，他戴着黑帽[①]，鬓角的头发从太阳穴卷曲下来，直至脸颊[②]。结婚前，母亲被迫剪掉了她那美丽的长发，剃光了头，然后用一块方巾小心地包住头上的假发[③]。

我童年时从没有听说他们新婚期间的任何细节，他们在一起只生活了不到一年，就被迫分开了。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1914年8月1日，战争爆发了。布告板上贴出宣布总动员的布告，父亲匆匆向母亲道了别，就离开家上了战场。3天后，8月4日，我的长兄埃利泽出生了。那时的通讯手段还很落后，母亲不知如何通知丈夫，告诉他已经成了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我们今天的战争大不一样，士兵们整队进发，然后被送往远方前线的某个地方作战。母亲没有父亲的地址，无法通知他这一消息。惟一令她感到欣慰的是，给孩子取名不是

---

①按犹太教规定，头顶直接对着上帝是大不敬，行走不能超过四步。故而男子的头上一般戴着叫做"kippa"的小圆帽，极端正统的教徒在小圆帽外还戴一顶宽檐黑帽，就是作者的父亲当时戴得那种。

②根据《圣经·利未记》19章27节的规定："头的两鬓不可剃"。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徒都遵从这一规定，男人留起鬓角，并编成辫子垂在脸颊两侧。

③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妇女结婚后要剃光头发，戴上假发，并包上头巾；也有稍世俗一点的妇女结婚后只是戴上帽子遮住头发。





问题。和大多数宗教家庭不同，他们早已商量好了一切。关于名字没有什么异议，父亲离家前他们都同意，如果生下的是男孩儿，就给他取名叫埃利泽。

父亲和大批被征召的年轻人一道上了火车向战场进发。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青年，和父亲的打扮差不多，把鬓角的头发卷得细细的放到耳后，包在军帽里。父亲对他很有好感，因为一眼就看出他善于交际，十分健谈。他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立刻成了朋友。谈着谈着，他们发现除了鬓角的头发和军帽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共同点：两个人家里都有身怀六甲的妻子，随时可能生产。

他们俩都很高兴对方和自己的命运如此相似。他们手掌相击——这是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击掌表示一种不成文的协议，但它和契约一样必须履行。他们击掌决定，如果新生儿是一男一女，日后就结为夫妇。

战争结束他们回到家乡时，很明显这一协议已经无法实现了。导致“违约”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父亲经历战争后整个儿变了一个人，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相反，他的朋友和过去一样，还是个保守而心胸狭窄的犹太人。父亲后来得知他没能在城里立足，只得回到乡下老家，在那儿生了4个女儿。女儿们全都严守戒律，也很孝顺。当她们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时，她们的父亲颇感自豪，因为

这几个女儿的针线活都是一流的。她们呆在家里，每天从早到晚纺织缝纫，坐在一大堆衣服中等着“沙德汉”为她们安排婚姻。

战后，两个老朋友的生活截然不同。当父亲的朋友前来拜访时，他们都绝口不提当年的击掌之誓。那些年，他有时进城拜访我们，我记得其中的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姑娘。父亲和他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仅此而已。

对父亲的“毁约”行为他并不责怪，他可以了解他们是多么不同。他知道，当年那两个年轻人只是乱点了鸳鸯谱。他的裁缝女儿和我那已成为优秀的高中生的哥哥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根本不相配。

父亲应征服役后，我母亲一直留在家中，多年以后才听说两个朋友曾有过这样的协议。战争在继续，父亲还在军中，她一个人在家勤恳地干着家务活儿，照顾我刚刚学走路的哥哥，挣钱养活母子俩的重担也落在她肩上。她找了份可以在家做的工作，空下来就干这份活儿，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她给工厂送来的军装缝上纽扣，再送回工厂。她一边低声哼唱着摇篮曲，用脚摇着摇篮把哥哥送入梦乡，一边敏捷地缝着钮扣。母亲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挣钱维持母子俩的生计。她默默做着这一切，无时无刻不期待着丈夫回来：如果他看到自己和儿子，他会多么高兴啊！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





期待着，但父亲还是没回来。她非常担心，因为她连父亲的一点消息都没有。

有些逃避了兵役的年轻人嘲笑那些上了战场的人是去送死，还说这对他们自己可不合适，因为他们要享受生活。每天都有求婚者到母亲那儿，带给她有关战争的各种愈来愈糟的坏消息。他们向她描述战役如何血腥，战死和受伤的士兵不计其数，惟一的目的是劝说母亲嫁给他们。他们告诉她，她是在为父亲浪费自己的大好青春，而父亲再也不会回来了。战争在继续，他们也在继续唠唠叨叨，纠缠着母亲：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工作，只要嫁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就能保证好好抚养他们母子，而她将得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这一切只是为了让她同意嫁给他们。母亲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从没有动心。她相信内心的感觉，终有一天，她丈夫会突然毫发无损地回到身边。每当她看到儿子我的哥哥埃利泽，她的眼泪就会立刻被笑容代替。哥哥总是微笑地看着母亲，他的笑靥带给母亲力量，使她更加坚信丈夫的回归。埃利泽3岁生日的时候，母亲从后面把他扶上椅子，看着“格拉赫”（理发师）给他理第一次发。母亲注视着他那漂亮的金色卷发从头上掉下地板，这标志着哥哥按照宗教规定与过去3年时光告别，就像其他宗教家庭的男孩一样[①]。

①犹太男童3岁时开始圣经的学习。为此要举行一个仪式。此时第一次给他们理发，使他们对此印象深刻。

一天，一个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来到母亲家中。他很幸运，得到了暂时休假。他给母亲带来一封信。母亲向他道了谢。送信人一走，母亲就把孩子放进摇篮盖上被子，迫不及待地拆开信阅读。她非常激动，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眼里流出幸福的泪水。她一遍又一遍的读着信，直到后来才弯腰捡起打开信封时掉在地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个士兵，穿着"鲁巴什卡"（一种紧身的高领军装）和骑兵的及膝马裤，站在一匹备鞍的战马旁，手握马缰。母亲对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孩子醒了，哭着要吃的，可她没有把目光从照片上移开。她用手抓住脑袋，痛苦地摇了摇，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徒劳地在照片上找她的丈夫。她意识到，照片中的男人不是他，肯定是有人弄错了。她悲伤地想着，这个人不是当年和她分别的那个年轻的经学院学生。

整整一天她都非常困惑。她吻着儿子，把他紧紧抱在怀里。晚上，当她安顿哥哥在摇篮中睡下，做完家务，缝完那天最后一颗纽扣以后，她上了床，思维仍然十分混乱。她从枕下取出信封，再次检视那张照片。这次，她没有理会他那奇怪的衣着，而是凝视父亲的眼睛。突然，她尖叫一声，这次她肯定这就是他，她的丈夫。她重新仔细查看颤抖的手中拿着的照片。战马像是真实的、有生命的，但站在一旁牵着马缰的人是谁？他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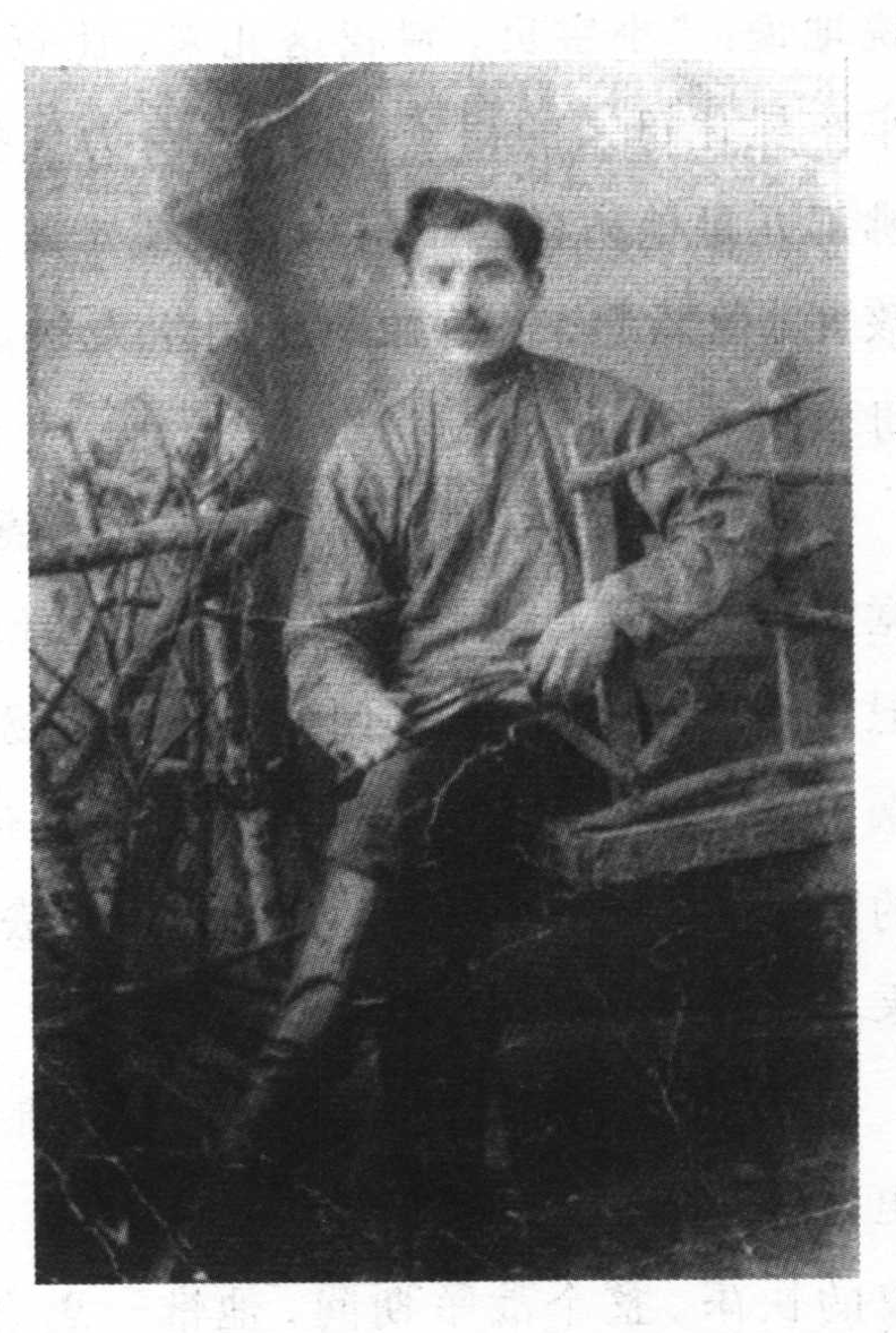
去像一个鲁莽的外邦人[①]。良久，母亲终于肯定，那就是她的丈夫。那天晚上，她整夜辗转反侧，一遍又一遍地看那张照片，凝视父亲的眼睛。她心跳加速，心中充满忧虑与渴望。

战争是那么漫长，已经进入了第4年。有极少数人回到家乡小住了几日，顺便描述了一下战场的情形。情况看来比较乐观，很多人相信，战争很快就将结束，士兵们也可以回家团聚了。

母亲在这期间一直急切地盼望父亲回来。她向一点点长大的埃利泽哥哥描述父亲的模样。哥哥从不认识父亲，由于战争，哥哥出生时父亲已经离他们远去。母亲对哥哥说，感谢上帝，他们非常幸运，因为很多人上战场后就再也回不来了，但他们的命好，父亲还活着，活得好好的。再过几个星期，甚至只要几天，他就可以回到家里，回到他们身边，他们就能像所有的家庭一样团圆。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哥哥，他的父亲是个英雄，他应该为父亲感到骄傲。母亲还为他准备着与从未谋面的父亲的初次相会，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但她却没有片刻闲暇考虑她自己，还有他们夫妻的重聚。

门开了，一个英俊的男子站在门口。他的头上长着浓密的头发，却没有戴帽子。对于正统的犹太教徒来

①指非犹太人。



1917年，父亲在俄国战俘营。

说，这是明文禁止的。在母亲看来，父亲完全是个陌生人——这根本不是她认识的那个男人。他看上去疲惫不堪，军装上溅满泥点。他把一个大木头盒子放在门口，那是他的行李箱。然后，他愉快地看着母亲的眼睛，张开双臂想拥抱她，但却看到母亲仍站在原地，这一切太令母亲诧异了，她还在打量着面前这个人。父亲盯着母亲的眼睛；但母亲毫无反应，双脚似乎钉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就像麻木了一样。

对母亲的表现父亲有些奇怪，也有些失望。他张着双臂站在门口。突然，他看见他的小儿子，立刻满怀喜





悦地说："小宝贝，到我这儿来，让爸爸亲亲你。"哥哥牢牢抓住母亲的裙子，用尽全身力气抱紧她的双腿，仿佛那儿是他防备这个陌生人的避难所。他是个害羞的男孩儿，他躲起来，就像每次陌生人来访时表现的一样。母亲抚摸着他，双脚仍站在原地，无法移动一步。

她慢慢收拾起纷乱的思绪，终于意识到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她用母亲特有的柔和的声音鼓励哥哥说："去吧，宝贝，去向你爸爸问好，他从战场上回到我们身边来了。"哥哥却没有照做，依然退缩不前。终于在母亲的帮助下，他才一步一步向父亲挪去，在他身边停下来，眼睛看着地下。

父亲小心翼翼避免吓着孩子。在远离家乡的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想像着回家的场景，憧憬着与妻儿团聚的快乐。整个战争期间，他惟一思念的就是他们。但现在家人这么对他，他毫无思想准备，他们的疏远深深伤害了他。他很难过，为了不让孩子看见他的眼泪，他弯下腰打开带回家的那个军用提箱。哥哥靠近一点站在他身边，看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包裹。父亲敏捷的手指解开一个皮包上系着的绳子，从包里拿出一只长着长长鹿角的驯鹿，一头笨拙的北极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雕刻。这都是终日生活在屋子里在妈妈身边长大的小男孩从没有见过的。在父亲沦为战俘的日子里，他就是用一把小刀亲手雕刻出了这些可爱的动物。不知道当他

雕刻它们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们将帮助他扫除自己与儿子之间的障碍。

父亲在战俘营雕刻的东西中，有一副象棋。我记得那个“车”——它能让人联想起耶路撒冷的某座装饰华丽的塔——那真是一件艺术品。那是父亲在战俘营期间惟一设法保存完整的东西，直到回家。那个“车”在我家相当荣耀，它站在餐具柜上的一块绣花桌布上，每个来访的客人都会饶有兴味地看它。

父亲在漫长的囚徒岁月里结识了不少受过教育的文化人。他仔细倾听他们的谈话，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很快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可以说，我父亲是自学成才。在他的囚禁生涯中，他完成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他从一个留着鬓角头发、除了祈祷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的宗教学者，变成一个否认上帝存在的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变得心胸开阔，关心周围的一切。战后回到家乡时，他的世界观已经完全改变，极左倾向非常明显。

我很喜欢星期六的晚上。油灯的影子投射在墙上，我们就坐在昏暗的灯光中，听爸爸讲那些精彩而又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们听说父亲回家时和母亲遇到过很多麻烦，我们听的故事全是有关这些的。父亲和母亲分开了四年半，在他们刚刚重新团聚的日子里，两个人简直陌如路人。我们还听说母亲是怎样努力习惯父亲这个“新”丈夫的。那时母亲还是个严守戒律的犹太教徒，父





亲却已属于整个大千世界了。他们深爱着对方，父亲对母亲也总是非常耐心。他对妻儿良好的态度打破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渐渐地，他开始影响母亲了。

最早的那些日子里，为了照顾和尊重母亲，父亲在安息日会独自出去躲起来抽烟[①]。母亲虽然已经接受了他的这个习惯，但为了母亲，父亲还是坚持这样做，因为“邻居们会说什么”。慢慢地，母亲不仅接受了她的“新”丈夫，而且对他很满意。

过了几个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母亲除去了每个结了婚的犹太妇女都戴着的假发，让她那漂亮的栗色头发长出来。她把头发编成粗粗的辫子盘起来，就像是戴在头顶的花环一样。

我喜欢听母亲描述父亲回来后第一夜的情景：她是怎么铺那张双人床的——多少个夜晚她都只能独自一个人睡在上面；还有，那时她的感觉如何——她已经羞红了脸，因为父亲已经紧紧抱住她，疯狂地吻她，这滋味是她以前从来没尝过的。

父亲回来后，我的父母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在周围都是正统犹太人的环境中，他成了一个陌生人，连他战

---

①安息日是犹太人一周的周末，从星期五太阳落山开始到星期六太阳落山结束。犹太教规定在安息日不得做任何工，包括不得点火。所以安息日禁止抽烟。

前的朋友们都不再理他。朋友和他保持着距离，邻居们也不再承认母亲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最令父亲母亲悲伤的，是他们的小儿子埃利泽也不得不承受这样的痛苦。每天他从“哈德尔”[①]回来时都哭哭啼啼，反复安慰他才承认，其他的孩子们总是嘲笑他，因为他的爸爸和其他人不一样，甚至连正统犹太教徒的黑帽都不戴。一天他回家时，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流血不止。父亲毫不迟疑，决定不再送他去“哈德尔”上学，而是由父亲自己在家里教育他。这条关于父亲这个不信上帝的叛教者的新闻，很快就在社区里传遍了，所有人都与他和他的家庭隔离开来[②]。母亲默默地忍受着，父亲咬紧了牙关，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这使他非常悲痛。而母亲娘家的报复很快也来了，他们所有的人突然令人惊讶地向她道别，拿着移民许可证和其他的证件去了“应许之地”[③]——美国，那是当时犹太人最向往的地方。他们就像夜里的窃贼一样，偷偷拍了照片，准备好证件，到了上船的前夜才来道别。过了些年，他们得知我父母经济拮据的窘境，为了减轻良心的谴责，有时会寄来包裹，里面有衣服、食品罐头，还有信。信中有时夹着几个美

---

①希伯来语“HEDER”，犹太儿童接受宗教教育的学校。

②犹太社区的教规非常严格，但不会判处人死刑。对某人最重的惩罚之一就是社区里所有人与之隔离，不加理睬。

③犹太人一般把巴勒斯坦地称作“应许之地”，即上帝许给他们的土地。这里作者借用该词指美国，表现当时犹太人对美国的向往。





元。

多少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建立联系后，他们也想寄包裹给我。我写信向他们表示感谢，说我生活在基布兹[1]，什么都不缺。但我姨妈听说以色列物资短缺，还是要坚持寄给我。我便把那些包裹送到基布兹（或是我们所称的“公社”）的衣物供应处。在家里，我从没听过因为和他们断绝了关系而表达出的任何悲痛。

我们很喜欢周末的夜晚。油灯的影子投射在墙上，我们坐在灯光下听爸爸描述两支骑兵部队惨烈的战斗。他讲得十分生动，我好像真能看见那些骑兵和他们名贵的战马陷进肮脏的沼泽死去的情景。一次，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战斗故事：两支部队面对面站好，准备作战。一方是俄军，一方是奥军。我父亲是一名奥军士兵。在那个年代，今天这些先进的武器还没有发明，士兵们完全是近身肉搏。他们列成队形，一队士兵对着敌军中的一队。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我父亲突然眼看着一个敌军士兵倒下，低吟着“舍玛”祷文[2]死去。父亲非常震惊，因为他知道那是个和他一样的犹太人。

这使他无法平静。我究竟做了什么？他喃喃地问自

①希伯来语“KIBBUTZ”，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后建立的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布兹的一切财产为全体成员所共有，社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作者移民到以色列后一直在一个基布兹定居。

②犹太人临死前的祷告词。

己——只是因为那个士兵穿着敌军的军装，他就亲手杀了他。父亲从没有对我们说这些，但很有可能就在那时，他第一次扪心自问。这导致他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产生了重大的转变。

父亲战斗了4年，直到他在重兵围困的法施米赛勒城堡受伤。当时他和战友们艰苦地作战，但是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弹尽粮绝，很多人不是战死就是冻死饿死。父亲受了伤，失去了知觉，当他苏醒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战俘。他的战争生活就此结束了。

还有个父亲回家后的故事，我是长大后才听说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父母两人像往常一样还躺在床上聊天，哥哥在父亲回来后第一次主动慢慢走近他们的床，躺在他们中间。父亲万分喜悦地拥抱他、亲吻他，同时也得到了儿子的回报：迟疑但却甜蜜的吻。



第二章

童年和少女时代

我对童年最早的记忆是父亲的工作台。那上面有许多型号不一的盒子，里面放着各种形状的铁钉和木钉。我喜欢把那些钉子重新整理，放到不同的盒子里。工作台不大，挂在两边的锉子、凿子和其他工具总是吸引着我的注意力。

我坐在一张长凳上，在父亲身边注视他，看他敏捷地做着活计。我特别爱看他为富家小姐做漂亮的鞋子，因为每一双都是定制的。他会调整好每只鞋子的楦头（每只都不一样），加一块皮做双比较大的鞋子，或是剪掉点皮做双小点的。他主要靠为农民制作工作靴谋生。

农民穿着这鞋走进泥泞的田地劳作，鞋子必须牢固耐用。父亲每做一双鞋，得到的报酬并不多，但这活儿也并不太费时间。

每当给那些农民做牢固的工作靴时，父亲都要用木钉。而我更喜欢看他做漂亮的女式鞋。那些鞋的鞋底都是手工缝制的。从准备工作开始，我注视着他的每个步骤。先是给线上蜡，让线更细更硬，然后父亲就开始缝了。他原先用嘴衔着几个木钉以节省时间，现在可以让嘴巴解放，放声歌唱。他很爱唱歌，声音非常好听，调子也挺高。有时候他也会一边工作一边给我讲个故事。

那动人的歌声，尤其是精彩的故事，直到今天仍然在我耳边萦绕。有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吝啬的富人的：

“在那些日子里有个规矩：每个犹太人，即使并不富裕，只要有能力，都应该在星期五晚上邀请一个单身的青年到他家里共进安息日晚餐。星期五早上，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去‘米克瓦’①——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这星期洗的惟一一次澡。在‘米克瓦’，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人人一丝不挂，就像‘按照上帝形象’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一样②。一天，两名年轻的经学院学生在‘米克瓦’遇见了，一名对另一名说起一个富人，提醒他说虽然那家伙是城里最有钱的人，但也是最小气

①希伯来语“MIKVAH”，犹太人的澡堂，做宗教性洁净仪式的场所。
②根据《圣经·创世记》，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出来的。





的。他应该对此有所了解，牢牢记住，这样当他们请他喝鱼汤吃‘哈拉’[1]时，他就应该抓住机会拼命多吃，因为主人不可能再给他这样的客人吃其他什么东西。

“在‘米克瓦’，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人知道谁是谁，因为大家都赤身裸体。正巧，他们提到的那个吝啬的富人就在他们俩身边，背对着他们洗澡，两人的对话他一字不落都听到了。他对这种有辱他名声的传言非常恼火。很快，他就冒出一个主意，他知道该怎样教训那个年轻人了。

“星期五年轻人来了。富人说着‘安息日平安’，邀请年轻人和他自己的家人一块儿入席。主人的妻子蒙住脸，点燃了蜡烛[2]。主人给年轻人倒了酒，吩咐给他上鱼汤和‘哈拉’。想起在‘米克瓦’听到的忠告，年轻人掰下一块‘哈拉’蘸了鱼汤。他吃完一个‘哈拉’，新的便上来了。一喝完鱼汤，乖巧的女仆又给他盛了一碗。年轻人不停地掰下‘哈拉’蘸着汤吃下去。他活像一头喂饱了的肥鹅，坐在椅子上动也动不了，肚子胀得像个气球，随时都可能撑爆。当他坐着休息时，有个女仆端了一锅鲜美的鸡汤从厨房里出来，后面跟着个端烤肉的仆人，香气扑鼻。年轻人垂涎欲滴。紧接着又一名

①希伯来语“HALLAH”，安息日食用的一种精面粉做的面包，呈麻花状。哈拉和鱼汤是安息日正餐常见的普通食物。

②在安息日到来之前，家庭主妇点燃安息日蜡烛。因为安息日不能点火灭火，所以这支蜡烛要燃烧一整天。



1934年，全家福。

女仆端上一盘他从没见过的布丁。他张大了鼻孔咽着口水，但再也吃不下了……"

还有个故事："有个穷困潦倒、上顿不接下顿的人总是梦想着他最向往的食物——面条和奶酪。他是那么想吃，哪怕一辈子只有一次。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面前有一碗堆得高高的面条，上面盖着亮闪闪的黄油和奶酪。他拼命吸着那香味，舔着嘴唇，看他面前那个碗变得越来越大，充满了整个房间，整个院子，直到他的眼里只有他最爱的面条。他站在这美味前，却一口也吃不了，因为他没有叉子。于是第二天睡觉之前，他特地拿了把叉子上床……"

我们听父亲讲那些丰富多彩的故事，甚至比读《平





安降临你们》[1]还要早。

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经济拮据，真正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母亲辛勤地工作着，事实上成了这个七口之家惟一的生活来源。她总是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敞开家门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朋友。她对我们的养育充满了爱心、温暖和无私。尤其当父亲生病的时候，母亲的生活更是无比艰难。父亲患有溃疡，常常引发剧痛。发作的时候他工作得少一些，但他仍然非常痛苦，他在工作台前坐着，坚持几小时，一阵疼痛便会再次袭来。他常常被迫中断工作，休息一会儿。我见过父亲忍受这样的痛苦，对他的性格十分钦佩。每当疼痛过去，他就会回到工作台前，重新打起精神，哼着歌继续干活儿，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母亲也默默地辛勤工作着。外人对我们家的事，包括经济上的窘迫都一无所知。有些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身衣服。母亲在家干完活后也得不到休息，她还要给我们洗熨衣服，这样我们去学校时就能穿得整整齐齐。衣服上这儿那儿虽常有些新补丁，但全都一尘不染。

我母亲的肚子不知怎么一天天大了起来。过了几个月，我们和所有看到她的人连同她自己都肯定她又怀孕了。又过了些日子，她自己却开始有些疑惑，每天早晨

① 用意第绪文编辑的犹太故事集。

当她起床时，她都恶心不止，就像以前怀孕时一样，只是她怀5个孩子那会儿都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直到有一天她无法起床，甚至难以移动时，她终于同意了父亲的要求，去看了医生。医生一检查就发现母亲的胃里长了一个瘤，这令父母惊恐不已。母亲默默忍受着痛苦，我们却无法掩饰对她的担心。母亲住进医院，第二天动了紧急手术，医生从她体内取出一个大瘤，足有7公斤，比任何一个婴儿都重。手术很复杂，手术后母亲卧床休息了几个星期。

母亲痊愈前，哥哥埃利泽挑起了家里的重担。这是以牺牲他的学业为代价的。他不得不经常旷课，留在家里做事。他的朋友们便把作业带回来给他做，他常苦到深夜。他就像母亲一样照顾我们，帮我们穿衣、梳头，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事，直到母亲完全康复。

一次，在安息日之前，哥哥跪在地上用一把掸子打扫地板。门开了，他的两个女同学走进来，她们看见他，便卷起袖子硬是夺走了他手中的掸子，把他推到一边，说："这可不是男人干的活儿。"

埃利泽还负责对我们的教育。我们非常敬佩他喜欢他。他高中毕业后去布拉格继续深造时，仍不时来信指导我们，推荐我们读一些书。

我们读了不少书。那时去电影院看电影——默片电影——是非常昂贵的，我年轻时看过的电影屈指可数。





我们经常从图书馆借书看。有些流行的书籍在朋友们的手中不断被传阅，它们都是经典名著。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艾米尔·左拉的《萌芽》，纳博科夫、弗伊希特万格和其他不少优秀作家的作品。他们让我享受了很多欢乐的时光，我常常读得全神贯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哥哥出去学习，我们这些孩子不明白家里缺少他意味着什么。我们所有的人还在，只有哥哥走了。我们也是这么跟母亲说的。每当这时她总是痛苦地把双手绞在一起，告诉我们她是多么想念哥哥。

哥哥列出的书单里还有捷克作家、总统的好友卡尔·卡佩克的《白色瘟疫》。我对这本书的印象非常深。哥哥有次回家时告诉我，他在布拉格的剧院看了一场根据这本书改编的戏剧。哥哥的描述是那样绘声绘色，我似乎真的看到了那个令人惊奇的犹太医生，他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够治愈绝症的药，但他只愿意医治那些无法负担医药费的穷人。恐怖的白色瘟疫很快蔓延到全城乃至全国，包括皇宫。宫里派使者去找这个医生，请他立刻进宫，把药献给国王。但医生拒绝了，他们只得两手空空地回去。第二天，使者又来求他过去，许诺说只要他能赶去救国王，多少钱都可以给他。医生让他们回去禀报国王，说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国王保证立刻免去所有老百姓的苛捐杂税。国王同意了。医生赶到皇宫

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向国王哭诉他们的病痛，求国王帮助。当人们看到那个医生的时候，突然变得怒不可遏。他们对医生向国王提出的条件一无所知，却一块儿上前打他。骚乱中医生和很多人一样被推倒了，他的公文包也掉在地上。愤怒的人们竞相上前践踏，惟一的救命药丸就这样被毁了。

那时家里没有自来水，我们用院子中央一个手摇泵（人们称作“嘭嘭”）抽水。冬日里，水滴下来就会结冰，地上非常滑。于是打水也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总是小心翼翼一步步往前走，稍不小心就向后滑倒。外面极其寒冷，地上结满冰霜时就更麻烦了，水桶的把手也被冻住，我们不得不往上面浇热水让它化冻。直到春天到来，冰雪消融，打水才不那么艰难。

我们把几个水桶放在家门口的长椅上，把它叫做“水椅”。水桶边上放着一个杯子，我们就用它舀水，饮用、做饭和打扫卫生。地上还有个铝桶用来倒脏水。由于冬天打水的条件不好，打扫卫生和做饭也就变得非常困难。

我记得那是秋天的日子，我等着狂风暴雨从树枝上摇下一大堆果子，然后和哈娅迅速扎好外套，冲进风雨中捡果子。我们在雨里跳着，为这些珍宝快乐不已。但我们良心并不坏，总是在地上留下足够的果子给房主。他们是善良的捷克人，我们很喜欢他们，对他们的女儿





瓦莱斯塔、儿子瓦洛德亚也很友好。那时即使他们看见我们捡果子，也会只当没看见，他们实在太好了。男主人是市政府的职员，每次回到家都会立刻换下工作服装，解下领带，穿上开领衬衫和短裤，拿上锄头或耙子，去花园照料那些花草。

我们和住在同一条街上的捷克孩子一道度过了很多时光。那条街名叫玫瑰街，因为家家门前的花园里都长满了五彩缤纷的玫瑰和其他花朵。我们和邻居家的捷克孩子玩捉迷藏和其他游戏。我妹妹哈娅和我会在藏身的地方用希伯来语互相提醒。他们听见我们说话，便也学着我们用那句希伯来语喊："小心！小心！"还有一个特别的表演游戏：我们站成一圈，一人被选中担任售货者，假装背上一个包裹；大家则打开音乐盒，唱"斯麻达利维，吉德……斯麻达利维，吉德"。我会和其他孩子一块儿歌唱。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我那时唱的是"肮脏的犹太人，肮脏的犹太人"。捷克人是善良的、心胸宽阔的民族，但看来对犹太人世代相传的憎恨已经深深植入他们心中，甚至反映在一个看似无辜的儿童游戏里。

厕所在院子后面，那是一间用树枝搭起的小木屋，到处是裂缝。冬天要去方便都挺麻烦，不过晚春和夏天却可以享受。我们会坐在那儿，即使并不需要，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就像天堂一样。它入口很小，也不完整，门和屋顶间有很大空隙，一些梨树枝从那里长出去，水果



1936年，三姐妹。

的汁水滴下来。我会摘些果子好好享用。门和地也有空隙，冬天风雪从这些隙缝中吹入，让我们受了不少罪。

寒冷的冬日里，我喜欢在每一处结了冰的泥潭上滑行。我稍稍有点负罪感，因为我知道这会磨坏鞋后跟，而修理他们是非常昂贵的。但我不能自制，滑行时的美妙感觉成了犯错误的补偿。我还和朋友一块儿去溜冰场，透过篱笆的缝隙观看快乐的孩子们在里面溜冰。傍晚，当灯光照在溜冰场上时，景象尤其诱人。但我还是要离开那里——我知道，我只能在泥潭上滑行。

父亲告诉我，冬天摸我们的耳朵是非常危险的，因





为如果它们冻住了，就会从身上掉下来，留在手里。一天，来了个邻居站在门口。父亲冲他吼叫，让他别碰他的耳朵。我很害怕，想像着他那冻僵的耳朵掉下来躺在手里。

我喜欢我们住的街道。它远离市中心，非常安静。路两边绿树成荫，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本植物，令邮递员很难找到门牌号码。我们家的院子对面有一个大公园，长着很多树，树丛中还有各色的丁香花，那花香令我陶醉。树丛的角落有一些长凳，有时我抄近路回家经过那里，会看到一对年轻的恋人坐在这美丽的花丛中。公园吸引了很多游人。中间的栗子树丛中，矗立着一栋大楼，政府部门就在里面办公。

这栋楼有不少年头了。它在奥匈帝国时期是供王公贵族消遣娱乐的地方，也曾做过德国皇帝的行宫。时代在变，它也随之变换着角色。匈牙利人占领我们这个地区后，他们把它变成了刑讯逼供的场所，我们叫它审讯楼。那些戴着箭十字标志的匈牙利宪兵比佩戴“卐”字标记的德国兵还凶残。他们把人带到公园深处的这栋楼里，那些人的惨叫声就再也传不出来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事，但因为害怕政府的暴力，没人敢谈论。

我父亲的溃疡发作时的剧痛，使他甚至无法吃饭了，家里的情况也就特别糟糕。无论他吃任何东西，都只会加剧疼痛。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到丧失了消化能力。

我和妹妹哈娅别无选择，只得每天轮流带着锅去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奶奶家。她是我班上同桌同学的外婆，每天都会给我们一锅鸡汤——这是我父亲惟一可以消化的东西。我感到很可怕——我还是个孩子，却像乞丐一样站在那里乞求施舍。我无法描述那种感觉。但我需要帮助父亲，这战胜了我的羞耻心，我还是坚持去老奶奶家。当我走进这位慷慨的老妇人家里时，我第一次看到富人家的厨房是什么样的：炉子上放着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锅。我站在那儿，贪婪地嗅着小锅里飘出的香气。在我们家里，根本没有这些，只有两三个大锅。母亲只能用来烧一道菜，今天是豆子，明天卷心菜，后天则是豆子烧卷心菜。

当父亲的疼痛稍微减轻，他感觉好些时，他又会变得很高兴。你无法想像他是个忍受着病痛的人。他心情很好，回到工作台前，一边工作，一边哼着曲子或唱着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直到下一次疼痛来袭。

尽管他身体不好，但家里每一分钱的花销都是由他来决定的。他优先考虑购置的东西和一般穷人家的不一样，我们因此得到了一些“奢侈品”，比如一个金属浴缸。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多数人只是每周去公共澡堂洗一次澡。所以我们很高兴家里能有一个浴缸。我们还买了一个体温表，就是医生检查病人的时候用的那种。我





们每天都买匈牙利文和意第绪文[1]的报纸。我们还有一个书架，每当购买或者从图书馆借了书，就把它们放到书架上。

父亲受过的正式教育只有在“哈德尔”里跟拉比学习的三年和四年的初级小学，尽管如此，他仍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他思想左倾，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非常关心。那时候没有电视，我们城里也只有极少数人家有收音机。父亲从报纸上收集信息，告诉我们世界上遥远的角落里发生的故事：哪里的火山爆发了，哪里的煤矿坍塌砸死矿工了，这些消息都成为我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那些日子里，有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们的状况非常糟糕。当局派人来我们家征税，但我们根本付不起。他们就威胁要没收我们的财产。可这种威胁也毫无作用，因为我们甚至连日常开销都无法支付。第一次法院的人拿走了一个带抽屉的柜子，第二次他们拿了衣橱（或者是另外一件家具），直到我们只剩下一个灶台。那是嵌在墙里的，他们拿不走。留下的惟一一件家具是我父亲的工作台。

那之后第二天，门突然开了，三个凶汉闯进来，直奔父亲矮矮的工作台。他们拿起台子，好像已经是他们

①意第绪语是希伯来语和高地德语的混合语言，希伯来语复兴前在东欧犹太人中广泛使用。

的了。父亲就站在旁边。他扔开给我们做的三腿小凳，解下围裙扔到工作台上，从衣架上抓过夹克衫用力往肩上一搭，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拿走了我的工作台，我在这儿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把我老婆孩子也带走吧，好好养他们，我走了。"父亲说着砰一声关上门离开了家。

那时将近中午，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躺在床上，盖着毯子。屋子里冷极了，床是惟一可以保暖的地方。我看见母亲忧伤的面容，她无助地把双手绞在一块儿，眼中噙满了泪水。直到看到那帮人两手空空地离开。母亲还是站在那儿，庆幸这次把他们打发了，这时她听见父亲的笑声。他高兴地走进来，告诉母亲他这次又把他们捉弄了一番。他还说他急着拿起衣服离开的原因是有个衣袋里有钱，那是他前一天做鞋挣来的。

当我们感到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时，我们从一居室的房子搬进了稍大点的套间。我和兄妹们未来的教育就在那里被决定了。

希伯来初级小学的创始人是哈伊姆·格拉瓦，在小学四年中他是我的老师。之后我在希伯来中学继续学习。它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是哈伊姆·库格勒。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喀尔巴特鲁斯穆卡切沃城的希伯来语和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中。在这里，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也是个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被选为布拉格捷克议会





中犹太政党的代表，为犹太人的权利作斗争。他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自豪，也得到了众多的赞誉。

他对我们家的第一次访问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变化。库格勒博士坐在我父亲的工作台旁，劝他把儿子我的哥哥埃利泽送到希伯来学校上学。博士计划兴建那所学校，但还没有建好。父亲很喜欢这个建议。他不仅同意了，而且很高兴，就像听说任何可能促进发展的事物时一样。犹太人中也有一些人主动而热情地欢迎库格勒博士。反对建立希伯来中学的意见来自另一个方向：宗教人士。他们听说了这个“不合教规”的学校即将建立，便说这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作为严守戒律的教徒，他们坚信神一定会维护他们的利益，也不会允许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异端”建立一所学校。当他们看到学校一砖一瓦地建起来时，非常惊讶，实在不能理解上帝为什么不把它给毁了。

学校的建立没有得到官方的法律许可，库格勒博士不得不艰难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他一度得到保证，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个保证并没有到来。尽管存在这些障碍，在他的支持下学校一直在兴建，直到完工。但筹措资金并不容易。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当局并不承认这所学校，所以不像对待其他学校一样给它财政支持。尽管如此，这所希伯来中学深深地影响了全城和周围的环

境。它建成后不久，城里的锡安青年运动[1]开始兴起。在我们校长库格勒博士的许可下，他们放学后就在学校里活动。

学生中有一些信教的男孩女孩，他们属于“米兹拉西”[2]运动。很快每个青年运动都有了它自己的俱乐部。有段时间“米兹拉西”俱乐部和我们的“青年保卫者”俱乐部就在一层楼上。每当看到他们分成两个圈——男孩一圈女孩一圈跳舞的时候，我们就会暗自窃笑。但我们跟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们家的客人中就有一位年轻英俊、富有教养的教徒。他很喜欢我们家的气氛，那跟他们家弥漫的那种气氛截然不同。他的父母都信教，他有11个兄弟姐妹，每天从早到晚吵闹不休，他从来无法给自己找到一个安静的、只有他独自一人的角落。当他来我们家时，他把鬓角的头发藏到耳后，和我妹妹走进另一间房间。两人自由自在地谈论各种话题和学习上的事，或是坐在一本书前一块儿读诗，并交换对某一个诗人或作家的看法。这些在他家都被看做是不合教规的举动。

青年运动蓬勃发展，吸引了最优秀的年轻人。活动

①犹太青年积极组织和参与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锡安山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因此得名，有时也被翻译成锡安主义。

②“米兹拉西”和下文提到的“青年保卫者”、“自由”等等都是锡安青年运动的组织。





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合适的做作业的地方，因为他们中大多数的家庭都人口众多，住处却很狭小；二是可以面对面地展开讨论，为将来的“阿里亚”[1]和在巴勒斯坦的定居作准备。

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壮大，我们学生和极端的年轻教徒之间的争吵不断增加。我们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到最后往往演化成用石头对砸的“战争”。我们会在星期六去学校活动，当我们离开大楼时，年轻的教徒就会攻击我们，追赶着向我们扔石头；我们则奋起还击，直到他们离开。

库格勒博士很关心学生的前途。他希望通过学校给学生传授丰富的文理科知识，以便他们进入大学后可以继续学习。学校名叫“希伯来改革中学”，是独一无二的。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生同老师的关系都相当融洽，无拘无束，没有任何障碍。这是惟一一所学生把老师当朋友的学校。而在其他学校，老师被看做第三者，或是某人的“荣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青年组织“青年保卫者”和“自由”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自由”组织指责我们“青年保卫者”的成员过于骄傲，自以为是精英，

---

①希伯来语 ALIYA，原意为“上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特指从世界各地向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称为“以色列地”或“应许之地”）的移民。

但我们并不应该被谴责。“青年保卫者”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学生，而加入“自由”组织的男孩却是学徒工，女孩中则多数都是裁缝。没人指导这些年轻人到哪儿去，但事情就是这样，分隔也就产生了。

“自由”运动中有一个突出的人物，那就是我的中学老师梅纳赫姆·伯根巴乌姆。后来在以色列，他把姓改为“奥伦”[①]。我喜欢他超过喜欢其他任何老师，尤其欣赏他那一口优美的希伯来语。每当他叫到我的名字，我似乎都听见了来自巴勒斯坦的声音。到达圣地后，他成为那种我们叫做“实现者”的人。为了实现心目中酝酿已久的宏伟目标，他去了约瑟山基布兹。在那里，他和自己的一个学生结了婚（早在还是个中学老师时，他就爱上她了），组成家庭。他过着积极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不幸的是，后来他在一场车祸中遇难。

我们和他有过很多美好的经历。在学校里，他是老师。到了下午他经常到我父母家访问，似乎就是我们家的一员。生活中很少能遇见他这样全心全意为别人着想的人，他想方设法满足社区里每一个人的要求。这是他作为希伯来中学的老师和青年运动辅导员的表现。

后来在一次希伯来中学的校友聚会上，放了一场关

①在欧洲，不少犹太人的姓是当局强加的，带有侮辱性的意思。移民以色列后，大批犹太人纷纷改用犹太姓名。





于他的电影。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他的足迹遍布了喀尔巴特鲁斯的城镇村庄，他不遗余力地向那些生活在外邦人之中的贫穷的犹太人传递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讯息。

战争结束后，我和很多移民一道登上“非法”移民船，抵达塞浦路斯[①]。我在那儿呆了一年多，等待着“阿里亚”。梅纳赫姆·奥伦作为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的使者也来到了塞浦路斯。他是“自由”运动的辅导员和希伯来语老师。我们分别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非常感人。在经历过诸多磨难，即将回到祖国[②]时，我把自己所有的心里话都倒出来说给他听。作为塞浦路斯的辅导员老师小组的成员，我们常常见面。当然我们是不同组织的成员。每当一天结束，学生们就寝以后，我们会在营中散步、交谈，常常直到第二天清晨。

既然说到学校，就不能不提另一位老师阿瑞亚·索拉。他在战前就移民到巴勒斯坦，在那儿的中学继续教授希伯来文学、圣经和历史。和他相处，我遇到一点“问题”：他是我哥哥埃利泽的同学和最好的朋友，经常来我们家做客，也很受欢迎。有趣的是，他和我父亲后来

---

① 1939 年，巴勒斯坦的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发布白皮书，严格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大多数犹太移民船被视为非法。英国当局禁止犹太人上岸，而是把他们安排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

②指即将成立的以色列国。



1939年，哥哥什洛莫去“青年保卫者”的训练农场之前。他后来失踪。

也成为好朋友，两个人无话不谈。于是在学校我就挺尴尬，当我举手发言时，我总是冲他微笑。

一次，阿瑞亚把女友玛格利特带到我们家介绍给我们认识，非常想听听我父亲对那姑娘的印象。她身材娇小，非常漂亮。阿瑞亚很爱她，希望得到我父亲的祝福。后来他们结了婚，有了儿女和孙子女，直到阿瑞亚病逝。玛格利特·索拉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内塔尼亚[①]，我们去那儿时都会去拜访她。她说了很多我原来家里的情况——她年纪比我大，记得很多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情。

当中学校长要求阿瑞亚去布拉格的大学进修教育学时（当时缺乏能说希伯来语的老师），他同意了。后来

---

①以色列海滨城市，离作者生活的基布兹仅10公里路程。





阿瑞亚回来当我们的文学和历史老师。

多少年过去了，他已经退休，但仍然继续着他那令人钦佩的工作。只要有人邀请，他都会义务去开办讲座，我也曾邀请他到我们的基布兹。我为这位昔日的老师和朋友感到骄傲。

回头再来说我的希伯来中学。它没能从政府得到资助，只有那些能付得起昂贵学费的学生才能去上学。我们负担不起学费，但很幸运，我们也有机会在这个好地方学习。校长了解我们的经济状况，免了我们的学费，他还推荐我们为那些孩子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做家庭教师，主要是教希伯来语——我们做得非常棒。

作为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我非常自豪地成为一年级学生的希伯来语老师。尽管报酬很微薄，但我为自己挣回家的每一个便士感到高兴。我从没有抱怨过我们经济上窘迫的境况，但有些时候我也不得不在班上“展示”家里的困难。比如说，当要求学生买昂贵的课本和其他材料时，老师会让交不起钱的学生举手，而我总是其中之一。尽管我并不是班上惟一的一个，但那种感觉真的很糟糕。

我们实在太穷了，家里惟一的经济来源是我父亲做鞋的收入。长大一点后，我们这些孩子也竭尽全力。埃利泽的帮助非常重要，当他在中学念书时他就给很多学生辅导物理和数学以挣钱贴补家用。

后来他考取布拉格的大学以后，中学的老师们希望他学习文科，这样他毕业以后就可以加入到他们中去。他于是便开始了文科的学习，但第一个学期后他改变了方向。他和另外两个学生同住，对他们的书表现出极大兴趣。他通读了那些书，第二学期便放弃了文科的课程，转到了医学系。

他是个优秀的学生，也是学习上有困难的那些学生的辅导老师。他教书所得的收入足够支付他的生活费、学费，甚至还能省下一点钱寄回家。那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供我们买柴买木炭取暖，还有交房租。他的学生的父母对他很好。一次他假期回家时，他给我们看一块漂亮的手表，当时那种表非常贵，即使在今天也被认为是件奢侈品。他学生的父母把这作为礼物送给他。

当他回家时，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要打开他那本生物书。我翻开封面，就像打开一幅巨大的地图一样，那上面有一幅男性器官图，还有箭头指向各个器官。我慢慢合上这本大书，把它翻过来打开封底，那儿也有一幅很大的图片，是女性的人体器官。有个假期哥哥从布拉格回来时，我看见父亲和哥哥像两个老朋友一样站在窗户边，看着我窃窃私语。后来我发现他们是在谈论我。我哥哥已经把他自己看做专家——“未来的医师”，他问父亲我是否已经“长大”了。

尽管我们很穷，但在家过节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我们不是宗教徒，但我们非常喜欢那些犹太习惯和传统，并且遵守它们。每个星期五晚上，母亲都会点燃蜡烛，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烛台，里面有支蜡烛。当一个新生儿诞生时，烛台就会增加一支。我母亲站在蜡烛前，双手蒙住脸做安息日的祝福①。两个“哈拉”放在白色的桌布上，上面盖着块绣花布。“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父亲拿出一瓶葡萄酒和一个杯子②。蜡烛使气氛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并不认为这烛光是神圣的，我们在烛光下写字，或者做其他爱做的事，而这在宗教家庭是严格禁止的③。我们有自己过安息日的方式，我们只是从传统中选择那些我们喜欢的东西。吃完晚饭后，我们会围坐在一块儿，在曼陀铃、吉他或是其他乐器的伴奏下唱安息日歌曲。

在树木新年④之前，母亲会买稻子豆、无花果和葡萄干。这些食物我们都很喜欢，而且带着尊敬的心情去品尝，因为它们都来自以色列的土地——至少是这样告

---

①根据犹太传统，这是为了感谢上帝让人点燃安息日蜡烛。安息日不能点火灭火，所以这支蜡烛要点燃一整天。

②酒是安息日必不可少的东西，被赋予了神圣的含义。安息日喝酒的仪式叫做“KIDDUSH”。“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出自《圣经·创世记》第二章第一节，是“KIDDUSH”中所念的祈祷文。

③犹太律法规定，安息日有39种工作不能做，包括文中提到的点火灭火，写下或擦去两个字母等等。

④犹太民历5月15日，在公历1、2月间来临。按照传统，犹太人在树木新年要吃一些巴勒斯坦地区产的水果。

诉我们的。我们还拿稻子豆玩游戏（后来当我来到以色列时，我发现这是用来喂牲口的）。

我喜欢逾越节[①]之夜。节日到来之前，我们和信教的邻居一样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尽管在家里我们可以偷偷吃发酵的面包，在外面我们还是遵守传统的。母亲把所有的面包屑清到一个木簸箕里，和所有发酵的东西一道扔进炉火中。[②]

我们遵守逾越节之夜的传统，读《哈加达》[③]的故事，晚餐前把酒杯斟满。之后埃利泽和什洛莫的朋友会来，我们唱歌、游戏直到深夜。我们没有忘记偷“阿非考曼”的游戏[④]，不过那只是象征性的，没什么礼物。

还有一个普珥节给我的印象很深。普珥节送礼物的习俗和故事我已经讲过了。在这个特殊的普珥节时，我还是个小姑娘。我看到父亲站在炉子后面哭泣，泪水从他的双眼流了出来。我害怕极了，跑去告诉母亲。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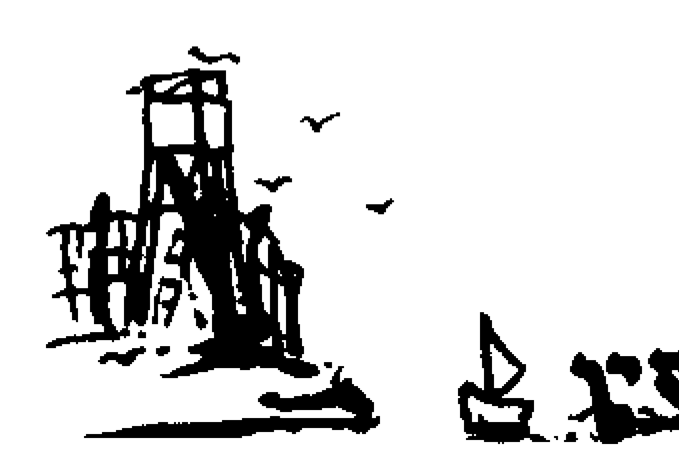
---

①犹太人最古老的节日，纪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在犹太民历 7 月 15 日（公历 3、4 月间）。

②逾越节期间，犹太人只能吃无酵食物。在此之前，不仅要准备好无酵饼，还要扫除家中一切有酵之物。主妇会清查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出面包屑，收集到木质簸箕里然后烧掉，表示家里已经清除了酵母，从房子到人都清洁了，之后再烤无酵饼。

③希伯来文原意为“故事”、“传说”。是一本有关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集，解释逾越节所吃的各种食品的含义，描述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难和出埃及的艰辛，还有节日要讲的祝贺词和要唱的赞美诗。

④“阿非考曼”是逾越节所吃无酵饼的碎片。节日之夜把一些碎片藏起来让孩子四处寻找，使他们不至寂寞。





我解释说父亲从不喝酒，他适应不了酒的味道，就算是喝一杯对他来说也太多了。

我很喜爱学校和希伯来语。有个小组标志上的标语是“犹太人——说希伯来语”，我是它的成员。我们把标志贴在学校的围墙上、走廊上和教室里，因为很多学生一离开课堂就立刻忘记他们会说希伯来语，而是说着匈牙利语、德语、捷克语或是其他在家里说的语言。而我是认真履行标语要求的极少数人中的一员，而且非常自豪地传播这一语言[①]。

我们的学校就像大流散中的一个以色列小岛，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心脏地带的一个孤岛。它是全国惟一的犹太学校，很多附近村镇的犹太人，甚至包括遥远的捷克首都布拉格和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个惟一的学校上学。因为学校的目标是先进的，它被认为是实现犹太复国梦想，为移民巴勒斯坦的先驱做准备的一个必要步骤。

我小时候也很爱看捷克人逢年过节时身着五彩服装的游行。他们行进时穿着漂亮的蓝、白、红三色服装，那是他们国旗的颜色。我喜欢捷克人的每一件东西，尤

---

①在两千年的流散生活中，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使用希伯来语，它成为一门近乎死亡的语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以埃利泽·本-耶胡达为首的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推动下，希伯来语得到复兴，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语言。而当时在欧洲，绝大多数犹太人仍然使用居住国的语言或者意第绪语。

其是他们的国歌。歌词的第一句是:“卡达多磨布莫伊”(我家在何处),这也是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

其中我尤其喜欢的是童子军的表演。那些自豪的捷克少男少女们向人们展示着他们的自信和对祖国的热爱。我们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友好。

而当我们从游行中回来时,也要列队穿过整个市中心,走很长一段路。我们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感到骄傲,总是昂着头高声唱着希伯来语歌曲。捷克的童子军会在学校边的集合地点等我们。当我们从郊游或是奥迈尔第33天[①]的庆祝活动回来时,他们总在那里长时间地鼓掌欢迎我们。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乐队也为我们演奏希伯来语歌曲。直到大家围起了很多圈子跳霍拉舞时,我们的聚会才宣告结束。

我很欣赏捷克民族和他们的文化,那是与周围国家的文化截然不同的。我们也愿意居住在一个民主国家,而那时我们的邻国还在忍受独裁政权的统治。

我还喜欢捷克的国旗和民族服装。后来我加入了“青年保卫者”组织,从那时开始我也有自己的国歌国旗[②]了,还有我昼思夜想的祖国。

---

① “Lag Ba' Omer”,犹太民历8月18日(相当于公历5月),是逾越节后第三十三天。13世纪以来,被看作是犹太青年的节日。犹太学校在这时放假一天,学生们走出教室去野外郊游,或是组织各种军事对抗游戏。

②指的是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旗的大卫星旗和国歌《希望之歌》。





学校里每个教室的入口处都有一个“蓝盒子”，那是一个画着巴勒斯坦地图的金属盒子。学生们会按照自己的能力往里面捐钱，我们为此甚至放弃在课间买糖果吃。月末这些盒子会被隆重地打开。捐钱最多的班级将赢得奖品——胜出的班级可以组织下一次安息日活动，那时这被当做一个极大的荣耀。

在四年级或五年级时我爱上了一个男同学。我坐在最后一排，他的正后方。他名叫泽夫·摩根斯特恩，后来改姓夏哈尔。我是那么喜欢他，以至跟他在一块儿时都感到羞涩，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给他留个好印象。所以，每次我不得不举手说明我没钱买什么东西时，我的手总是举得还没有肩膀高，一面怯生生地看老师有没有把我计算在内。

很长时间，我们每年都开中学的校友会，但这种聚会越来越少。在一次重聚中，我坐在泽夫·夏哈尔边上，向他透露我当年的爱情，他非常惊讶，也很抱歉当时一点不知道。

我在学校读书的日子是幸福快乐的时光。每个方面的梦想都成为老师和学生的动力。我们创作了大大小小的歌剧。我们有位名叫瓦克塔勒的老师认为，像我们这样优秀的学校应该创作希伯来语歌剧。他是那种认真对待计划的人，果真作了词曲，表达的是对祖国故土的深切感情和我们的行动。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我们对咏叹

调更为熟悉，但我们的歌剧中，歌词惟一的功能是表达我们的梦想和希望。比如有一段是这样的："我们先造房，只有帐篷，那些帐篷——然后去工作……葡萄成熟了，我们把它摘，把它摘——丰收多美妙"，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基本上是在低年级时进行的。到了高年级，课业负担日益加重，但先锋精神依然存在。

我们的学校只收犹太孩子，但有一个例外。马吉特和约瑟·施特劳斯，住在我们城市的一对基督徒夫妻，对我们学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里独一无二的社交空气深深地吸引着他。他请求校长收下他的儿子，校长真的同意了，这是我们中间惟一一个非犹太孩子。

几年以后，当反犹迫害开始，大屠杀即将到来时，这位基督徒邀请一位圣经课老师的儿子阿摩斯到他那儿住，尽管他非常清楚带着一个犹太孩子将威胁到他自己的生命，两位父亲都无法想像很快将会发生什么。那个犹太孩子阿摩斯因此安全地住在一个基督徒家里，那基督徒从没有忘记老师对他的优待。整个战争期间，阿摩斯像他们家的亲戚一样住在那儿，基督徒挽救了一个犹太孩子的生命，而他成为被流放之前住在隔都[1]的犹太儿童中惟一的幸存者。

战争结束后，我是第一批返回穆卡切沃的人之一，

[1] 当时欧洲犹太人在城市中被限制居住的特定区域。第四章中还有详细注解。





这些人中没有老人和孩子，阿摩斯是惟一幸存的犹太孩子。他的父母被分别送到不同的死亡集中营，但他们都非常幸运地活了下来。回到穆卡切沃后，他们直接奔向那个基督徒家里，和他们的独生子团聚。看见阿摩斯时，他们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①]“义人林”[②]左边第一棵树上，挂着一块牌子，刻着“纪念马吉特和约瑟·施特劳斯”。

关于波兰反犹浪潮的传闻不断传进我们的耳朵，但那似乎非常遥远，我们宁愿忽略它。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也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直到一个年轻的犹太人的到来。他在被送上一列目的地不明的火车之前成功穿越边境，逃了过来。他坐在我们中间，用意第绪语向我们描述他在波兰农村的家庭和平静的生活。他那双充满憧憬的蓝眼睛回忆着已经失去了的美好的东西。他给我们唱了首歌，后来想想似乎是个警告，但当时大家都没有在意。他深沉地唱道：“阿尔贝特，阿尔贝特，迪埃散根，翁迪埃库希斯，哈特曼克兰根”，意思是“工作工作，小

---

①希伯来文“YAD VASHEM”，位于耶路撒冷赫茨尔山附近，是为了纪念二战时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的犹太人而建立的博物馆。

②以色列对纳粹大屠杀中拯救犹太人性命的非犹太人授予“义人”称号。为纪念他们，在大屠杀纪念馆中种植了一片树林，称为“义人林”。二战时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魔掌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2000年被授予了“义人”称号。

麦收获，丰收声音，镰刀传播”。今天那声音已经绝迹，犹太人再也不在那儿种地了。

他唱完歌，坐了很久，默默地看着我们。面对我们的漠然，他走之前决定再警告我们一下，他说：“这次听我的，我不是吓唬你们，但你们必须离开。忘掉一切现在忙着的东西，立刻离开吧！也许你们还来得及逃命……”



第三章

在匈牙利的统治下

那个年轻人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战乱从西部开始了。在苏台德区成为第三帝国的附属的那一天，法西斯匈牙利也得到了一个“礼物”：德国人把我们整个曾被称为“喀尔巴阡的俄国”的地区赠给了对他们卑躬屈膝、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匈牙利[1]。

我们已经习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相对舒适的生

①1939年10月1日，根据英、法、德、意四国的慕尼黑协定，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的苏台德区。11月2日（而不是作者所说的“同一天”），根据第一号维也纳仲裁书，斯洛伐克南部的地带（喀尔巴特鲁斯）被割让给匈牙利。

活，此时忽然发现自己生活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而且是一种我们从前闻所未闻的独裁者的统治。跟捷克人相反，匈牙利人从不知道什么是民主。而我们，犹太人，从匈牙利占领我们的家乡穆卡切沃的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这样的变化，并承受着它带来的痛苦。

新政府发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条是要拆掉那块有“希伯来改革中学”字样的牌子，换之以“匈牙利犹太中学”。如果仅仅只是牌子名称的改变，我们也许还能够视而不见，但是一切都变了。绝大多数的老师都是新面孔，我们最好的一些老师已经设法越过边境逃生去了。

学校如今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从占领的第二天起我走到哪里都听到匈牙利语：在校园的走廊上、操场上和大街上。气氛改变得极其彻底，可我实在不能接受我至爱的学校里的那些新法令。我怎么能够一下子改变我的性格呢？我全心全意地热爱希伯来语，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新的教学语言——匈牙利语。

我和我的姐妹们，还有很多跟我们一样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为最高价值的人离开了学校。我还要再上两年学才能拿到毕业证书，但是我放弃了，而那些把毕业证看成他们的理想的人则留下了。

在德国人的扶植下，匈牙利人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几天后他们就来到了我家的门口。我哥哥什洛莫收到了





一份动员令。但是跟其他非犹太男孩不同，他没有得到军装。在匈牙利人看来，犹太人是不配在他们可鄙的身躯上穿上伟大的法西斯独裁者赫斯的制服的。他们征集犹太青年做苦力——伐木工或是抽水工。犹太人只是匈牙利军队的后勤人员，事实上是他们的仆人。

有一天，匈牙利宪兵以征兵令为由，带走了什洛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们等待他的消息，为他的命运担心。但他从没有请假回家，也没有写信回来。没人见过他，也没人能告诉我们他到底去了哪儿，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

新政府让我们忧心忡忡。温和一点地说，我们不喜欢匈牙利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跟捷克人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不是每天我们都感觉到生活并非是前进发展，而是倒退的，退为一种过时的更适合上个世纪的政权制度。在侵略者占领我们的国家之前，我们在城里和周围郊区散步总觉得很自在——我们喜欢闲暇时在城里的街道上散步，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转眼间，我们发现生活的世界整个变了样子，不得不学习新的风俗，尤其是一些新的规矩。

因为私人汽车很少，我们通常都步行，也常骑自行车。一天，我跟几个朋友去散步，有座桥前两天我们还可以随意通过，但这次我们走近时发现桥上站着一个士兵岗哨，一个荷枪实弹的匈牙利士兵！我们不明白发生

了什么，他守着什么或是防着什么人。从我孩提时代起这座桥就是自由通行的，河对岸有片林子长满绿树，穿过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可以通到山上，山顶有一个修道院。我们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看了一眼守卫，我们一言不发，脑子忽然就转过弯来了。第二天我们换了一条路出城，一直走到砖厂。那里我们也看到远处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我们去山上的古堡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甚至在从石板路走到通往古堡的泥路时也看到士兵荷枪实弹站在那里。我们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也不明白城里为何要布置那么多岗哨。

我和一些十几岁的朋友决定实施一个计谋：我们想去刺激他们，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他们的一些弱点。我们仗着自己长得不像犹太人，把头昂得高高的，很自信地走向那些士兵，在他们面前停下来。一个朋友对一个士兵用捷克语说了一些话，这个士兵摇摇头说，"纳姆，阿特姆"（匈牙利语，意为"不明白"——原注）。另外一个也问他，这次用的是俄语，问如何去某街道，他的回答同样还是"不明白"。然后我们用英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我们会说的一切语言来问他，所有的问题都得到同样的回答。我们冲他友好地微笑。但也许这样的笑容惹恼他了，他失去了耐心，气得脸色发青，咬牙切齿地啐了我们一口，说："你们又算是什么东西？连







1936年，父亲和哥哥埃利泽在布拉格。

匈牙利语都不会说。”然后开始喋喋不休地诅咒我们。

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城里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恶化，而犹太人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几个大商人通过欺骗当局得以继续他们的日常经营，他们的公司打着“匈牙利所有”的幌子，还有些人把自己的店名换成一个非犹太名字来保证生意不受影响。而像我们这样仅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的犹太人，自然首先感到了占领带来的压力。

我生平第一次出去工作，挣钱养家。有人给我介绍一份看护孩子的工作，那是富有的犹太人家的两个男孩，一个4岁，一个6岁。他们还没有受到新政府法令的影响。对我来说，他们让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有钱人的生活。他们在主干道上有一幢两层小楼，底楼有一间店铺，陈列窗里放着大量精美的瓷器和玻璃制品——都是些昂贵的东西，大部分是进口的。这间店铺旁边的店面都高价租给别人了，二楼是他们自己宽敞的居室。

我的工作是在他们父母外出的时候照顾他们，陪他们玩耍。我到他们家以后就对被他们叫做“佣人”的帮工和厨师介绍了自己。我跟那两个孩子一起玩，给他们唱歌。吃午饭的时候我们移到大厅的一角，厨师给我们上菜。那是我第一次这样吃饭。厨师上完菜以后，就跟帮工一起坐在厨房里，他们在那儿吃饭。这样的社会等级差别令我吃惊，出于天真，我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吃，而他们对我的邀请却更为震惊——他们认为理所当然不能跟雇主的孩子坐在一张桌子边……还有一次我到“主人”的卧室去取东西，那是一间漂亮的房间，有用昂贵的陶土砌的壁炉，跟屋顶一样高，添炭的炉门上竟刻着夜里做爱的图案。

我很反感他们对家里帮工区别对待的态度，而且一想到那些帮工的羞耻感，对他们家就更觉得厌恶。有了我们单独用餐和在卧室里的经历之后，我便急切地巴望





这个月赶快结束。月底一拿到工钱，我就离开了。

不久，我们喀尔巴特鲁斯地区又换了主人，我们成了乌克兰人[①]。一天，忽然听到外面很嘈杂，枪声大作。我们把桌子移到窗户下，设置了一道屏障，又把床架和其他一些家具推到桌子上面。然而枪声很快就停了。

政府变了，政策也变了，直到匈牙利人重新回来掌权。在新政府的统治之下，所有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都被禁止了，因此这些活动被迫转到了地下。监督人们是否违法的眼线到处都是，两三个人在一起就被认为是非法集会，会被遣散。我们这些"青年保卫者"的老成员就秘密地会面。由于任何形式的集会都是非法的，被警察抓住以后就会被拘留，我们组织的成员就只能在家里见面，他们常常在我们家聚集。

我们很紧张。每天都有新情况产生，而且一切都不可预见。只有一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继续奋斗下去，找到出路，然后向前进。这时我们决定改变方向，从地上转为地下。老成员的口号是创造新人——流自己的汗水、辛勤工作的人。这也是我们在当局如此严密的监视下能够继续活动的原因。组织在农场的掩护之下办了一些培训的基地，这样我们可以坚持当初的基本

---

① 1939 年 3 月 14 日，沃洛申神甫宣布喀尔巴特鲁斯独立，成立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共和国。匈牙利军队向沃洛申神甫的军队胡乱打了一阵枪，于 3 月 17 日宣布吞并喀尔巴特鲁斯。

目标，为“阿里亚”作准备。

跟朋友们一样，我和妹妹哈娅离开家来到了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犹太人是没有组织的，很多人已经被同化，只有极少数人能说希伯来语。即使是那些每天都祈祷的也只知道鹦鹉学舌般念几句祈祷文或者读一读用拉丁字母转写的版本。他们听到我和哈娅说希伯来语非常吃惊——这对我们来说很正常，而对他们却很新奇。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流利的希伯来语对话，在他们的要求之下，我们做了一场“表演”——我们就站在那里用希伯来语说话。对我们来说也许有点好笑，但这却深深震撼了他们。

我跟哈娅告别，启程去布达佩斯南部一个小镇附近的训练农场。我们的人在这个大型的农场和附近别的农场干活。我被分派去做饭，所以就呆在屋子里。我在家里帮母亲做过饭，所以在这里做这个工作并不生疏。我接受了这个挑战，尽全力用我们极少的食物做出美味的饭菜来。

对于培训农场我有两段回忆，一段是痛苦的，一段挺有意思。

痛苦的是我没有结果的初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非常地纯洁。以往我的身边总有很多朋友，在农场我结识了一个好朋友，跟他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但是这次，跟我以前的男生朋友们不同，我们喜欢在一些被





树丛掩盖的僻静的角落里、河岸，或者拿着本书在公园里的长凳上单独相处，我们会拥抱和接吻，但是仅此而已。

我喜欢平卡斯，他们亲昵地喊他“平卡莱”。农场的状况和我们的新生活让我们可以有很多单独相处的时间。我们会并排躺在星光闪烁的夜空下，盖条毯子，紧紧拥抱在一起，相互爱抚和接吻。我沉浸在爱情里，感觉很幸福。但我渐渐发现男朋友对于我们的关系很不满足，他要求我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但我那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因为把他更多地当成是好朋友而不是终生伴侣。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的爱情会结束，我们像朋友一样分手了，大约在我离开农场6个月后，我得知他被一场车祸夺去了生命。这就是我的初恋。

其他人都会觉得我的第二段回忆很有意思，但是对我而言却悲大于喜。那时，全国犹太复国主义年会在布达佩斯召开，我和另外两个人被选为农场的代表。我们到布达佩斯以后，看到一座古老的建筑。那是匈牙利首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布达佩斯跟维也纳很像，但奥匈帝国的昔日风光已经没有什么痕迹了。我们走上二楼，铺着厚厚地毯的楼梯踩上去毫无声息。每层楼的楼梯口都放着一面巨大的镜子。

上楼的时候我看见镜子里有个女青年，两个男青年

挽着她，那女孩子看起来有点眼熟。我们继续上楼，在另外一层，我又看到同样的情景：两个穿着会议规定的白衬衫和深色裤子的年轻男子，还有一个穿着白衬衫和很新潮的打褶裙子的女青年。我在镜子里看到裙子的皱褶在臀部被撑开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这条裙子不那么合身。又爬上一层，我再次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简直无法相信我的眼睛。再上一层，毫无疑问，镜中的女孩不是别人正是我。我完全惊呆了！我记得整个过程中，重要人物讲话的时候，合唱团表演的时候，我举起手来做“青年保卫者”式问好的时候，我想的只有一个问题：我怎么会变得这么胖？



穆恩卡奇的希伯来学校





从小我就不苗条，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丰满。可怎么会变得这么胖呢？我暗自思索，立即想到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在农场我负责做饭，每个人都咂着舌头对我的厨艺表示满意，但我从来没给他们看过我自己那份。我有时候会尝一尝自己做的菜，但是不会多尝一点的。我的日常饮食就是松脆的猪油渣夹在新鲜的白面包片中间[①]。这是用猪皮煎出来的美味，以前我从来没有尝过。这就是我的早餐、中餐、晚餐。

农场的生活非常俭朴简单，我们甚至都没有一面真正的镜子，只有男孩子们用来刮胡子的一小块镜子碎片。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也会对着这一小块镜子审视自己，除了我胖乎乎的脸，其他什么也看不到，而在布达佩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如此“尊容”。天哪！我想着，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哪！一切都是因为我对白面包片和猪油渣的热爱！

由于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我回到家中，继续找工作，因为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挣钱。一段时间以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份看起来简直是为我度身定做的工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优点，是我可以在家里做，这样就可以尽到长女的照顾父亲的义务。不仅如此，我把它看做

①根据犹太教规，猪肉属于“不洁之物”，禁止食用。但作者当时已经不再遵守这些教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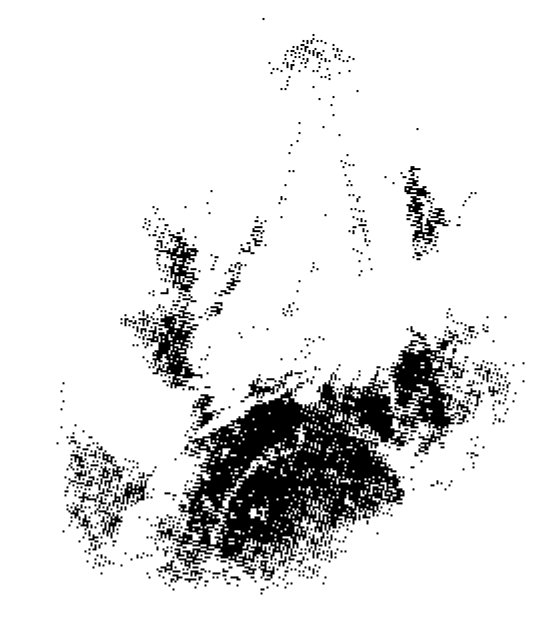
一项创造性的工作，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

那个冬天，从挪威和瑞典来的针织潮流席卷我们这个地区，那是一种名叫"瑞典针织"的很具装饰性的手工。一天，我路过一家羊毛店的橱窗，一件织得很精致的衣服吸引了我的目光。它新颖而别致，陈列出来是为了吸引过路人进去看看，这样他们就可以卖出更多的羊毛衫。这家店雇用了很多织工。我走进去，对他们说我可以织一件衣服来卖。我把售货的小姐拉到外面去，指给她看那件别致的毛衣，保证说我也能织一件类似的。她给了我羊毛，我于是抽空就织毛衣。几天后，我把我的第一件作品拿给他们，他们显然很惊讶也很高兴，当场给了我更多的羊毛，并且承诺可以长期雇佣我。

晚上，我做完了家务活就坐到桌前，点一盏油灯，开始在一张方纸上设计图案，有些是生活中的实物，有些是我想像出来的形象。画好后开始数毛衣的针数。就这样黑色的安哥拉羊毛在我手中变成了一件毛衣，上面的图案是一只鸽子嘴里衔着一个贴着邮票的信封，还有一件毛衣的图案是一只长着长长犄角的驯鹿。我编织的每一件毛衣都是不可复制的原创品。

我的编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订单纷至沓来，令我应接不暇。商店的老板把编织衣服背面和袖子这种简单一点的活儿交给了其他工人，这样我就可以专门设计图案以满足订单需要了。根据那个时代的标准，我的报酬





是很高的，因为人们肯为一件新颖的羊毛衫出大价钱。但是只有一小部分钱归我，大部分都归了老板。

后来，有位老师介绍给我一份很好的工作，而那时父亲的身体也好多了。于是我接受了这份工作，离开了家。虽然这份工作非常合适，我还是犹豫了一段时间是否要跟家里人分开。最后，我前往南方一座城市，到了一户很受尊重的匈牙利犹太家庭。他们已经被同化了，只是因为换了新的政府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信仰和身份，开始明白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在忧虑中觉醒的犹太人开始关心自己的命运，尤其关心他们的孩子。他们觉得绞索已经挂在脖子上，前程一片惨淡，所以他们想为到时候离开这个国家作准备。他们找希伯来语老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人介绍了我，他们便邀请我到他们家同住，教他们全家希伯来语，还有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10岁。他们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我只能说希伯来语。课后，当我给孩子们讲巴勒斯坦的故事时，家长们也一块儿听。他们对那里的事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之前他们对这个地区知之甚少，甚至闻所未闻。现在回忆起来，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那对夫妇都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为人谦和，令人钦佩。他们把我带到家里，让我觉得这里很需要我。一天，他们为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每天我就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去骑车了。家里有人来访

时他们总是让我一起见面，他们带孩子出游时也带着我。

我喜欢跟孩子们一起出去骑车，他们的数学家庭教师也一起参加，他很注意我们的行动。他每天都到家里来教孩子们数学，家长对孩子的进步很满意。这是我和这个数学老师间美好的友谊的开始。孩子们在我们前面起劲地蹬着车，我们就在后面看着他们。时间长了，我和他四目相接，开始交谈，一直聊到晚上——当然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在他之前也有些人追求过我，他却跟他们都不一样。我希望他的态度跟我一样，不要那么认真。他从一开始就取得了我的信任，我们的关系很真诚美好，亲密但是守礼——那时候的关系都是这样的。我很喜欢他，也感觉得到他对我的感情，我们的友谊更加稳固了。晚上，我们久久地拥抱接吻，舍不得分开。我们开始谈论未来。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我们的关系忽然就结束了。

我接到家里的信说父亲病重，母亲要求我快回去，因为父亲的病情不断恶化。前面我没有提到爸爸跟埃利泽去过布拉格，埃利泽希望找位外科医生替父亲检查一下，或许可以治愈。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治疗父亲的胃溃疡的办法。我成天在他床边照顾他，就是在这段时间父亲教会我下象棋。他体力不行不能打仗了，因此下棋赢了他就很骄傲。





因为父亲的病，家里的困难状况没有好转。一天，父母商量，决定让母亲到捷克斯洛伐克卡尔斯巴德一家有名的温泉宾馆做清洁工，那里报酬很高。母亲接受了这份工作，离开了关心她的家人，启程去了卡尔斯巴德。温泉宾馆从封建王公时代起就非常有名，那时有钱人经常夫妇同行去我们今天认为"有点偏远"的地方度假。

母亲长着一双蓝眼睛，脸上常挂着微笑。她很漂亮，工作也很努力，宾馆的经理和同事都很喜欢她。有钱的客人们也喜欢她，用欣赏的眼光打量她，称赞她。她喜欢被人称赞。但也有些客人让她很反感，他们会藏在房间里或者门背后等她，然后抱住她强吻。这种人大多数很胖，喝得醉醺醺的，这让她更加深恶痛绝。可母亲不敢拒绝他们，因为他们一句抱怨就可能让她失去工作。

她默默地忍了几个月，常在夜里哭泣，最后终于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给父亲写了信，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详细地描述了她的痛苦。父亲看信后大发雷霆，母亲的情况让他很担心。他非常爱她，觉得必须帮助她，必须去干涉，可他不知道如何去做。父亲只是告诉他一个做印刷工的好朋友关于母亲来信的事情。

那时候印刷还是用老式的排字方法。有家日报的排字工是父亲的老朋友了，他答应用一个计谋来帮助父

亲。在为一份报纸排版的时候，他加了一些话："某某病重，已卧床不起。其妻见报请速归。"

母亲比任何人都了解父亲。她看到报纸后就开心地笑了。她把报纸拿给了宾馆的经理，然后脸上带着很悲伤的表情把那条消息指给他看。经理很同情她，把她叫到办公室，按她的工作时间付了薪水，尽管她这样离开违反了合同。他甚至还给了母亲点奖金，因为母亲工作尽心尽责。而母亲也为能再次回家团聚感到幸福。

父亲组织了镇里所有的象棋高手开展象棋马拉松的比赛。星期六，镇上一些真正的象棋高手到我们家，父亲逐个地跟他们下，结果局局胜出。他下棋的时候坐在那里，因为沉思而眉头蹙了起来，不吃也不喝，完全沉浸在象棋世界里。晚上所有的挑战者都离开后，父亲感到很疲倦就躺下了。母亲走到他身边，发现他正发着高烧，昏迷不醒，还想像着在棋盘上挪动棋子。我们关切地站到他身边，母亲不停地用湿毛巾敷在他的额头上，但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最后我们决定请医生。医生来检查了一下，让我们大家放心，说父亲只是下象棋下得入迷了，休息一个晚上就会康复如初。

胃溃疡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前面我已经说过埃利泽在布拉格读书时父亲到那里去做过检查，结果那儿的医生说这个病是无法治疗的。我们的家庭医生建议送他去医院。入院后医生认为父亲必须进行手术，





但当时我们城里的医院没有能做这种手术的医生，他们建议父亲去附近贝尔霍沃的医院。那里被匈牙利人叫做贝尔佳茨，那儿有个医生可以做这样的手术。

手术一直延迟，我们陪着父母在那个医院等了好几天，直到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父亲终于被推上手术台。手术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一直在外面等，从手术室回来以后也一直在他身边守着。父亲的眼睛睁了一下，又合上了，我们焦急地等着他从昏迷中苏醒。

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躺在那里，苍白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他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只能把耳朵贴过去听。他说手术后的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令他生活悲惨的病痛终于过去了。他说得很慢，喘息声很重，也许他心里想着很多以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现在他会恢复健康，只要一出院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完成那些事情。

母亲和我轮流在他身边看护。她累了就去休息，由我来替，她回来了我就在边上的长凳上打个盹儿。手术后的第三天，我去问医生父亲的情况如何，他鼓舞人心的回答让我很高兴。他说，第三天是手术后最关键的一天，如果父亲能够平安度过，手术就成功了。母亲听我转述了这个消息后就安心去休息，我等医生们进行例行检查以后继续陪在父亲身边。父亲又睁开眼睛，但只是一下就又合上了。他的呼吸显得特别沉重，甚至盖在身上的毯子也会随着呼吸上下颤动。他把手微微地抬了一

下，让我去打开窗户。我不懂他的意思，房间里的暖气不足，而且很冷。但我还是站在椅子上把小窗打开了，一阵冷风吹进来。父亲仍然抱怨说房间里空气不足，他喘不过气来。我急忙去找护士，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去病房看了以后又喊来另外一个医生和护士。我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我知道父亲的情形不好了。他们在父亲床边的抢救让我心惊肉跳。护士让我到外面去等。我心头一沉，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的希望似乎都要破灭了。我非常担心父亲，颤抖着在外面等着消息。

门开了，医生走了出来，他扶住我的肩，要我赶快去见父亲，说现在还赶得及跟他告别。父亲的喉咙里发出很可怕的喘息，眼睛紧紧闭着。我一边抽泣一边不停地发抖，不知所措。我害怕极了，就那样一个人站在父亲身边。我知道这是我看到他的最后一刻，我将终生铭记这一刻，可我却是那么地不知所措。多少年来，这一刻的情景时时在我脑中重现，在清醒的时候，在睡梦中，还有非常想念他的时候。我很气恼自己最后没有跟他告别。

等候母亲来的那段时间像是没有尽头。我只想着一个问题：我该怎么跟她说，怎样把这噩耗告诉她。当母亲来了，看到了我。她向父亲的床边冲去，但他们不让她过去。父亲去世了。母亲抱着我，我们两个哭成一团。我能感觉到母亲的心跳，她的眼泪流到了我的脸上。她





为听信了医生过于乐观的估计而懊悔不已，谁的安慰也听不进。她只不过离开父亲去休息了一会儿，可就这一会儿父亲就过世了。医生对她说他们原来真的很乐观，手术也很成功，但父亲的心脏承受不了。

窘迫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们把父亲的棺木运回家，他被葬在了异乡那个他做手术的地方。葬礼很凄凉，只有母亲和我们姐妹三个陪伴父亲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度过了最后的时间。我还记得墓地里的小路，记得那么清楚，直到现在我还能找到那条小路。但是去墓地的路在记忆中却模糊了，其他的事情也记不得了，棺木和葬礼都消失在记忆深处了。

回家以后母亲像换了一个人。她曾经的笑容不见了，眼睛中埋藏着深深的悲哀。她还在头上扎了一块黑头巾以示哀挽，她的面容也因此而显得更加悲戚。这跟我们以前印象中的母亲截然不同。失去了父亲的生活对我们来说非常痛苦。

埃利泽很久以前已经离开了家，匈牙利人把什洛莫抓去做军队的苦力，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现在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三个女儿了。没有了父亲的屋子显得空荡荡的，原来放着他的床的房间一角现在空了出来，本来我们叫那里为“会客处”，父亲在那里可以看到家里发生的一切，但现在什么也没有。

生活没有善待母亲，她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

默默地悲伤着，就像父亲生病的时候她承受的一样。我们想法设法地安慰她，拥抱她，亲吻她，在经济情况许可的前提下给她买些小“奢侈品”，我们不时地给她些惊喜，比如从糕点店买些蛋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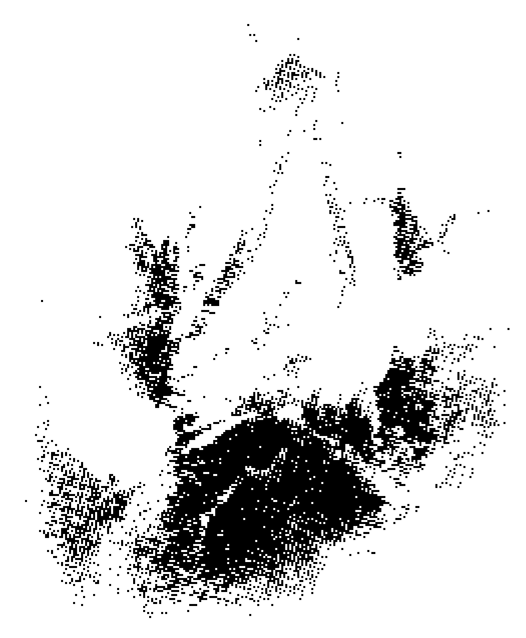
我们很喜欢吃母亲烘烤的点心，那些点心就是用发酵的面做的，加了些其他成分，虽然简单，但很可口。不过我们也只有在安息日和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那样的点心当然不能跟糕点店里买的相比了。

父亲去世后不久，我们听说了邻国发生的事情。据说犹太人被人从家里驱逐出去，但没人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也有人说城里的男人都去当兵了，工作没人做，农村里更是如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很可能被送到其他城市去工作。

1944年3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的军队进入我们地区，第一道法令是命令所有的犹太人在衣服上戴上黄星，这样德国人认出犹太人就方便了。[①]我每天在街上亲眼看到犹太人受到的肆意侮辱和虐待。我们曾经听过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但不相信这些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然而现在这些都已成为事实。德国人每到一处，第一步行动必然是难以置信的残酷行为。他们第一批迫害的就是犹太特征明显的人。这些犹太人遭到可怕

①二战中在纳粹占领的地区，犹太人被迫在衣服上戴上黄色的犹太传统的大卫星标志，以示区别。





的攻击。德国人拉扯犹太经学院学生们鬓角的头发，还去拔每个犹太人脸上的胡子。

毫无疑问，恐怖的事情即将发生，每天情形都在恶化，我们知道时局只会越来越坏，我们开始担心自己可能也很快被驱逐，如同传言所说的波兰和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一样。

现在，只剩下我们四个人，处于惊吓和忧虑之中，没人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

第四章

在隔都

从这时开始，事态的进展非常快。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商店被查抄。店主和商人们失去了工作，天天关在家里。

我们在纳粹政权下忍受了一个月，但一切都好像没有止境。很快，第二个打击又来了，比第一个还要厉害：一道命令下来，所有犹太人必须集中到隔都居住。在我们城市，犹太人本来是分散的，但纳粹给我们造了两个隔都。

一个隔都就在"犹太街"，这名字已经告诉我们它的主要居民是犹太人。这是犹太生活的中心，犹太会





1932年希伯来中学师生合影。一排右三：梅纳赫姆·奥伦，中学老师，后来成为犹太代办处派往塞浦路斯的使者。他身边坐着哈伊姆·库格勒博士，穆恩卡奇希伯来中学创始人之一。

堂、经学院、澡堂“米克瓦”和其他所有的犹太机构都建在这里。

另一个隔都建在城市另一端的主要街道上。德国人封住了这块地方，禁止出入。我们的房子和院子就在这第二个隔都的围墙里。

从那时起，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被迫完全转入地下，所有的会议都在我们家召开。同样，社区的代表和设法躲避当局迫害的年轻人也会被送到我们这儿。这要感谢我母亲，她向他们敞开家门，真诚地欢迎每一个人，就像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们被封锁在隔都中时，这一切都在继续。一天，埃弗拉·阿格蒙来到我们家。他在布达佩斯的犹太反抗活动中非常积极。因为他用了假身份——冒充一名匈牙利高级军官，他可以自由出入。他的工作是向困在隔都中的犹太人提供食物、钱和“雅利安人”身份证帮助他们逃脱。

这些行为使他上了匈牙利当局的“箭十字”通缉名单。匈牙利的法西斯很像戴着“卐”字标记的德国纳粹，在残忍方面甚至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次当局来到我家搜捕他。很幸运的是我们房顶有个小阁楼，是和邻居共用的。当警察在我们家搜查时，埃弗拉躲在邻居上方的阁楼上。他们搜查邻居时，他又



沙育维奇砖瓦厂，从那里上火车去奥斯威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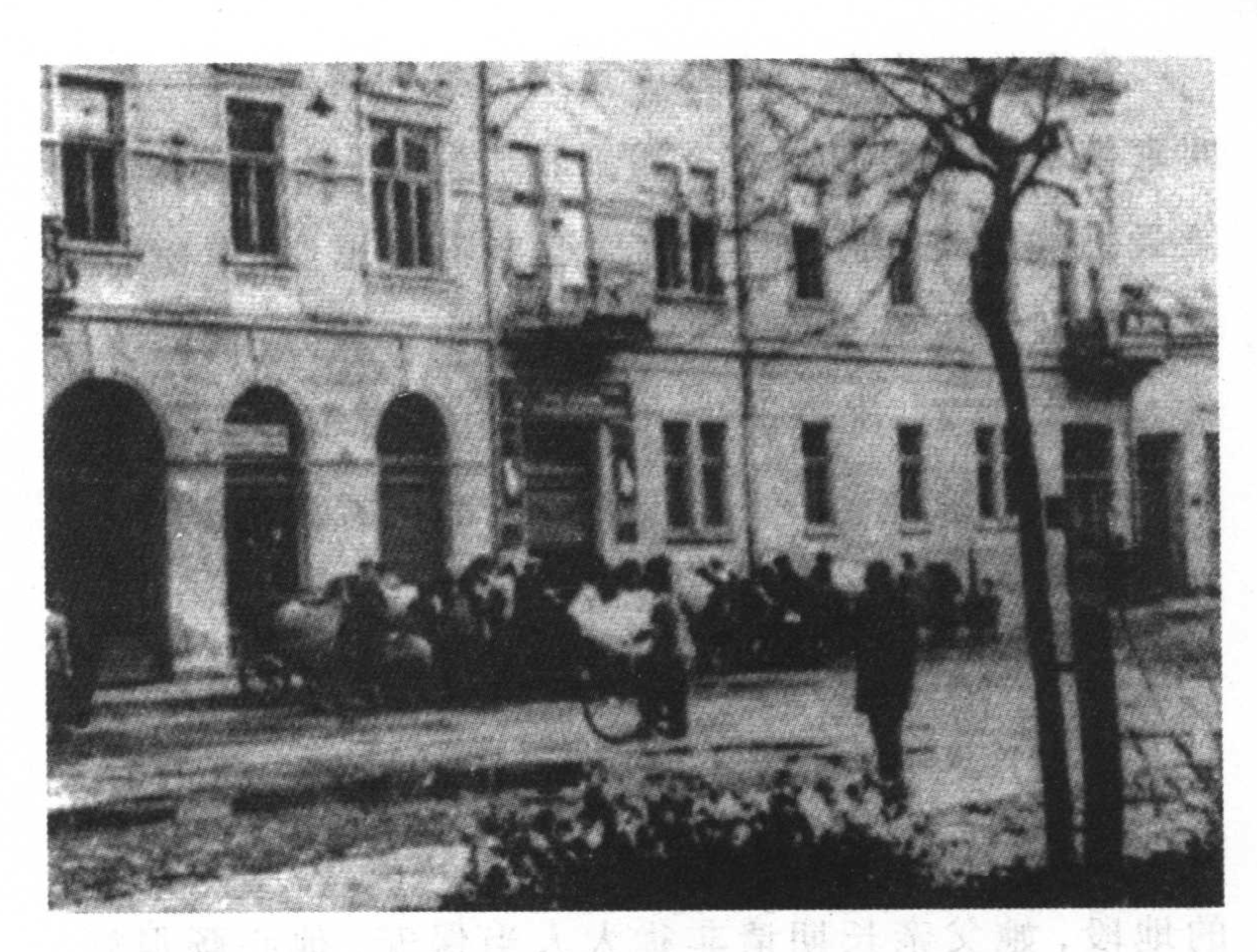
躲到我们家房顶上面。厨房边上的壁橱里有架梯子，他顺着梯子爬上去，摆脱了他们。

埃弗拉向我们描述过他在布达佩斯遇到的惊险的一幕：他像往常一样穿着箭十字军装，胸前挂着一大堆勋章，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小男孩拦住他，说："我认识你。"他跟着他，接着说："真的，我知道你不是纳粹，更不是什么军官。你是个肮脏的犹太人。你以前住在我们附近，我知道你是犹太人。"男孩粗暴地命令埃弗拉转过身，用枪顶住他的背，高兴地押着他向前走，准备把他交给当局。他们在路口停下，那男孩把埃弗拉交给两个和他穿同样军装的人。

那两个人把男孩大大夸奖了一番，说他交上埃弗拉是非常爱国的行为，他们知道怎么处置这个"肮脏的犹太人"。

男孩离开后，三个人突然大声笑起来，原来那两个是埃弗拉最好的朋友，和他一样冒充德国军官穿上了箭十字军装。他们很高兴能够化装成匈牙利军官救出朋友。

城里的隔都建起来之后，所有像我们这样原先就住在隔都区里的家庭都收容了很多外面的犹太人。我们狭小的房子里又住进四个家庭。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我们打开壁橱门，拿出我们不会再用的桌布扔进院子，又移开里面的抽屉和书架，放进新来者的行李。他们带的



1944年4月，向穆恩卡奇隔都行进。

全是最基本的必需品——每个大人只能带一个箱子，儿童只能带一个小包。屋里的地板上放满了床垫，一个挨着一个，我们就睡在上面。

未来似乎不可预知。我们完全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但所有人都预感到灾难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每家都准备了一点食物和换洗衣服，准备出远门时用。一切都准备好了，而我们却茫然不知所措。家里很安静，孩子们不知为什么也都知道现在不是打架、哭闹的时候。

5个母亲在我们的锅灶上忙碌，为20个人准备食物。在那段时间，我们仍然相信他们会把我们带出隔都，到另外一个地方做我们不熟悉的工作。有个传闻说他们计划把我们送到匈牙利南部去种地。





春天的来临多少改善了家里恶劣拥挤的条件。有个叫拿俄米的姑娘和她全家搬到我们这儿。她是我妹妹哈娅最好的朋友，她俩的友谊真有些不可思议。拿俄米的家庭和我们家有天壤之别。我们家非常贫穷，同时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比较进步；而她来自一个富裕而又严守戒律的宗教家庭。拿俄米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们，有时挤在哈娅床上过夜。哈娅也经常去他们家过夜。

拿俄米知道我们都喜欢她。她家非常有钱。他们有一大笔财产，包括一家大商店。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贵重的毛皮，大多数都是进口的。商店位于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她父亲长期请非犹太人当保安。他心肠很好，付钱给他们也很大方，在基督教节日前还送给保安和他们的家庭一些礼物。

对隔都的生活我能记得的已经不多了，但那时的生活有一丝阳光——我的好朋友哈娅。她以前住在“犹太街”，后来随全家搬到我们这儿的隔都里。他们家和我们家之间隔几栋房子，但在那样的艰难岁月里，所有的院子都挤得要命，就像所有的院子都连在一起成了一个大院子一样。院子间的篱笆也很矮，而且几乎所有的木条都断裂了。

我的朋友哈娅有副好嗓子。她会靠在篱笆上，抬头望着天空，梦想着她在另外一个地方，用匈牙利语、意第绪语和其他她懂得的语言唱歌。她用甜美的声音唱出

忧伤动人的歌曲，那短暂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忘记隔都里的艰难。（我的朋友哈娅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到以色列组成家庭，居住在埃因多尔基布兹。她饱受战争摧残，身体非常虚弱多病，很年轻就去世了。）

隔都里无论室内室外都异常拥挤，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独处的安静地方。在所有的房子后面、院子的尽头，有一排仓库，每个房主都有一个独立的仓库。仓库边有堆原木，层层叠叠堆起来，等着冬天里伐木工人的到来。有时我会到那儿去，爬上那堆原木的顶端，或者躲到木头之间的空隙里。在那儿我能为自己找到一点空间，一个我自己的地方，远离其他任何人。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我会忘记周围发生的一切，和玛格丽特·米切尔《飘》中的主人公一道度过。我不知道我们承受的苦难是否真有一天也会随风飘去。谁知道呢？风什么时候会吹来，又从哪里吹来？

在隔都里，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和母亲去了地窖。她拿着一根长长的管子，里面装着她从结婚起保留到现在的几件珠宝。她把硬币和纸币塞进管子，看着我们，她的女儿们，除下了耳环。我非常喜欢那对耳环。它们的做工非常精细，三叶草的形状，中间镶着一对绿翡翠，更突出了母亲的蓝眼睛，增加了她的美丽。母亲用一把铲子在地上挖了一个小洞，我们每个人也往下挖了一点，直到洞看起来够深了。母亲拿起管子，用布把它





包了一层又一层，放进洞里。我们又一起把它埋好。

我们站在它上面，用脚把泥土夯实，掩盖了我们挖洞的痕迹。母亲紧紧拥抱我们每一个人，含着泪说："这样，你们，我亲爱的女儿们，回来以后就可以用这些开始新生活了。"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那么强烈，仿佛事关生死。我有时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儿，还能听见亲爱的母亲用她甜美的声音说着这些悲凉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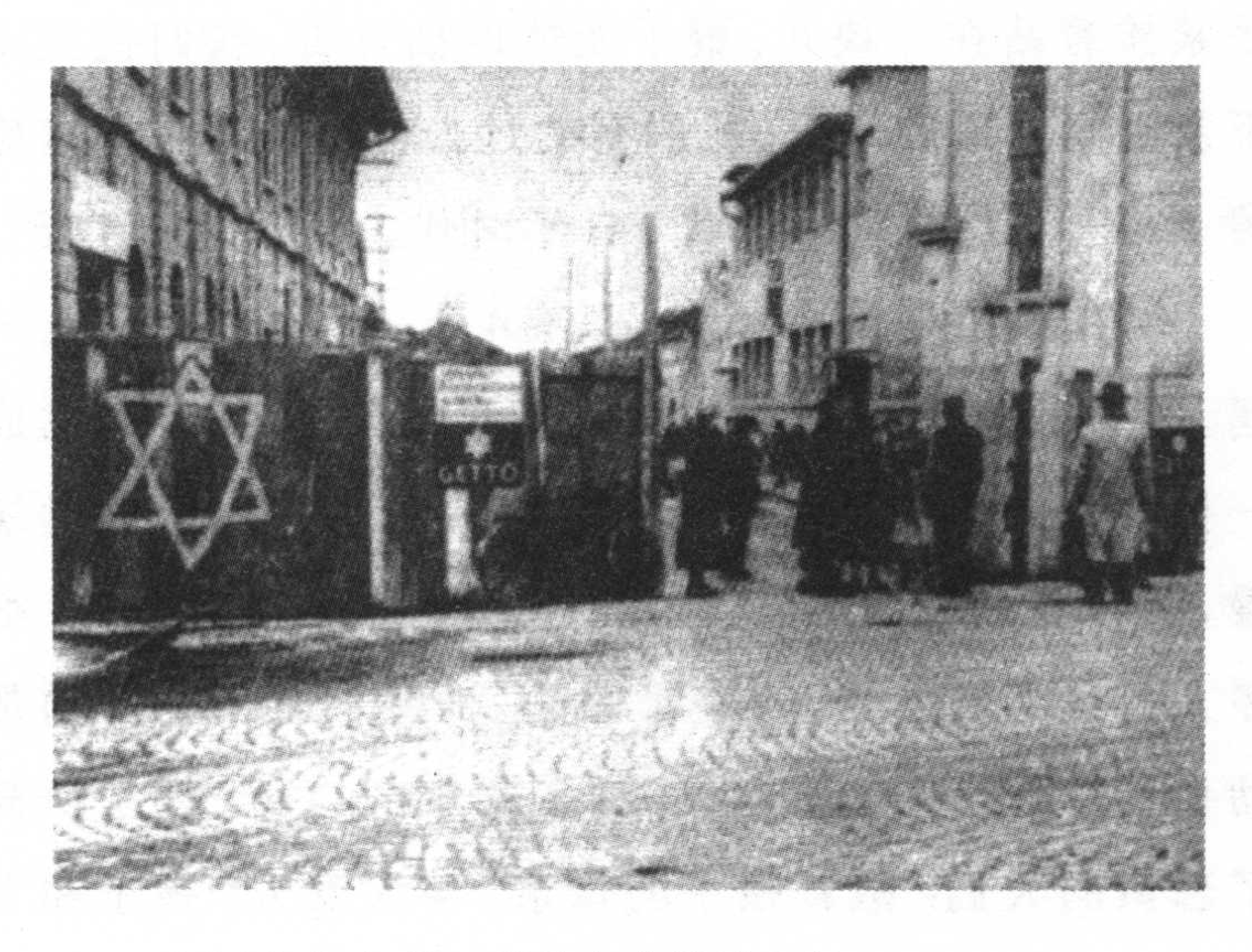
又一个夜晚，一轮满月挂在空中，我们三个人，哈娅、拿俄米和我一个接一个悄悄从拥挤的床垫上爬起来，站在窗户边上。和欧洲很多老房子一样，我们的窗户也有两层，为的是抵御冬天的严寒。两层窗之间有个宽敞的窗台，我们就在窗台上撑着肘。三个女孩子挤作一团，满怀梦想和浪漫，呼吸着春天的空气。

这是在4月初。这个月的20号正好是我们被赶进隔都整整1月。我们默默地站在那儿，紧紧挨在一起，抬头望着夜空中的明月。我不知道下一个夜晚我会在哪儿看它——我还能再看见它吗？

我们能听见睡在后面的那些人呼吸的声音。在此起彼伏的鼾声中我们还能听到无法入睡的孩子轻微的哭声。我们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我们很累了，但都不愿意就此放弃这个美好的春夜，似乎那时我们已经预见它将是我们在家

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这时一个人影在黑暗中出现，通过大门接近我们。当他看见我们时，他突然拔腿就要跑。拿俄米认识他，叫他回来，让他不用怕，说我们都是好朋友，就像姐妹一样无话不谈。他回来了，拿俄米从腕上解下金表给他，鼓励他有什么话就对我们三个人说。

他曾是拿俄米父亲皮毛店的保安。他走过来，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看着我们，他不知如何开始对我们开口。我们看见他是那么犹豫，不知道怎么说他必须说的事情而又不使我们烦恼痛苦。最后他说，事情还不是很清楚，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和其他的警察都接到命令，在第二天黎明，准确地说是凌晨3点45分，在市集的广场集合。他说完这些就很快



1944年4月，穆恩卡奇隔都大门。





消失在春夜那天边的黑暗中。

我们吓呆了，头脑一片空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否应该叫醒大人们，告诉他们这条消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让家人多睡几个小时。谁知道我们明天晚上会在哪儿，什么时候又能再有机会睡在床上呢？我甚至怀疑我以后是否还能睡着。那时我真是累坏了，根本没法思考，和两个女孩子抱在一块儿想休息一会儿，不料却睡着了。

“Raus, schnell, verfluchte Juden!”（“滚，快滚，该死的犹太人！”）鞭子嗞嗞地从空中落下，落在我们的头上和肩膀上，我们被赶出了家门。我们每个人手里提着一个箱子或包，蹒跚着下了两级台阶。母亲、两个妹妹和我瑟瑟发抖，四个人泪眼相对，手牵着手紧挨着站在一块儿。鞭子无情地抽打着，我们甚至来不及看家里最后一眼。我所有的过去就这样留在了这栋房子里——我的童年时代、青年时代，我全部的生活。

现在我们是个小家庭，只有4个人，拉着手站在一起。很快我们邻居的女儿加入了我们队伍，5个人站成一排——这是他们命令我们做的。我们行走得非常缓慢，可以说是被辱骂声、诅咒声和殴打推着前进的。很多人再也无法忍受，停在了路边。而我们却不能上前帮助他们。我们就这样走着，到了市集的广场。那里挤满了恐惧的人们：抱着孩子的母亲、男人女人、孩子和老

人。德国人咆哮着，用鞭子鞭打我们，吼叫着要我们时刻保持五列队形，就地坐下。从那时起我们就不再有名字了——他们叫我们就像叫牲口一样。

黎明的到来揭开了市场上灾难的序幕。当时的情形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它永远也不会从我的记忆里消失。即使现在我写这些苦难回忆的时候，我似乎又在重新体验着那时的经历。德国人走到我们中间，从我们手指上捋下戒指，从脖子上拉下项链，从耳朵上扯下耳环，还粗暴地搜索我们的衣服，看有没有珠宝。他们一边咒骂着“verfluchte Juden”（该死的犹太人），殴打着我们，一边抢走了我们所有的钱。

我们4个人静静地坐着。我看见那些试图反抗他们的人脸上的鲜血，害怕极了。突然，我们听到一声枪响，第一声。这是德国人的警告。听到枪声后，所有人都在恐惧中颤栗着发抖，再没有人试图反抗德国人了。我们一同坐在市集泥泞潮湿而肮脏的鹅卵石地上，我不知道应该看哪里，周围到处都是血迹斑斑的面孔和身体。耳中又一次听见命令我们起来的咆哮声：站成五列准备出发。从那时开始直到我逃离死亡行军，所有行动都是排成五列进行的。

我们出发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行走在家乡的街道上。那些抢掠了犹太人财产的新主子们站在商店的入口或家门后面，公然嘲笑着犹太人是守财奴。党卫军用枪





敲打我们的头和身体，企图让我们加快速度，但我们仍然移动得十分缓慢。孩子们哭闹着寻找分开的父母，女人们紧紧抱着手里的婴儿，不愿前行。很多老人和体弱一点的都累倒在地上，但我们被命令继续前进。离开队伍帮助他们是被严格禁止的。有位老人倒下了，一个德国人一脚把他踢下水沟，以“维持秩序”。那老人再也没有站起来。

我们继续艰难地行进，渐渐扔掉身上还带着的累赘。每走一步都有人扔掉箱子或包袱，使行走稍微轻松一点。我们身后的路上满是包裹和箱子。但行进仍然十分缓慢，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既困惑又害怕，但更可怕的感觉是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我们4个人互相照看着，保持走在一起。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我们一句话也没说，甚至没有耳语。

几天前我们听到传言，数千从别的城市和农村来的犹太人在我们城里呆过，现在被集中到砖瓦厂的院子里了。没人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关到那儿。从行进的方向来看，现在轮到我们去那儿了。我们也是被带到那个集中的地方——砖瓦厂的院子。

当我们到达那个院子时，那里已经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犹太人。他们来回走动，拥挤推搡着。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概念，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有他们的眼睛在说话。

我们都还有一点点食物，但真正的问题是缺水。干渴折磨着我们，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没有水是多么难受，干渴比饥饿还要可怕。

我又想到了教徒和他们的祈祷，觉得那是正义的人性的。因为即使在赎罪日[1]，拉比们也允许禁食的人在必要时喝水，以拯救一个垂危的生命。可现在我们只感到皮肤也在遭受干渴的痛苦。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一滴水都没有。

我已经忘记那天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日期，但隐约记得好像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我抬头仰望天空，云已经散去，天上一片湛蓝。我祈祷老天下雨，这样我们至少就能有几滴水了。也许这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方便。临时准备的设施对过去几个世纪中生活的人们也许适用，但现在我们也得重新学着适应它。厕所是敞开的，所有人都能看见，那确实是很原始的设施：一个深坑，上面盖着一块板，你可以抓住两边，让自己稍微放松一点。尽管非常急，有时甚至还有些疼，让我感到膀胱胀大，肚子要炸了，我还是尽量忍着。如果感觉实在忍不住了，就不得不去解决。我们几个朋

①犹太民历1月10日（公历9月或10月）为赎罪日，是犹太教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根据教义，这一天是上帝审判人类中绝大多数的最后关头，包括一些世俗的犹太人都进会堂祈祷认罪，请求上帝的赦免。在这一天，犹太人不仅禁止一切娱乐活动，而且凡是成丁（男子满13岁，女子满12岁）的犹太人都不吃不喝。但病人和体弱者可以例外。





友一块儿过去，用大家的身体挡住其中一个。有些难以置信的事也在临时厕所发生了，我紧紧抓住那块板令自己不要掉下去，徒劳地拼命努力撒尿，却一滴也尿不出来。我不由自主地向下看，看见一幅难以置信的景象：在屎尿堆积的粪坑里，我看见有些东西闪闪发光，是金戒指、宝石和各式各样的珠宝，上面还盖着很多钞票。德国人野蛮的搜索使有钱的女人相信她们再也没有机会戴珠宝了，便急急忙忙处理了这些东西。现在洞里的东西盖住了珠宝。这是她们小小的报复。

很幸运的是我在隔都时月经已经结束。后来德国人给我们的食物里含有阻止月经的药物，在所有不人道的待遇中，这件事倒是给我省了些麻烦。

第五章

奥斯威辛·比尔肯瑙集中营[1]

那时，附近的铁道上不停地有火车把一车车人送走，我们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一天，一列火车在邻近的砖瓦厂停下，终于轮到我们了。火车停下的时候我们在咆哮声、命令声和咒骂声中，人们被鞭打着赶进了车厢。越来越多的人被数点后挤进车厢，就像牲口一样。德国兵数到一定数目——大约八九十名男女老幼

---

①奥斯威辛集中营位于今天波兰境内，建于1940年3月。第二年在附近的比尔肯瑙村又兴建了一座分营，其总面积达到15.5平方公里，是最大的纳粹灭绝营。从1942年全面运营到1945年1月被解放，至少有150万犹太人在这里被屠杀。





后，车门便砰的一声关上了。

很难描述那艰苦的条件。我们四个互相紧紧抓住手，保持站在一起。因为太拥挤，我只能一只脚站在地上，另一只脚踩在它上面。很多人实在太疲倦了，不得不坐在地上，这使得车厢更加拥挤。经常都有人从自己的位置起来，移到车厢的门边，那儿有个马桶。

汽笛一声长鸣，火车便开动了，我们甚至没有感觉到。但它开得实在太慢，就像在爬行。突然，没有任何警告，也不知为什么，它减慢速度停了下来。我们以为到车站了。我试图在黑暗中寻找车站的名字，看看我们到哪儿了，但那是徒劳的。没有车站，什么都没有。黑夜里火车就这么停在了荒郊野外。车门打开了，一些尸体被扔了出去。然后火车继续前进，没有信号也没有鸣笛。

我对那段旅程记得非常清楚，它时时在我眼前重现。我边上站着个抱孩子的女人，怀中的婴儿一刻不停地哭闹。她把乳房凑过去，但要么奶水是苦的，要么根本就没奶了，婴儿用小手推开了奶头，继续啼哭。那个年轻的母亲无助地看着我们，十分抱歉她没有办法让她干渴的孩子停止哭泣，因为他拒绝吃她的奶。我站在车厢的一个小通风口边上，那曾是为了喂牲口而设的，现在用铁丝网封上，防止我们逃脱。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微弱，到后来简直就像呻吟一般。这时老天似乎听到了他



1938年，穆恩卡奇，拉海尔在表姐以斯帖的婚礼上，拉海尔站在母亲身边。

的祈祷，开始下起雨来。我掬起双手拼命伸出通风口，直到雨滴可以顺着手指流进掌心。我小心翼翼把水凑近婴儿的嘴唇，他舔光了我手里的雨水，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我从他母亲的脸上看到了感激的表情。

我们走了至少三四天，突然听到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开始减速。我可以看到探照灯射向空中，宛如白昼。一扇大铁门上贴着欢迎我们的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你获得自由）。

我来到了名叫奥斯威辛的人间地狱。

我一直很注意一件事：我们4个必须在一起。已经是半夜三更，我们被带来的这个地方仍然忙碌不已，就





像在白天一样，巨大的探照灯耀眼的灯光照射着这里的一切。党卫军军官一边吼叫着发出命令，一边诅咒、殴打我们。我能看见穿着斑马条纹状囚服的男人，后来很快就知道这些是“老犯人”，他们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糊涂了、吓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向前走了一段，看见两侧有“小山”不断加高。我们都往那上面扔自己的箱子和包袱。现在已经没法思考了，人人都像失去了自己的意志一般，重复着前面一个人的动作。我们把手里剩下的东西都扔到那包袱的“小山”去了。我们现在两手空空，面对着更痛苦的下一步。一个党卫军站在队伍之前，命令男人去一边，女人去另一边。这是家庭的第一次分离。

我们四个还在一块儿。队伍还在慢慢向前移动。第二次甄别令我们非常害怕。这次他们命令年轻的女人站到一边，年长的站到另一边。母亲就在这里和我们分开了。我们年轻的女孩站到一边，我突然感到母亲被人从我的手中拉走。在那之前我们都紧紧地拉住她，但现在我看不见她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我们甚至来不及向母亲道别。土耳其工人看见我们掉泪，就安慰我们说每个星期天都可以见面的。但这是个空头承诺——我听说所有和母亲一块儿走的人都直接被投进了焚尸炉。

消息传播得非常快，几分钟后我就知道我再也看不见母亲了，因为她那个队伍所有的人都被送到了火葬场

的焚尸炉。我们 3 个悲痛地哭着，我生自己不能保护母亲的气。

我不能接受母亲离开我们的事实，而我相信这是我的过错。如果我摘下她头上戴着的哀悼头巾——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就戴上的——也许她还可以和我们在一起。她长得漂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只是哀悼的头巾使她看上去老了一些。我被负罪的感觉折磨着。为什么我没有摘下她的头巾？如果不是那头巾，我们或许还能拉住她的手。

从这时开始，事情发展得非常迅速。我甚至没有机会哀悼母亲的离去，只是在极度的悲伤和痛苦中在心里向她告别。而紧接着发生的就都是根据计划安排的。德国人喜欢精确，我们就像是传送带上的东西，从这一站被送到那一站。每一站我都要丢掉一些东西。一开始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被命令脱光衣服扔到一边儿。我感到很恐怖，现在我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对我们的羞耻进行分类。但在下一站，我感到它到达了顶点。党卫军用枪托把我们赶进了一个被灯光照射的宛如白昼的礼堂。在那儿一些年轻的党卫队男孩来回走动。他们刚刚开始剃须，但已经扛起了步枪。因为年龄还小，他们还没有被征召进军队。女孩儿和年轻的女人们像刚出生时一样赤裸着身体，看着他们高傲、冰冷的蓝眼睛，我想这是可怕的耻





辱。但我没想到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传送带一刻也没有停止转动，现在该我了。我赤裸着身子，在寒冷和羞耻中瑟瑟发抖。突然，冰冷的剃刀抵住我的头骨，开始剃我的头发，我控制着大脑，极力保持神志清醒。他们剃完头发以后，又剃光了我的腋毛和阴毛。

我只会说一点德语，但完全听得懂。我赤裸着站在那儿，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党卫军解释说对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好，因为必须保持卫生。他们说，卫生第一。我几乎要晕倒。我知道他们的洁癖只是为了一件事：摧毁我们的灵魂。我暗暗发誓，决不投降。

在恐惧和绝望中，我在礼堂里来回走动。我不认识周围的女孩子。我寻找着两个妹妹和我的朋友，但却无法辨认。所有人都被剃光了头发、一丝不挂，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只能靠脸蛋辨认。我们三个——哈娅、阿达列[①]和我，在光头中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我们仍在为头发被剃光而痛苦不已。看到她们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阿达列那头漂亮柔软的金发没有了，那是我以前经常替她梳理的。我们安慰自己说，3个人还在一块儿，这是我们应该庆幸的。

奥斯威辛的传送带一刻也没有停止，但他们来不及

---

①阿达的昵称。



1946 年，奥地利温德斯海麦，战后"青年保卫者"顾问的聚会。

在我们胳膊上刺号码[①]，就给了每个人一块刻着号码的牌子，贴上一块皮革，让我们戴在脖子上。在下一站，他们从一堆衣服中扔给每个女孩儿一件。我拿到一条无袖的裙子，仅此而已。没有内裤，没有文胸，也没有毛衣或夹克衫，尽管天气很冷。由于羞耻和寒冷，我很快穿上这条裙子，但立刻感到另一场可怕的灾难，并不是因为我得到的裙子本身，或是由于它没有袖子，而是因为那里面充满的东西——里面满是虱子，拼命地咬我，

---

①纳粹通常给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刺上号码，以便于管理和辨认。今天在以色列，有些大屠杀的幸存者胳膊上还残存着当年集中营里刺的号码。





用不计其数的针刺吮吸着我的鲜血。它们在裙子里产卵，于是越来越多的虱子开始咬我，我都不知从哪儿捉起。这太可怕了。但在这时，同样没时间感受疼痛。

传送带像抹了润滑油一般无情地转动着，一刻也不停。外面夜幕已经降临，我们仅存的人类外表的部分也渐渐模糊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但能感到党卫军的鞭子在驱赶我们前进，直到把我们赶进一间大屋子。他们把它叫做“街区”。1000个女人挤在那一间屋里。屋子中间有一条几厘米高的水泥管，我们以为那里面有中央暖气，尽管在那些异常寒冷的日子里并没有感到里面冒出过一丝热气。我们住在C营9区，英文是“Camp C”，德文是“C Lager”。门口有间小屋，女看守可以从那里的小孔看见我们，而我们却看不见她。她被称作“stubelteste”，负责我们区所有的命令和一切事务。

我有一次经过那间小屋，在它的窗户前照照自己，却看见父亲的容貌。我惊呆了，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从我幼年时起，就有人告诉我我长得特别像父亲。正因为如此，小时候哥哥们和妹妹们都觉得父亲喜欢我胜过喜欢他们。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只是手足间正常的攀比而已。我做母亲之后，更明白所有的孩子对我来说都一样亲。但在那里，因为透过玻璃窗看见了我的影子——光头、浓眉和父亲的容貌特征，我可以发现我和他的共同点。

大屋里住了1000个女人。屋里有两排铺位，都是上中下三层。每张铺大约像双人床那么宽，我们10人到12个人挤在一块儿。在光秃秃的床板上睡觉不容易，我们之中一个人想翻身，所有人都得跟着她一起翻身。

我们是在星期五早上到达奥斯威辛的，我记得很清楚。但很快就没有时间的概念了。在那种地方，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每天都比前一天更糟。

那是我在集中营的第一个星期五。我周围尽是那些挤在上中下铺上的女孩子和女人。我认识她们中很多人——朋友、院子里或是隔壁的邻居、“青年保卫者”运动的同志。我从她们眼里看见了悲伤，但更多的是恐惧。

那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要帮助她们，当然也有我自己，振作起精神。我和妹妹慢慢爬下铺位，找了几个朋友和其他的姑娘加入我们。我们站在管事女人那间小屋旁边，开始唱歌。我们满怀热情地唱了《希望之歌》[①]，还有其他一些希伯来语歌曲和安息日的歌。我们放声歌唱，充满激情。

突然，门开了，一个党卫军双眼喷火走了进来，用

①原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颂歌，在1897年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首唱。以色列建国后将其确定为国歌。歌词如下：只要我们心中，还藏着犹太人的灵魂，朝着东方的眼睛，还注视着锡安山顶，两千年的希望，不会化为泡影，我们将成为自由的人民，立足在锡安和耶路撒冷。





尽全身力气，左一鞭子右一鞭子抽打着我们，我们却还站在那儿继续歌唱，直到最后一个人被他抽倒在地上。这是我在奥斯威辛的非人世界度过的第一个安息日之夜。

在奥斯威辛，就像有些事情我会记一辈子一样，也有些事我忘得一干二净，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个安息日的事情便是如此，之后发生的很多事使我彻底忘记了它。但命运似乎一定要让后人记住死亡阴影笼罩下的奥斯威辛庆祝安息日的活动。多年以后，我哥哥埃利泽从一个女人那里听说了那次安息日庆祝，她比我先从战争中回来。我不认识她，也没跟她说过话，但她记得我和我的两个妹妹，很欣赏我们。她记得我们姐妹三人的名字，对我们的勇气非常惊讶。她向我哥哥说完故事后又补充说，在那个奥斯威辛的安息日庆祝活动之前，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锡安青年运动。她很感谢我们的勇气，这使她一度绝望之后重新振作起来。她无法描述我们的行动带给她和其他女人的感受。

外面一片漆黑，我们不知道是否还在夜里，或者天还没亮他们就早早叫醒我们。屋门开了，发给我们每个人一个锡盘，我们就排着队领早餐。早餐是一勺无法辨认的淡淡的透明的液体——我们挺渴的。还有片面包，长宽大约10厘米，高8厘米，像是块肥皂。这是每天的面包定量。我们饿极了，抓起那片面包就狼吞虎咽。

它的味道很苦，在我们手中散开，直到最后的一点碎屑。第二天一早得到第二份定量时，我们小心得多了。不过还要看每个人的决心。有些人一下子就吃光了她们的面包；也有些人，比如我们，只吃一点，留下其余的放在床铺上，点名回来后再吃。但我们很快发现这根本没用，因为总有人比我们先回来，“拿走”我们的面包。阿达列和我像其他人一样吃面包。但哈娅有胆结石，没法吃，只能靠早晚的汤撑着。至于中午给的汤，一盘漂着几粒麦粒的灰水而已。

我能看见营地周围通了电的铁丝网。沿铁丝网建了好几座瞭望塔，上面有荷枪实弹的党卫军驻守。他们的手指扣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向任何离开营地的人射击。

一批新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来到了邻近的营地，我们羡慕地看着他们。他们来自泰里茨，德国人的“模范营”。泰里茨是德国人关押那些被指控犯罪或“妖言惑众”的人的地方。他们是一家子一块儿来，直到被分开。像其他人一样，我也站在围墙边羡慕地看着他们和家人一道。突然，一个站在我边上的女人看见她的儿子刚刚来到新的营地。她看着看着，忽然大叫道“儿子，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就向他跑去。她张开的双臂碰到了电网——守卫看见她，听到她的话，在她碰到铁丝网前的刹那合上了电闸。另一个试图上前救她的女人碰到了她的裙子，也被电死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三个女





人身上，她没法见死不救。第4个女人也上前碰运气，直到后来一排女人都躺在地上，从电网边延伸到我们站着的广场。她们都被电死了。这是一个标志。从此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条路脱离这个地狱，这是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们恐怖的遭遇可以立即结束。

事先并没有商量过，我们这些年轻女孩子睡到了上铺，年长一些的女人睡在中铺，年纪大的睡下铺。这是我的感觉。不过很少有年过四十的女人能通过甄别，留在我们中间。

他们把我们赶进屋子，管理这些女人的女看守再把我们赶上三层的床。她执行"格柔丝"的命令，那是这里最大的党卫军女军官，也是奥斯威辛最恐怖的人。跑步去广场点名时，一个武装守卫站在屋门口外，大屋的女看守仔细检查是否有人留在屋里。我们发现自己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爬上铺比那些年长的女人要容易一些。我记不得我们是怎么憋尿的了，因为每天只允许上两趟厕所，而厕所也肮脏无比，令人作呕。

就像我已经提到的一样，奥斯威辛里有些事我记得很清楚，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也有些事我一点也记不得了。这实在很有趣。在那里的时候，每天我至少要去一趟厕所。我一遍又一遍问妹妹：奥斯威辛的厕所是什么样的？但她也答不上来。我能记得的是每天要被带到清洁房。那屋子跟我们住的木屋差不多大，有条长长的

水管。我们被命令站在龙头前，站在那里等水来。德国人也有洁癖，所以还在边上放了块肥皂。它像块小小的蛋糕，我几乎拿不住。肥皂和我们每天领到的面包差不多大，很难闻。传言说它是用人的脂肪做的，可怕极了。

但所有不相信传言的人都和我做的一样。我太想洗手了，就擦了肥皂。可搓了又搓，一点泡沫都没有。我站在那儿等来水，同时在胳膊上、脸上、脖子上和身上涂了肥皂。然而打开水龙头，什么都没发生，根本没有来水的迹象。笼头滴下三四滴锈水滴就完了。这时，尖厉的命令声把我们赶回屋子，而我们身上还抹着臭烘烘的肥皂。我浑身发痒。也许下次管子里就有水了，可以洗掉肥皂了。可那是什么时候呢？

点名之后，我们排成五列，顺着肮脏的道路从奥斯威辛走向比尔肯瑙。我们听说他们要把我们带去正经地洗个澡，而且以后每星期都能洗。来到浴室，我们被带进一间奇怪的房间，四周好像都是刻了花纹的天花板。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昏暗的灯光，我才发现墙上和天花板上满是洞孔。我在恐惧和寒冷中瑟瑟发抖，也不知道出来的是水还是毒气。每个星期，我们都要这样“洗”一次，颤抖一次，因为也许这就是最后的时刻了。

每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被叫醒，也不知道白天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因为强烈的探照灯光总是照射着整座集中营。黑暗中女看守把我们赶下铺位，跑步去木屋间的广





场点名。我们5人一排站着，总是试图让年长体弱的女人站在中间。我们这排一头是个女人，然后是我，然后是阿达列，另一头是另一个姑娘。哈娅站在我们后面，她的胆结石时常发作。风雨中，我们在同一个地方要站上好几个钟头，身上穿着的是那条仅有的裙子。我们相互所能给予的惟一的帮助便是互相说些鼓励的话。

站在第一排的人吃的苦最多，因为她们得一直站着。而站在中间和后面的就可以稍微弯弯腰，甚至在地上坐一会儿，但这是非常危险的。我妹妹哈娅的胆结石时常发作，她的身体条件每况愈下，正是这些短暂的休息救了她一命。对阿达列来说也非常困难，她是最小的，只有13岁，没有我们强壮。看见她这样，我的心都要碎了。她是我们的小美人，金发披肩，模样俊俏。但他们像对待我们一样把她的一切也拿走了，特别是剃掉了她那头人见人爱的金发。哈娅和我很照顾她，总设法让她站在队伍中间。

我们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阿达列和我尽力默默地忍饥挨饿，而哈娅的病痛则无情地折磨着她。每当她熬过一阵剧痛，便会轻轻喘口气，在下次疼痛袭来前放松一下。哈娅也静静地忍受着，从没有一句怨言。有时疼痛特别剧烈，她就会从上铺爬下来坐在地上，倚着支撑屋子的柱子，让呼吸稍微容易些。

每当她爬下床时，我都会跟下来陪她。一次，我醒

来后发现她没有睡在我边上，立刻迅速爬下床，发现她靠在柱子上，牙齿紧紧咬住下唇，甚至咬出了血，鲜血混合了脸颊上流淌的泪水流了下来。她咬住嘴唇是为了阻止自己疼得哭出声来，因为她知道她必须保持沉默，不能让一个人听见。万一女看守发现她病了，就会把她送到病号区。德国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所以我们必须健康。尽管有个特殊的病号区，但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送去的病人根本得不到治疗，而是被直接送到焚尸炉去。

我知道我必须想法子阻止哈娅一天天瘦下去。一天晚上，我悄悄爬下床摸到门边，看见那个武装守卫在外面巡逻。等他走开，我便溜出了屋子。我猫着腰一步步向前走，直到探照灯的灯光从我这边移过去，我终于走



1946年，青年保卫者运动辅导员，塞浦路斯。





到了食品工厂。那是一间大厨房，没有台阶，只有一个斜坡通向里面。德国人把桶（他们叫做kubelen）放在坡上，里面装着给我们的食物。我慢慢移动，蜷缩成一团进了入口。我整个身体都在发抖，直到我发现自己已经进了厨房。面前就是几个比我还高的大桶。桶很干净，闪闪发光。我摸到一个大桶，尽管它是空的，但还是太重了，我无法移动它。我使出吃奶的力气，试了一次又一次，终于意识到我微弱的力气是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我仍然蜷伏着，在恐惧和寒冷的颤抖中摸到一个小点的桶。我重新聚集力量，双手用劲使它往我这儿倾斜了一点。我的腿也在使劲，全身都在摇晃。突然，我发现一个惊喜：在桶底的粗面中躺着三个土豆。我用力把手伸进去，直到碰到底端，把土豆和粘在上面的面粉都拿了出来，用一块随身带来的布包好，带着这些宝贝兴高采烈准备回去。

这时，没有任何预先的征兆，也没带一个卫兵，营区的最高女指挥官“格柔丝”骑自行车上了那个斜坡。她是个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柔软的金发挽在颈后，军装也非常合身，似乎是她那美妙身材的模具。我突然觉得这样一个美女不可能是魔鬼。但我知道，这副漂亮的躯壳下包藏的是野蛮而残忍的邪恶。有一次我看见她罚一个老太太跪在砂砾上，只因为她直视了她的

眼睛。

我看见她骑车进厨房的时候，仍然蜷着身子，拿着宝贝土豆向门边爬。虽然我不信教，但那时我紧紧屏住呼吸默默祷告，求上帝让地面裂开，把桶、整个集中营还有我都吞下去。我蹲在桶后面，憋住气，直到女军官检查完想查的东西，骑车离开。

她走了以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慢慢摸回门边。我又一次等着守卫走开，等着探照灯移向别处。离开厨房没多久，鞭子突然雨点般落在我的头上和身上——我没注意到守卫回来了。无情地鞭打了一顿之后，他又愤怒地用步枪的枪托砸我，直到我跌倒。但我的喜悦之情难于言表——尽管我浑身疼痛，但土豆仍在我手里。我回到屋里，他还在后面对我喊："如果我再看到你到厨房边上转，你就不会活着离开。我会一枪打死你！"我蹒跚着回到屋里，勉强爬上上铺。第二天一早，哈娅看见我身上的鞭痕。"我的拉海尔，你怎么了？"她问道。我告诉她是我上床时被粗糙的床板磨的。看到我给她的土豆，妹妹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因为她终于有些可以吃的东西了。之后，我们从另一个地方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帮助，就像是一个奇迹一样。

每天有一个穿着斑马条纹状囚服的犯人拿着工具箱走过我们营地，他是个老犯人了，德国人让他做水管工，所以他可以在营区之间自由走动。一天，他在我们





身边停下，开始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跟我们交谈，但我们都能听懂他的话。他问了很多问题：我们是谁，从哪儿来，又是怎么在这人间地狱生活的。我告诉他，我们还年轻，还很乐观。我们要坚持活下去，互相照顾。我想他听懂了我说的话，觉得可以告诉他我们的麻烦，也就是哈娅的病情，便向他说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我告诉他，因为胆结石的剧痛，我妹妹没法吃领到的面包，每天只能靠那点汤度日。第二天他像往常一样放下工具箱，停下来和我们交谈。但这次，他打开工具箱，拿出一个小包给哈娅。那里面有一块白面包做的三明治。

我们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但仍然拼命用英语——一种他并不熟悉的语言——向他表示感激，感谢他和他的同情心，因为我们知道他的食物也是有定量的。第二天，他又给哈娅带来一块白面包做的三明治，第三天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他从什么方向来，会在那里等他几个小时。每次他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可以跟他说几句话，当然更高兴的是他带来三明治。

这大大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依旧乐观，互相鼓励。每天我们微笑着向他告别，等待第二天的到来。一天，我望着这位“救世主”来临的方向，他却没来。我们等呀等，但连他的影子都没有。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担忧这位好心人的安危。我们怕

有人看到他，向德国人出卖了他，那他就会因为帮助我们而受到惩罚。我也很为哈娅悲伤——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日子在期待中一天天过去，但我们的恩人还是没有出现。后来，有一天，我突然看见他了，他在大屋的另一头，但我不敢肯定那是不是他。第二天我又看见他在同一个地方。第三天，我决定给他一个惊奇。我等在一边，悄悄跟着他，发现他在跟另一个年轻女孩交谈。他站得离她很近，然后给了她一块三明治。我惊呆了，不知该做什么好。因为跟踪他，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但哈娅对我来说比其他一切都重要。我很生他的气，我不能放弃那块白面包三明治。我从藏身的地方出来，站在他面前。

他一看到我，脸色立刻变得苍白，喃喃自语了些什么，原地踱了几步。然后，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我说，他很抱歉，非常地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太对不起了。”他知道他使我们受了罪，那三明治对我妹妹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我的行为无情无义，但你应该理解我。我还年轻，在这儿关了几年了，离家离老婆都很远，我想女人想疯了。这姑娘看见我给你们三明治，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交换它。”

一时间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但我听清了他的话，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我看着他的眼睛，低声问他：“那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呢？你知道我会为我的妹妹付出一切。”他尴尬地低下头，回答说：“我很了解你……知道你……不会的……”

我知道这营里的数千女人中什么样的都有。即使在这里，在这个扭曲的世界，为了生存的竞争也是残酷无情的。生存的欲望抹去了人性中最后一丝羞耻感，人们出卖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我把他的话作为秘密保守起来。战后过了些年，我才告诉妹妹。

哈娅的状况持续恶化，她的病痛越来越难以忍受。一天夜里我醒来时发现她没睡在我身边，便赶快爬下床。她坐在地板上。“拉海尔，请别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姐姐，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决定结束我的痛苦。一切都完了。今晚我去碰围墙的铁丝网。”我抱住她，两人哭作一团。然后我们互相擦干眼泪，我告诉她我理解，因为我能看见她受的罪。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她去碰电网，我也会跟她一块儿去的。我帮助她回到铺上，我们又熬过了一天。

我不知道这会持续多长时间，只希望自己为了两个妹妹能更坚强一些。一天爬上铺位时，我在柱子边停了一下，听见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女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听远处一个人发言。那时我才体会到她们多么自豪于曾经拥有的财富。我靠在柱子边站着，听那个女人炫耀她过去辉煌的时光。她很高兴另外9个女人已经讲完，

现在轮到她讲她自己的故事了。她开始描述一次晚会，也许她们都被邀请参加了。她穿着一件酒红色的织锦夜礼服，后来换成一件黑色天鹅绒的，她们都认为不错。她选择了一条珍珠项链作搭配，其他人则商量着摆桌子。她们一致同意用名贵的罗森塔尔瓷器，而对于应该用金器还是银器有些争论，但这还是被解决了。然后她们又讨论到当晚的高潮——菜单，她们想像着吸入那诱人的香气。屋门就在这时突然被踢开了："滚出来，快给我滚出来！"德国人咆哮着。我们被赶到广场上，那个晚会的梦想破灭得无影无踪。

一天早上我们跑步去接受点名，脾气暴躁的女看守按照德国人的命令吼叫着让我们去广场"甄别"。在那里决定谁会被带走强迫劳动，谁会被送进焚尸炉。我一边跑着，一边祈祷我们不要被分开，就像3个人一块儿离开屋子一样，我们也能一块儿回去。1944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德国人已经知道他们在前线的形势非常糟糕，便把怒气都发泄在我们身上。集中营的规矩一天比一天严，他们每天都把病人送到病号区。一天哈娅发了高烧，也被他们送去了。

在女人中间，每一条消息或谣言传播得都像野火一样快。现在她们说，病号区所有的女人第二天都要被送到焚尸炉。我悲伤地哭泣着，哈娅把我的心带走了。但我还是难以相信这条传言，我试图安慰自己，祈祷这永





远也不会在哈娅身上发生。妹妹去了病号区，现在只剩下我和家里的小宝见阿达列了。我们总是宠着小妹妹，照顾她——也许这就是她没有我们强壮的原因。她身体虚弱，在漫长而痛苦的点名中我和哈娅都会扶助她。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关心她了。

营地里到处是乱跑的人，惊声尖叫着，当然还有紧张的期待。咆哮声提高八度，残酷的命令伴随着诅咒声、棍棒声，枪托的殴打把几千个女人和女孩子赶进了一间屋子。在拥挤中我和阿达列拉着的手被冲开了，我回头去找她，突然头上挨了几下。再回过头时，阿达列丢了。

她们就这样离开了我。现在我的两个妹妹都不在身边了，我只有孤身一人了。我还剩下什么呢？我哭了起来。骚动平息后大约1小时，我们跑去点名。他们点完人数后没有命令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屋。在棍棒的殴打下和拥挤中，我们又排成5列，被带出了奥斯威辛的围墙。

第六章

强迫劳动

姐妹们都不在身边，我只有孤身一人，我的内心再次内疚不已：我怎么能让他们拆开我们呢？队伍在向前进发，我满脑子里全是阿达列，我很担心她，不知她一个人如何照顾自己。队伍一直在前进，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也不在乎他们会带我到哪里去，对我做什么。

我知道我落了单，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奥斯威辛集中营更可怕的地方了。我们遵照命令继续前进。我的木鞋踩到泥里，陷了进去。现在我们这排是另5个人，陪伴我的不再是我思念的两个妹妹，而是我的表姐以斯帖，还有汉娜。汉娜是个肤色较深的漂亮姑娘，她曾经是我





哥哥什洛莫最好的朋友。

我盲目地走着。队伍拥挤不堪,但任何时候都必须严格地服从命令。他们禁止我们跨出队伍一步,哪怕一寸也不可以。我只能看到我前面一个人的木鞋,脚尖在鞋子里,脚跟露在外面,没穿袜子。这些木鞋是他们没收了我们自己的衣服和鞋以后发给我们的。沿着没铺砖石的坑洼的路一直朝前走,奥斯威辛的营房落在了身后,我们离那里越来越远了。

孤独的感觉令我特别难过,甚至无法思考。我们不停地行进,可越走情况就变得越困难,因为我们的木鞋陷进了泥里。

我们5人一排地走着,我不知道到底走了多远。他们让停的时候才能停,几百个妇女和年轻姑娘一起走着。有个党卫军军官清点了我们的人数,看到定额满了,就用枪把我们押上卡车,像对待牲口一样。卡车上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们就这样上路了。我们没有手表,也不知道卡车到底走了多远,更不知道哪里才是我们的目的地。穿过各式各样的城镇村庄,我们终于在一座废弃的大农场前停了下来。这里有时能听到远处的炮声,农场原先的主人为躲避俄国人早已逃到了后方。进了庭院,队伍被命令停下。我们排好队让他们清点人数,然后我们被打发到谷仓、干草棚之类的房子里,这就是我们过夜的地方了。监督我们的党卫军连同他们的

狗一起住进了农民的屋子。

我们在干草棚里挤作一堆躺在稻草上。刚才点名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这儿，木鞋上粘着的雪化在上面，很潮湿。每人只发了一条薄得像被单一样的毯子，我们不得不抱在一起，希望能暖和一些。一条被单不足以让我们暖和，但几张叠起来，再加上我们抱在一起，热量就会增加一点了。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寒风刺骨。我闭上眼睛，看到母亲就站在面前，感觉非常真实。我回想起他们强行带走她的情景，知道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如果她幸运地逃过这一劫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话，我会怎么做呢？我怎能看着她承受这种非人的折磨呢？如此想来她解脱了反倒好。我就这么迷迷糊糊地想着——我的思想被扭曲得多么可怕啊！我想到我的妹妹们，她们在什么地方？在做些什么？我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天没亮，他们就把我们喊起来。我们又照例排队站好，5人一行，等着点名。但这次人数不对，有几个女人不见了。党卫军军官又数了一遍，还是发现人少了。我们站在那里被数了一遍又一遍——人数必须得吻合，一个也不能少！德国人回到干草棚，用刺刀扎进高高的草垛检查，几个惊恐万分的女人就这样被找到了。她们受了伤，痛得哭出声来，还有些忍着疼就是不出来，最后便葬身在草垛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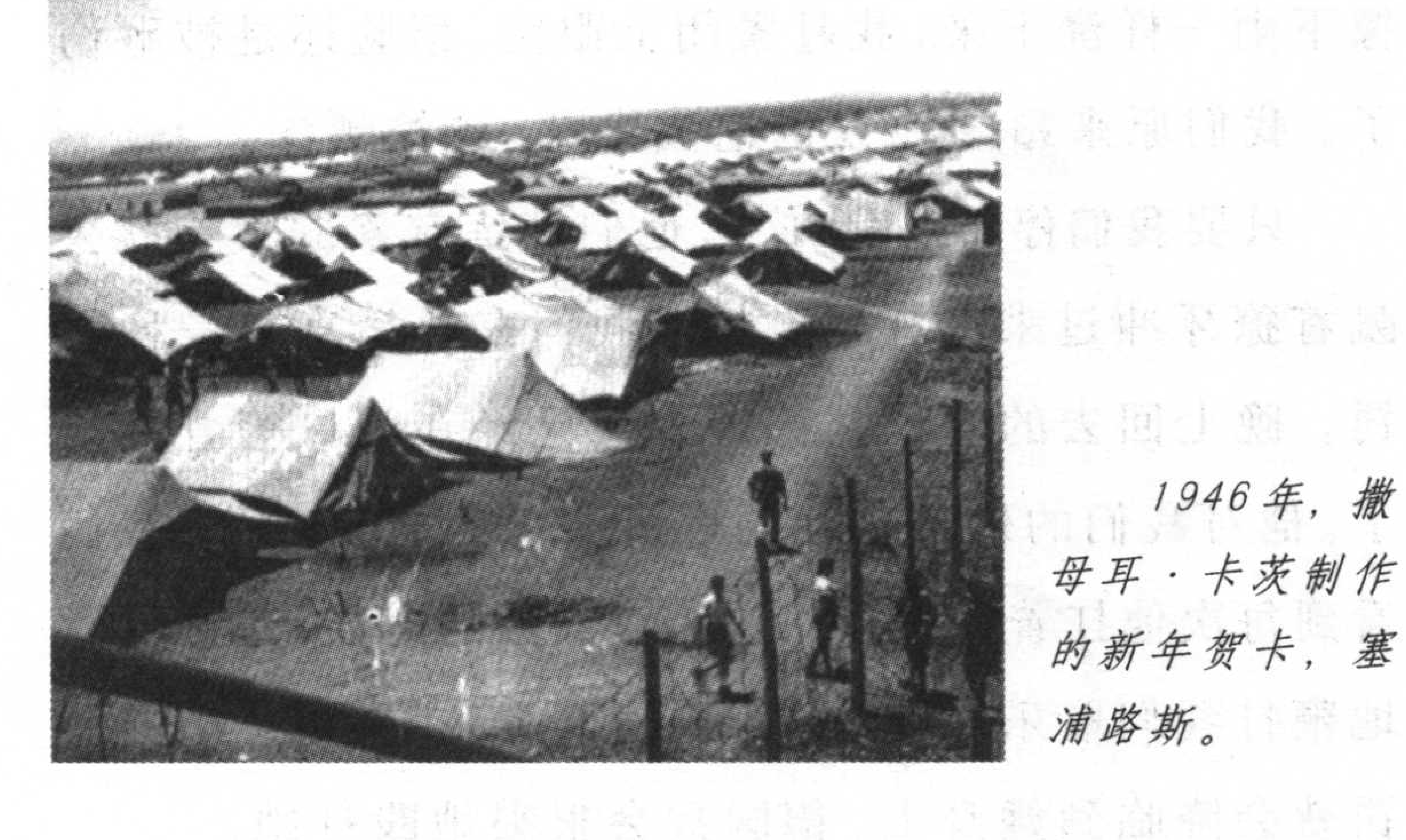
每天早晨都会少几个人。我看到有些人躺在干草棚





门口的雪里。她们的身体非常虚弱，不肯再走了。我告诉她们必须起来继续行进，否则会被枪毙的，可她们冻僵的脚已经站不起来了。我们对视着，然后无言地离开了。也许这样的事情明天就会发生在我身上。有一天我看到萨斯伯格家的3个女孩儿，过去我们家跟他们家关系很好。德国人命令出发了，她们还无力地躺在地上，只剩眼睛里还有一点活气。她们哀伤地看着我，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想到她们身边去，跟她们说些话。但还没迈出步子，鞭子就抽到了我身上，我被迫回到队伍里。战争结束后我回去时，他们家惟一幸存下来的小弟弟伊则·萨斯伯格来问我他姐姐的事。他听说我曾经跟她们在一起，便追问我一切关于她们的信息。可我怎么能告诉他那可怕的事实呢？他对我说他已经准备好去巴勒斯坦，现在只等姐姐们回来，或者至少打听到她们的下落才会动身，所以一切都看我的回答了。我实在没有勇气告诉他她们当时真实的状况，最后对他说我们停留时我曾经看到她们坐着，像所有其他的累了的人一样，然后就再没有见到她们了。这话至少有一半是真的。

人数一直在减少，每次点名时我都会看到那些不在了的人空下的位置，因为每次出发前我们必须5人一排5人一排站好。这也令我们得知到底谁活了下来。那是欧洲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很高兴白天很短——白天越短，我们步行的时间也就相应缩短。



1946年，撒母耳·卡茨制作的新年贺卡，塞浦路斯。

一天，我们行进了几个小时后，在一片开阔地上的另一座废弃农场前停下了。这里附近没有任何城镇村庄。农场主和其他人一样为躲避俄国人逃走了。一个德国人荷枪实弹站在门口，一眼看上去，他就像个怪物——冷酷的脸，下巴突出。他非常生气，怪我们行军太慢让他等了这么久。他清点了人数，叫我们去谷仓、畜舍这些地方住，他们自己则带着狗一起在屋里住。第二天早晨点名后，没有再找少了的人，我们就出了门，这次是向相反的方向走去。走了大约1小时，就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起先我们以为听到的是雷声，但我们越走声音越近，才明白那是俄国人的炮声。

我们来到一个废弃的地方，沿着地上一条线站齐，他们便命令我们挖战壕。我们必须很仔细地按照他们的





标准去挖：坑宽4米，深4.5米。他们给了我一个镐头，可我几乎拿不动。第一镐下去，冰碴混着泥土扑头盖脸像下雨一样浇下来，我赶紧闭上眼睛，但脸还是被砸伤了。我们原来站的地方也挖成战壕，越挖越深。

只要我们停下来歇口气，他们训练有素的狼狗就会龇着獠牙冲过来。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惩罚。晚上回去的时候，德国士兵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他对我们的残酷比他的职责要求的还要过分。我们看到每次他扛着枪站在门口清点人数的时候，都会随意地鞭打我们取乐。如果有人胆敢瞪他一眼，更严厉的惩罚就会降临到她身上，德国兵会狠狠地殴打她。

我们每天早晨出工时这种事都会发生，晚上做完苦力回来也有这样一番“款待”。我们每次回来都几乎要冻僵，累得筋疲力尽，然后被安排到草垛、畜棚——除了房子以外的一切空地方去，我们把干草铺到地上睡在上面。如果不是到了这里，我绝不会相信我居然会向往奥斯威辛的生活，但事实如此。如今我真不知道如何去享受我在那种地方所享受的“幸福”。

幸福和集中营——多么不相关的联系！每天早晨我们从草堆上起来，迅速排好队让他们清点人数。在地里工作时，我就穿一条奥斯威辛发的夏裙。工作很艰苦，可是跟其他人一样，我根本没有力气干活儿。一个党卫军士兵带着一条训练有素的狼狗就能监督几十个女人。

当德国人走远的时候，我们会让一个人站岗，其他人赶快爬到沟里去。我们互相拥抱，或者跺脚让血液循环，这样就能暖和一点。在这艰难的时刻，我常一个人出神——我敢肯定全世界都没人知道我工作得多么艰难。夜晚是最痛苦的。我夜里都做着挖战壕的梦，好像白天工作得还不够似的。我还梦见党卫军监督着我们，用枪逼着我们干得再快些——即使是严寒啮骨，我也会浑身大汗地从噩梦中醒来。

战争结束以后，我到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寻找当初做苦力的地方。我这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一部庞大的机器上一个小小的零件而已。不仅是我一个人在做苦力，跟我一块儿干活的女人也不是惟一的一组，成千上万的男女都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挖战壕，用来防备苏军的坦克。

一天夜里，我在草垛上辗转反侧，怕自己会沉沉睡去。我是很想休息一下，可那样的噩梦又吓得我不敢入眠。忽然我听到有人说话。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但他们一会儿靠近了一些，一会儿又离得远了些。好奇心驱使着我，我留神听着，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发出的声音。当它再一次靠近的时候，我侧着耳朵听出是广播的声音，是在我们睡觉的干草棚外巡逻的岗哨的收音机发出的。

我坐起身来，竖起耳朵听着。声音离我更近些的时





候，我听清了广播里那可恨的德国人的行军。我很震惊地听到他们用德语喊的口号："胜利，胜利，德意志高于一切！"[1]

我推了推睡在身边的女人，她们也说听到了同样的内容。直到这时我才确信，我所听到的一切不是我的幻觉，而是真实的。

如果我们听到的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有希望了，在淹没我们的沉沉黑暗中终于有了一丝曙光。我们一起听着，广播里面播放着军乐，还有德军的行军声，这一切时常被煽情的演讲打断："对全体士兵的重要通知……我们的军队正在按计划撤退，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的军队在按计划撤退。"通知还呼吁所有的德国人报名参军，为元首和第三帝国而战，为元首和第三帝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又听到了那种狂热的口号声："胜利！胜利！"我们所听到的一切都令人欢欣鼓舞。我们拥抱在一起，互相亲吻。我们终于等来了希望，看到了一线光明，只要能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得救。

我们清醒地躺着，好像是在正午一样，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忽然之间，我们像是得到什么命令，都从稻草上站起来，开始充满激情地唱《希望之歌》。

可我们的快乐消失得很快。草垛的门被野蛮地踢

①纳粹德国的国歌。

开，执勤的士兵。那披着人皮的野兽，眼里燃烧着仇恨的目光，疯狂地殴打我们，他残忍地鞭打我们的头和瘦弱的身体。他离开干草棚的时候，我们都躺在草上呻吟着，疼得哭出声来。我只有一条胳膊受了点轻伤，但那个时候我以为整条手臂都断了，因为我被狠狠抽了一鞭子。我们安慰那些受伤更严重的人，撕开被单帮她们包扎伤口。我们非常疼，但是很激动，而且充满了希望。

那“伟大”的德国，妄图用鲜血和暴力来征服整个世界的帝国——那个显赫一时的德国，已经日薄西山了！他们离最终的崩溃越来越近了！我们从他们自己人那里从他们的语言中听到了这个消息。

第二天，我们在斥骂和头上飞过的“咻咻”的鞭子声中起床了。我们只休息了几个小时，因为根本没法睡着。照例又是排队清点人数，然后开始工作。工作跟以前的一样，但我们跟以前不同了，我们再也不会毫无希望了。自从那夜听到了广播，得知德国人和他们的军队即将崩溃的消息，我们就充满了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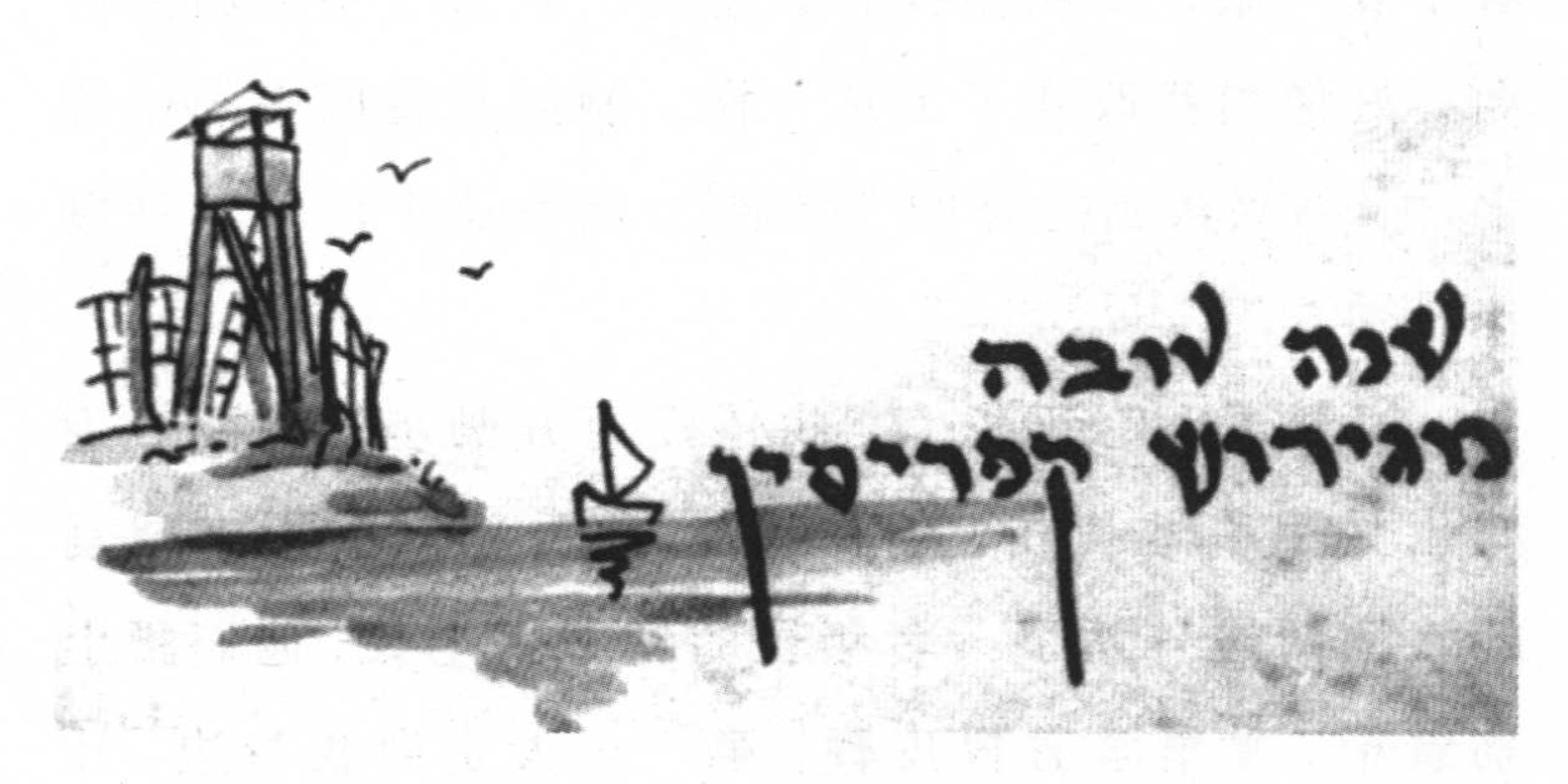


第七章

怠工之惩

我们从地里干完活儿回来，但这天他们不再允许我们进干草棚在稻草上休息了。这次一个党卫军士兵站在门口，带我们到以前的马厩去。他们还是命令我们5个人站一排，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我看得出来德国人很生气，也很紧张。肯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情况发生了。

我们仍旧排好长队，我所在的那排离马厩还有一段距离。我向马厩望去，看见厩门不时会开一下，一个女人的躯体就会被扔出来。她们被扔到雪地上，好像在那里歇了一会儿，然后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站起来。凭直觉



1946年，“冬营”，塞浦路斯。

我们预感到如果还想活命的话就得尽快站起来。后来又有个姑娘被扔了出来，但她没能从厚厚的雪里站起来，而是被埋在那里。在她倒下的地方，一摊鲜血染红了周围的白雪。

如果我早一点闭上眼睛就不会看到这样恐怖的景象了。可即使我闭上了眼睛，那些令人心碎的哭声和恐怖的喊叫还是会钻进我的耳朵。我的脑子几乎要被这样的声音刺穿，我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听不下去了，一切都好像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一样。我恐怕有点神经失常，觉得让该来的折磨早点来，也许还好过这样痛苦的等待。只要能不再听到那撕心裂肺的哭叫，我根本不在乎我自己是否能活得下去，我觉得自己再多听一点就要崩溃了。我离开了我所在的5人排，当时还没有轮到这排进去被折磨。我上去跟前面的一个姑娘换位置，她





看了我一眼，不明白我怎么想的，然后飞快地站到后面，好像怕我改变了主意一样。她站在我原来的位置上，很高兴得到这样的“缓刑”，因为这个位置离马厩比较远。

门开了，轮到我了。我还没迈开脚步，就被党卫军士兵粗鲁地拽住，推了进去。我看见以前用来喂马的水槽两边各站了一名年轻的党卫军士兵，他们腰上别着枪，手里拿着根皮鞭。第一个人走到我身边，让我撩起裙子，露出后背，双手推住水槽。突然，皮鞭狠狠地抽在我皮包骨头的身上，我痛得几乎失去了知觉。还没等我喘过气来，另一个士兵的鞭子又来了，比第一下毫不逊色。虽然他们从虐待我们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但他们无法连打两下，因为每一次鞭打都必须竭尽全力。

第一下鞭打让我失去了知觉，那种感觉难以言表，像是猝然昏厥。第二下皮鞭抽到我身上的时候，我的牙齿直打战，我咬紧嘴唇，能够尝到血的咸味。但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出声，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哭喊。我开始数数，舔着嘴唇上的血一直往下数，三，四，……八……我觉得自己好像解脱了一样，什么也感觉不到了。这孱弱的身体似乎已不再是我的，背上的血肉也丝毫不觉得疼。我继续数数，感觉很奇怪，好像我的灵魂脱离了肉体在数数一样……十二，十三……突然我感到自己飞了

起来，他们把我扔到了门外。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在空中轻飘飘的，似乎过了很久才落到雪地上。

我躺在雪上，觉得自己开始呼吸。我很吃惊——我居然还活着。接着我就深深地感到自豪：那群野兽那样折磨我，但我没有哭也没有叫，更没有求他们停手。我没有让他们得到折磨人的快感。这25鞭是他们对我们怠工的惩罚，因为我们给“帝国的事业”造成了损害。

那是什么“损害”呢？时值隆冬，我们为严寒所苦，几乎不能忍受，大家都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是就尽可能生活得快活点儿。我们从床单角上撕下一些小块的布，然后把这些小布片放到最敏感的部位，那也是严寒伤害得最厉害的部位——乳头和下身。因此我们招致了这场恐怖的惩罚——25鞭。

许多年以后我又回忆起当时的做法，我为什么站到队伍前面去挨打呢？这个举措多么荒谬啊！后面有些人根本就没挨鞭子。为什么呢？我想这不是我自己主动去挨鞭打，而是一种内在的无法控制的力量促使我这样做的。

我们无声地承受着折磨，安慰自己说他们的残忍是因为绝望——他们被困在现在的形势下，绝望而愤怒，只能通过这样的酷刑来发泄了。他们将来覆灭时我们一定很兴奋，这就是我们为将来的兴奋所付出的代价。只





有这样想，我们才能够恢复起来，坚持下去。我们带着伤痛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天，然后离开了营地，又开始行进，但不知目的地在哪儿。一些党卫军老兵看管着我们，他们穿着制服，但已经老得上不了战场了。

现在，一个德国人带着一条经过训练的狼狗看管我们。他们监督着行军过程中几百女人的秩序。我们穿着木鞋，在小路上慢慢行进着，我们路过果园，葡萄园，可爱的乡间小屋和美丽的花园，渴望逃跑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了。一个姑娘逃离队伍的时候被发现，当场就被击毙。每当有人想逃跑时总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行军在继续，但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清点人数了，有些人体力不支倒在雪地里，再也站不起来，即使我们有心去帮她们，也没有力气去扶她们一把了。人数每天都在减少。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吃，幸运的是上帝送来一些飘舞的雪花，我双手抓住它们，塞进嘴里。雪花缓解了我的干渴，也稍微减轻了饥肠辘辘的痛苦。

大片大片的雪花像洁白的羽毛一样漫天飞舞，粘在我们的鞋跟上。鞋跟越来越高，行军也慢了下来，过了一两天，一辆马车在我们附近停了下来；驾车的看起来是个年长的农民。他起身给我们每人拿来几个跟核桃差不多大的马铃薯，大概有七八个，还没有剥皮。他们管这种马铃薯叫“fel kartoffel”，上面覆盖着马车里的干草和粪便。我们欣喜若狂地吃了这些小马铃薯，连它

们的皮还有皮上的干草和粪便都吃了下去。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美味佳肴啊。我们很慢很慢地咀嚼着，尽可能长时间地享受这样的美食。这个农民不知道我们是多么衷心感谢他的善心呢！



第八章

逃离死亡行军

我们连续走了8天，滴水未进。有传言说如果联军决定轰炸柏林摧毁德国首都的话，我们将被带到柏林作为人质。(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成千上万参加“死亡行军”的人之一。)

时间一天天过去，情况变得更加恶劣，我们的生活一点变化也没有。许多人在路上跌倒了，冻僵了，有些人坐下来等待生命终结，他们就这样解脱了。许多人绝望了，觉得生命已不值得珍惜，便不再挣扎求生。我的表姐以斯帖，我哥哥的朋友汉娜，还有我，仍在继续行进。白天我们以蜗牛的速度前进，天色将晚的时候就在

村庄或者废弃的农舍里过夜。每当到达过夜的地方，还有最后一丝气力的女人就抢在前面进去，根本顾不上那些跌倒在路边的已经虚弱得无法再走一步了的人。抢在前面的人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先到畜舍、谷仓或马舍里去。她们进去以后，就拼尽最后的力气走到离门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因为夜里门总是关不严，冷风混合着雪花从门底下刮进来。

这样苦痛的生活日复一日，我们甚至都不能思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每天我都会反复提醒自己是星期几，惟恐忘了，能保持头脑清醒极其不易。我仍是饥肠辘辘，天气也依旧寒冷。我们行进的天数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在数，这已经是第8天了……

我前面那排5个人都是我的同乡，我认识其中一个，她父母开一家面包店，我每天从学校回家的路上都经过那家店。新出炉面包的香味曾经是我所钟爱的，现在也是。她的名字叫奥尔加，但亲友们都叫她“乌莉”。她站在那排最左边，我就在她后面。她曾经被称为我们的“市花”，有一头金发和湛蓝的眼睛，身材挺拔，她常常微笑着，一笑就露出了两颊的酒窝，她的微笑十分令人开心。她是个幽默的热心人，很容易成为朋友，到哪里都很受欢迎。

我发现看管我们的德国人常常会走到她身边，跟她





所在的5人小组一起走。他是我们惟一的看守，只有一条经过训练的狗听他使唤，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所以不在军队动员令范围之列，像他这样年纪的德国人就被派来看管我们。在我们前面是奥尔加。有一次我看到这个德国人拿出三明治以后，分成两半，把一半给了奥尔加。我觉得这简直不可置信，他们的食物也是严格按定量分配的，而他居然跟一个犹太人分享！他尽可能隐秘地给她食物，但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可他继续这么做，几乎每天都给她三明治。他在用生命冒险。他以为除了那条狗不会有其他德国人看到，而狗是不会泄露秘密的。

奥尔加跟这个德国人一起走，好像他们是旧相识一样。他们像朋友一样坦诚地交谈，尽管我就跟在他们后面。漫无目的的行军单调无聊，他们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因为有风，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只有些断断续续的词吹到我的耳朵里，但我还是听出来了：她和她的意志力震撼了他。他们的对话非常奇异——一个犹太人和一个执行任务的德国人之间的真诚交谈。这回我索性开始认认真真地偷听，我竖起耳朵，想努力听清每一句话。不巧的是起了一阵风，我只能听到模模糊糊的只言片语。

风停了以后，我听到他用一种父亲般慈爱的声调和缓地跟她交谈。有句话我听得很清楚，他说："……我

不理解你，你为什么跟其他人一起继续走呢？你知道我们要带你们去哪里吗？你走到哪里才是终点呢？”我的好奇心被大大激起来。风停了，只听见我们在雪地上行走的声音。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觉得你衣服这样单薄，没有任何食物，还能走多久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听到他又开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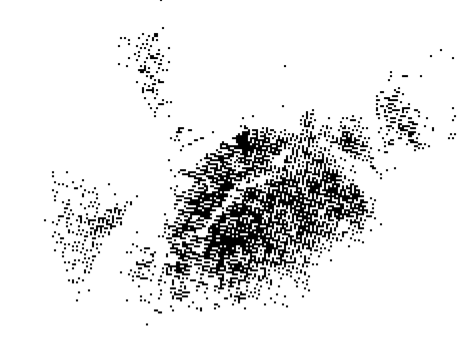
“……你为什么不逃走呢？”他说，“我保证，如果你逃跑的话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离开。即使我不得不开枪，我也会等你走远了以后冲天上放两枪。相信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怎么可能呢？他说的是真的吗？当我满腹狐疑反复思量他的话的时候，我又听到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奥得河[1]了，离这里只有一小段距离。这么冷的天气，河面已经结冰了，你可以步行过河，就像散步一样。只要到了河对岸，你就自由了。那里是俄国人控制的。”

我暗自寻思这不可能是真的，德国人怎么可能告诉犹太人这些呢？我看着乌莉的头，她比我高一点，我刚好能够看到她的反应。她在摇头，她告诉他她不会逃跑的。他问她为什么，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她已

① 中欧东部河流，起源于东苏台德山脉的奥得山脉，注入波罗的海，全长 866 公里。





经被吓怕了，一个人哪里也不敢去了。

我听着德国人的回答，相信他说的是事实："……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你为什么还继续走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我听到他下面说的话时，越发相信他了。他说："其实我也乐意跟你一起走，很久以来我一直很厌恶这场战争，但我也很清楚现在俄国人看到我穿的制服，肯定一句话也不用问就毫不迟疑地枪毙我。"如果说以前我对他的话还有所怀疑，或者以为是幻觉的话，现在我也改变了主意。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我把这些话都告诉了以斯帖和汉娜。我们觉得光明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要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了。那个德国人看到奥尔加的迟疑不决时曾对她说："你还怕失去什么呢？"是的，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我们只要渡过河就能自由了，这简直像个梦。顷刻之间我们3个人都精神振奋，充满了力量，好像在过去8天里一点都没有挨饿一样。我的心完全被欢乐涨满，丝毫也感觉不到行军的艰苦和气候的寒冷了。我们曾经听过很多姑娘逃跑的传言，她们在穿过农民的花园时爬到栅栏底下，几乎就要顺利逃脱了，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她们不是被士兵或农民发现给送了回来，就是被当场击毙。我们决定趁着还有精力的时候行动，于是立即开始计划如何逃脱。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我们的犹太名字改成雅利安名字。我的表姐以斯帖，我们中间最

大的一个，改成了“奥尔加”；汉娜改成“安娜”；我的名字叫做“莉莉”。不管以后会不会用到，我们开始以新名字互相称呼，这样就可以熟悉，并且毫不犹豫地反应出来是在叫自己。我们想到过河以前也许会遇到盘问我们身份的人，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如何才能过河，途中又会遇到些什么人。我们一边用新名字互相称呼，一边开始编故事，伪造自己的身份和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编了个自传，“奥尔加”说故事，我们添补一些。我们一字一句地拼凑，直到最后大家都觉得故事说得完整而且合情合理了。

故事是这样的：我们是三个效忠于元首的匈牙利法西斯，俄国人占领我们的地区后我们扔下了一切逃跑了。（我们需要这样说以解释身上衣衫褴褛的惨状——我们还穿着奥斯威辛发的衣服，裹着条毯子呢。我们从毯子上撕了块碎布当做方巾，把剃过的头发包起来。前额的头发已经长出了一点，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些小卷露在外面。）在漫长的逃亡途中很难找地方睡觉，有一天不得不随便找了间房子过夜。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自己被洗劫一空，衣服财物都没有了。我们身无分文，几乎无法继续前进了。

我们尽量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考虑到。如果有人问我们，我们该怎么回答呢？最后决定，只让奥尔加一个人讲，其他人保持沉默。我们都会德语，能听懂每





一个单词，但是却只能说一点点。我们选择让奥尔加讲，因为她曾经在德国人的学校里上学，德语比较好。我们信任奥尔加的智慧、应变能力和主动性。我们不敢说话也因为我们的德语有一点受意第绪语影响。保持沉默对我们来说也同样重要。这是我们惟一可以避免七嘴八舌的办法，答话不一致，可能让我们的计划功亏一篑。

从我们开始准备逃脱计划时起，我们就再也察觉不到干裂的嘴唇在寒冷中的刺痛了，也不再觉得饥肠辘辘。我们有了目标，更重要的是有了希望。我们沉浸在自己的计划中，行军时一直用新名字互相称呼。晚上停止行军的时候，我们才发觉一天已经过去了。这次不同往日，我们3个人仔细辨认了一下到底到了什么地方。我们进了农场以后，估算了一下到大路的距离。院子周围有两道栅栏，一道是高高的带铁丝刺的外栏，另一道是低一点的普通的木栅栏。就像以往进过夜地点时一样，所有的女人都争取到谷仓靠里面一点的地方去休息。我们按照计划行事，仔细地观察了从大路到门，到谷仓的每一个细节，牢记心中，最后才进去。德国人在进门的地方放了几只桶，便于晚上我们方便。他们锁上门然后就去农舍休息了。这次我们3个人表现得非常“礼貌”。我们站在一边，等其他所有人都进去以后才进去。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好离门近一点。德国人从

外面把一根木棒插到两只铁环里面就算锁了门了。两只铁环一只在墙上，一只在门上。我见了暗自高兴。

他们没有用锁把我们锁在里面，真是我们的幸运。进干草棚的时候，大家都累得动弹不得了，大多数人一进门就瘫倒在干草上，还有点力气的人就挤到了干草棚里面的部分。整个晚上没有片刻的安静，咳嗽声此起彼伏，没人能睡安稳。从噩梦中醒来的人常常很迷惑，搞不清楚自己身处何地。我们躺在门口附近，她们夜里起身方便用的木桶就在我们旁边，气味刺鼻难闻。我被熏得简直喘不过气来，于是用手捂住鼻子。她们很惊讶地看着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在这么冷的天还睡得离门口那么近。大家从门口带进来的雪也逐渐化了，跟泥和在一起形成的水坑越来越大。她们很奇怪我们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找个好点的地方歇息。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这么固执，不跟其他人学，我还听到有人说我们以为我们是谁，好像跟其他人一起降低了我们的身份一样。她们很害怕地说："如果她们开门逃跑了怎么办？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德国人和他们嗜血的狗会迁怒于我们的。"一个年长的看起来病弱的女人爬到我们身边——她没有生气，说话很和蔼。她请求我们体谅大家一点，不要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们的意志必须十分坚强，这样才能把这些话都当做耳旁风，不做任何反应。等眼睛逐渐适应了棚内的黑暗，辨清了墙上挂的农家





的工具箱后，我们取出一把很大的锤子和一盘绳子——这些东西可真是宝贝啊——然后坐在地上把绳子紧紧地绕在木鞋上，这样走在路上就不会掉了。

我们心里很清楚，时间是至关紧要的，我们必须趁着夜幕的掩护迅速行动起来。临走之前我想起邻家的几个女孩，于是爬到她们身边，贴着大姐的耳朵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她。我告诉她说，如果她们没听到枪声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已经成功了，我们会在路上等她们。奥尔加从她躺的地方站起身来，立即就引起身后一片含糊的窃窃私语——我们在门口休息已经让很多女人觉得不安了。我们从工具箱里拿出锤子，用尽全力去砸门上的木栅。万籁俱寂，门上的铰链发出“吱呀”的尖锐声音——门开了，外面正在下雪。我的心像在擂鼓一样跳着，女人们都醒着，很害怕但是保持沉默。我们走到门口，我以为我们会看到德国人看守还有他的狗，可那只不过是我的想像罢了。我仿佛还听到了枪声，但其实也只是耳鸣而已。我们3个人在门口一声不响地站着，没有迈出一步。大家都没有说话，但那种心情我懂。3个人中我最小，浑身发抖着缓缓地迈出了我的脚。雪踩在脚底下的声音很刺耳。如果我们现在退回去还不算晚，我们还来得及收回迈出的一步。什么声音都没有，德国人不在，也不见他的狗。我缓缓地拖动另外一只脚，踏在雪上，又是一阵簌簌的刺耳声音……

我的双脚都已经在干草棚外了。四周寂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我的后背紧贴着墙，缓慢地移动着，很小心地迈出一步，然后停住——这停顿的几秒钟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永恒。那只狗随时都会龇着獠牙扑上来，把我撕成碎片。我听到枪声，好像子弹就是向我飞过来的，我想一切都完了。我僵在那里，等待着生命终结，但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只是我想像中的枪声。我的后背抵在墙上，没有枪声，也没有恶狗，我松了一口气，回过头来。奥尔加和安娜紧跟在我身后，也是后背紧抵在干草棚的墙上。我们这样缓缓地移动着，走到了墙边。走过这道墙就没有什么可以掩护我们了，我们随时可能被发现。幸运的是四周都很黑。那道低矮的栅栏就在一小段距离



1945 年，“夏营”，塞浦路斯。





以外，能看得到。但是必须穿过农舍前的小路才能到栅栏，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往前走。我一边走一边发抖，不过终于越过了靠里边的低矮的栅栏，这没费什么劲。翻越外面的那道栅栏就困难得多了，因为那是用有倒刺的铁丝制成的。不过我们还是爬过去了。尽管浑身都被剐破了，但谁会介意这点小伤呢？我们都很有成就感，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已经逃离农场了。在雪地里走了一段以后，我们就到了大路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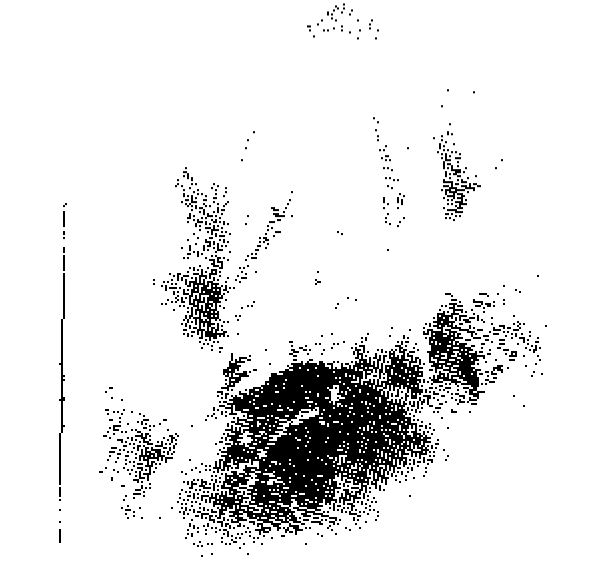
我们慢慢地，一步步地穿过了马路。天气寒冷，四周一片漆黑。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意识到现在只有我们3个人了，不再是5人一排在行军了。我们终于自由了！

我们互相亲吻，拥抱在一起，为自己终于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而欢呼雀跃。我们跳动着，这样能暖和一点。我们互相凝视，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出来了。当我们确认已经逃离死亡行军的队伍时喜极而泣，这泪水里既有喜悦也有悲伤。我为我的家、为哥哥和妹妹哭泣。谁知道他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还有谁活着吗？我想起我对邻家的姐妹说的话，我说过要等她们。于是我们就站在那里等。时间对我们来说异常珍贵，我们必须充分利用黑暗多赶些路。在寒冷与恐惧之中，我们都在瑟瑟发抖。任何一点微小的声音都让我们惶惶不安，惟恐是德国士兵来抓我们了。我们知道她们

姐妹中有一个人的腿冻伤了，肿胀疼痛，也许她们不愿意扔下她一个人，就没有跟在我们后面逃出来。时间紧迫，等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看到一个路标牌，就走过去仔细看看，可是没有一个方向标的是奥得河。这条河是我们逃生的关键，我们朝思暮想的就是滑过结冰的河面，到俄国人控制的地方，然后就真正自由了，可是现在我们迷路了。路牌上有不同的村庄的名字，还有到那里的距离。我们选择了最近的一个。我们必须得在天亮以前到有人烟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样子实在很凄惨。最近的村庄名叫台门道夫，在9公里之外，还有一条横越森林的近路，大概只有3公里远。我就像已经到达了这个地方一样高兴，但随即又黯然神伤。我想到了父母，还想到那些心爱的人，也许他们也像我一样找到了逃生之路，都还活着，我充满了希望。又想到我们逃跑后留下的那些女人，她们还在向着死亡继续行军吗？

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在过早的庆贺上浪费时间。真正的自由还很远，要到达安全的避难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放松。大家意见一致，都愿意走那条近路。从森林里面走是最佳线路，因为那里是我们最好的藏身之处。穿过大路，不一会儿就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树木，我们走得越远，树木就越密集。天上落下的雪花让我们充饥解渴，但是也让我们举步维艰。大雪遮住了林中的小径，让我们难以寻找。我们摸索着前





进，就像小时候童子军宿营一样。我们看到树行中间的距离比较大，就沿着走下去，但是没走多远树木中间就没有那么大的间隙了。还是没找到正确的路。第一次我们中间出现了分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找的方向是对的，可是到底路在哪里谁也说不准。

奥尔加指了一条路，可我们刚走了几步路就消失了。我们四处摸索，可还是不知去哪里。在雪中行走本来就很慢，我们还要小心地提防着周围任何一点响动。忽然，我听到附近有声音，然后是很重的树枝断裂的声音——堆满了雪的树枝断裂了，重重地落到了地上。我们迅速散开。我的心一下悬住了，所有的感官都调动起来，注意着每一处细微的声响，同时也努力辨认我们是否走对了路。

忽然听到有人说德语，我们赶紧收住脚步。听起来那好像是一句简短的暗号，但是没有人应声。我们的心狂跳不已，不知所措。如果我们不能对上他们的暗号，我们很快就会被重新抓起来，然后就必死无疑了。任何一点模糊的声音甚至鸟鸣都会让我的心跳出来。我们仍然沿着小路在树林中行走，也不知道方向是否正确。雪花还在飞扬，我们在寒冷与恐惧中饱受折磨。

尽管天气寒冷，长途跋涉还是让我浑身冒汗，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才能起身继续赶路。每当3个人中有一个累得坐到地上时，我们就集体停下来休息片刻。我坐

下来，环顾四周，心情很愉快。我们前面是一座小山，爬到山顶上应该就能看见林中小径，或是铺好的大路了。可我到了山顶却大失所望，根本没有什么路。我脚一软，整个人一起跌倒在树下的雪地上，雪直淹到我的下巴。我用力想拔出脚来，但怎么也拔不动。最后脚终于出来了，鞋子却还陷在里面。这只木鞋最终也没能拿出来，就这么埋在雪里了。我只剩下了一只鞋，用毯子上一块布片把裸露的脚裹起来以后继续行走。森林中如此艰苦的行走让我筋疲力尽，沮丧不已。

惟一让我聊以自慰的是，我确信在中欧没有特别大的原始森林，我们一定会走出这片林子的。雪粘在我们的木鞋上，越来越难迈开脚了。我们又饿又累，而且非常虚弱，常常要停下来休息。只要有人看起来走不下去了，我们就立即停下来休息。雪积在我剩下的那只木鞋底上，另外一只脚上就裹着破布。我走起路来就像一只瘸腿的鸭子。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把雪从鞋底除去，这样走起来容易一点。我还会平躺到雪上，以此来冷却我浑身的热汗。由于疲劳和虚弱，我在这样的天气里一直在出汗。我抓了一把雪塞到嘴里，慢慢地嚼着，又抓了一把放在发烧的额头上。不知道我是生了病还是疲劳过度，或者是两者兼有。奥尔加很生气，因为我们没有沿着她指的那条路走，这时候，安娜总会从中劝解，让我们两个都平静下来："再耐心一点，我们很快就要到达





村庄了。”

我们休息的时候，我又躺下，两手张开，闭上双眼。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我不禁揉了揉眼睛。眼前黑色的地平线变成了灰白色，好像还有一些高大的东西，在灰色的天空中忽然延伸出来。我觉得非常恐惧。我祈祷着，求老天不要让我这样，请让我保持神智清醒。我看到的是个十字架的尖顶吗？或者只是我的幻觉？我必须得保持理智。于是我对看到的一切视而不见，也没有对两个朋友讲。

我们停下来清理了一下脚上的积雪，然后继续往前走。很快又停下来休息。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着清冷的空气。我睁开眼睛后简直不敢相信——真的是一个十字架，从屋顶上直插到半空中去。

我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我让奥尔加和安娜向那个方向看去，然后告诉我看到了什么。她们几乎齐声说，看到一个十字架。我们喜出望外地看着那个方向。如果有十字架，就肯定有个教堂，如果那儿有教堂，就一定有村庄。我们开心极了，如果木鞋够好的话，我们简直要在雪上跳起舞来。很快就可以走出这片森林了。我们尽可能减少休息，满怀希望地认定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有人烟的地方了。下一次休息的时候，我们躺在地上，看到了灰色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还有房顶和教堂顶上的十字架。

第九章

在德国村庄

我们逃离行军、进入树林时，为找到可以藏身的掩蔽所而高兴。现在，我们高兴的是周围的树越来越稀疏，看来已经靠近树林的边缘了。但欢喜归欢喜，我们却也很担心：为我们提供掩蔽的树林就要到尽头了，现在路上每个人都能看见我们。越往前走，独立的房子越密集。走了没多久就来到了村庄。我们漫步在大街上——后来发现那是惟一的一条街，两边都有房子。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每栋房子，猜想谁住在那里，我们又应该把哪家的主人从睡梦中叫醒。有栋房子看起来特别奢华，我们肯定住在里面的人不会同意让我们进去





的，甚至还会被我们吓着。它隔壁是栋小房子，看上去很简陋。即使它的主人慷慨和善，大概也帮不了我们。我们只好继续玩孩子们玩的“找房子”游戏。但时间不等人，最后我们3人一致选中了同一栋房子。

我们重新戴好头上的方巾，用毯子裹在衣服上，准备好以后站在房门口。奥尔加敲敲门，我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Wer ist dort?”（谁在那儿？）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Wir flüchtlinge.”（我们是难民。）奥尔加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听见一把钥匙插进了锁里，门开了。电灯光照到我们脸上，使我们刹那间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警觉地打量着我们，然后说了句“Grüss Gott。”（上帝保佑你们。）并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表示欢迎。她的手拂过前额、下巴、右肩和左肩，然后合上双手，口中做着祷告。做完之后，她拘谨地对我们说：“难民，越来越多的难民，没完没了。该死的战争还在继续。”她不知道她提到“难民”这两个字是多么令我们兴奋。这大大鼓励了我们，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不经意间她让我们知道村里真有难民，我们并不是惟一的。她使我们觉得我们编造的经历和衣衫褴褛出现的原因都会被认为是可信的。她充满同情地看着我们每一个人，说她非常抱歉，因为家里已经住满了难民、亲戚和其他流离失所的人，没地方给我们住了。不过她保证为我们找个地方。



1943年，拉海尔为伪造的雅利安人身份证准备的照片。但她后来并没有用伪造的身份逃走。

那女人在头上戴上一块大大的羊毛方巾，让我们跟她走。我们跟着她穿过了马路，见她敲了敲对面邻居的窗户，喊道："玛利亚，玛利亚，快出来开门！又来新难民了！"我们轻轻地吁了口气，幸好还没人怀疑我们。她解下头巾披在头上，放开卷发。邻居也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做了个祷告，我们便跟着她进了温暖明亮的房子。我该怎么描述我那一刻温暖的感觉呢？在黑暗中呆了那么久，灯一照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还没有完全适应灯光，但觉得很舒适。我们走进去，现在头上有个屋顶了。那女人请我们坐到桌子边，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垫在我们脚下的砖头发出的暖气，这使我们僵硬的脚趾渐渐解冻，温暖传遍了全身。那个好心的女人不





停地关心我们，她把一块甜甜的圆面包放在桌上，还有喷香的黄油——我早已忘记黄油是什么样了，还有果酱和一大壶热咖啡。她离开了一会儿，奥尔加警告我们要慢点吃，尽管大家都非常饿，很难控制住自己不去狼吞虎咽那些诱人的食物。后来我们发现奥尔加是明智的，因为我们听说很多饿了很久的人一下吃得太多，活活被撑死了。

我们不拼命吃那些东西，也是怕引起那女人的怀疑。趁女人离开房间的机会，我们从脖子上摘下刻着奥斯威辛号码的皮圈，打开炉门扔进去。皮圈烧着了，我们赶快悄悄关上炉门，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奥尔加为她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暖手，看着那女人的眼睛讲述她的“我们的故事”，为什么没有衣服，没有钱。女人手撑着头仔细听着，不时摇摇头，注视我们的目光似乎分担着我们的哀愁。

我们坐在桌边慢慢地吃喝，那女人站起来，说要给我们准备晚上睡觉的床。奥尔加赶忙起来追上去说，我们非常感激她的招待，也非常高兴，但我们不能就穿着这身脏兮兮的衣服上她的床，至少得洗一洗。奥尔加的聪明才智在这里又一次体现出来了。我们看见那女人深信不疑，她离开屋子，回来时给我们带来了干净的衣服——宽松的衬衫和男裤。她戴着羊毛头巾，围裙兜里的钥匙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便这样充满精神地走出屋子，

叫我们跟上她。我们走到院子的另一端，上了两级台阶，进了一间小屋。屋子的窗和门靠得很近，正对着院子，可以从窗户里看见横穿村子的大路。

我们都很兴奋。那间本来供女仆住的小屋简直就成了我们的宫殿。女主人为我们搬来床和床垫。一等她围好头巾离开，我们就欢笑着拥抱在一块儿。我感觉很好，也更坚定了信心：我爱的人们也会像我一样设法安全地活下来了。在黑暗中，我们躺在床上，谈论着过去的经历，更主要的是明天会带来什么。重新回到房子里的感觉真好，我却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被赶出来的家。接着我甚至想到门会突然打开，德国人冲进来把我们抓走，或者直接把我们枪杀。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重新吃上正常的食物后，我的全身开始疼痛。我把疼痛的地方叫做水泡，因为它们像变形虫一样在我身上到处移动。它们的颜色由黄变红，迅速传遍了我的全身，从头到脚。我疼得要命，寸步难行，只能躺在床上，靠朋友们架起我的胳膊扶我去厕所。我不知道这是由什么引起的。也许是因为我的月经已经中断很长时间了，或者只是新陈代谢而已。我对村里发生的事情很好奇，但没法离开小屋。夜里我疼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只有到最后极度疲倦时才慢慢睡去。

“三个匈牙利难民！”“可爱的姑娘们！”“元首忠





诚的法西斯战士！”我在小憩中被这些叫喊声惊醒。我们的女主人把她的客人告诉了全村人。我们立刻穿上那女人给的大衬衫和男裤，而我们自己的衣服她已经烧了。这些衣服对我们饿得瘦骨嶙峋的身体来说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不得不用绳子系上。我躺在靠窗的床上，掀起一点窗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小小的院子里已经挤满了村民，每个人都带了面包、香肠和各种各样的熏肉，还有个女人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麦勒足普”，那是他们早餐喝的面汤。很快，我们的小屋里就堆满了村民们带来的礼物，活像一个杂货店。村民们已经听见隆隆的炮火声，知道他们很快也得卷铺盖离开。为了准备撤退，他们屠宰了所有的牲口，把肉做成香肠以便带走——现在也给了我们一点。

奥尔加戴好头巾，这使她好看得多，她的样子也不像犹太人。她离开屋子，接受村民的礼物。礼物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她热情地接下来，充满感激地微笑着向他们道谢。村民们一个接一个走出了院子，我从窗户里看见了一切，也听见他们说话，但假装什么也听不懂。这时我看见一个男人，他显然是从战场上受伤回来的，还拄着拐杖。他找来一帮没被征召上前线的男人，大多都是受了伤或年老的，告诉他们说战争非常激烈，前所未有，隆隆的炮声就能证明这一点。我听见他们谈论困难的局势，说在这种危急关头一定要提高警惕，对每个

来到村里的陌生人都要严加盘查。奥尔加回来后我把听到的告诉她，我们都很害怕。本来很高兴能够自由，没想到新的危险又降临了。每一个可疑的线索或是德国农民表示怀疑的一句话，都足以让他们杀死我们。那一整天我们都没离开屋子，不敢见村民，也不敢被他们看见。

下午来了一个年轻的俄国姑娘。她告诉我们她并不是村里惟一的一个，从战争开始时起，每家都有像她一样的年轻俄国人来工作。当德国人迅速推进到俄国的腹地时，他们把俄国战俘都集中起来，挑选出其中健壮的男女送到德国乡下劳动，以顶替被征召到前线的德国男人。他们叫其中的女人"娜塔莎"，那些男人他们则叫做"帕维尔"。德国人会在一块儿谈论他们的帕维尔和娜塔莎。这些俄国人常来看我们。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自己人，值得信赖，所以决定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都告诉他们，这样他们就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了。晚上收工后，他们来我们这里，我们拿出吃喝的东西款待他们。我们对他们说罗塞尼亚语，那是俄语的一种方言，我们和他们相互都能听懂。交谈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家都会唱很多同样的歌曲，便一同歌唱——我们用希伯来语，他们用俄语。我们的歌声唤起了内心的渴望，比如《伏尔加，伏尔加》、《黑眼睛》，还有其他的歌。他们知道他们的军队节节胜利，非常兴奋，隆隆的炮声告诉人





们，战线已经越来越近了。

一天，我们正欢快地唱着俄国歌曲，门开了，我们的德国女主人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吓呆了。奥尔加赶忙上前去搂住她的肩膀安抚她，使她镇定，又和她一道离开了屋子。奥尔加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那女人听见我们用俄语唱歌，吓得要命。但奥尔加告诉她我们在执行一项非常秘密的任务，她最好别跟村里任何人说，她这才稍稍平静下来。奥尔加又一次展示出她足智多谋的天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她都是值得信赖的。从此，我们每晚都在一块儿唱歌。每当我们请来俄国人，那女人就会进来看看听听，然后离开，但从不问问题，也不说一句话——她脸上的恐惧已经说明一切了。

“Наши танкисты едут!”（我们的坦克就要来了）可以听见报讯的声音。报信人用双手砰砰地敲着门，还用脚踢。那时还是凌晨，周围一片漆黑，我们全被喊声惊醒了。我从窗户向外望去，只见娜塔莎离开我们院子，跑向邻居家传播这一消息，就这样一家家跑着。第二天一早我们还躺在床上，向我们提供屋子的恩人垂头丧气走了进来，她的双眼哭得通红。她说我们也应该收拾必要的行李，因为村里的广播让村民准备好随时离开。

她通知了我们，便急匆匆离开了。我们很担心，不知该怎么办好。好不容易逃了出来，我们还能再次跟德

国人去柏林吗？可要是我们告诉那女人我们留下来不走，又肯定会引起她的怀疑，我们的性命就危险了。过了几小时，那女人回来了，极力躲开我们的目光。支支吾吾好半天，她告诉我们他们的马车已经装满了她家的人，他们都只带了必需的行李，她很抱歉没地方留给我们了。她一面表示深深的悲痛，一面让我们加入徒步行走的年轻人，马车上也没有那些人的地方。她补充说他们很遗憾不能带走很多值钱的东西，因为马车已经负载过重了。突然，奥尔加毫不迟疑地告诉她，我们非常感激她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很理解她现在的处境，但很可惜，我们不能走。

奥尔加的回答也让我们吃了一惊。她对那女人解释说我生着病，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否则我们会加入他们的行列的。可现在，她俩不能扔下我不管。我捋起袖子，给那女人看我胳膊上疼痛的地方，告诉她我全身都是这样。我说我同意两个伙伴跟他们一块儿走，但我自己是走不了了。那女人看了看，明白奥尔加和安娜不会扔下我的。她像往常一样划了个十字，就匆忙离开了我们，消失在夜色中。我们后来再没见过她。

那时候，我们憎恶的穿军装的家伙的数目却与日俱增。路上的交通有两个方向：村民们离开村子，而越来越多的部队驻扎进来。每个院子都成了军营，中心是炊事帐篷。我们的担心也在增加，因为不知道降临到我们





身上的又会是什么。我还生着病，村里的老百姓已经差不多走光了，只有一个老头来回走动，但没人注意他。

一天，我们院子篱笆的大门开了，我辨认出军靴的声音。我们脸色苍白，瑟瑟发抖，默默地对视着。我们知道门很快就会打开，一个德国人会进来打死我们。我的心跳得厉害，牙齿也格格作响。敲都没敲一下，门就开了，一个德国军官站在门口。他啪地一拍脚后跟，直视着我们每个人，用一声“嗨，希特勒”致意。我的心跳几乎停止。我们完了，我想。但那只举起致意的手突然指向了桌子，桌上全是村民送给我们的食物。他像是面对一大群听众一样动情地说：“你们再也不用吃施舍的食物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处在第三帝国的保护之下。你们为我们工作，作为回报，我们会保护你们。”军官又啪地一拍脚后跟，我们又听见一声“嗨，希特勒”，他便走了。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对视着对方同样困惑的眼睛，不敢相信刚刚听到的“美好”的事。但他确实说了，我们甚至没机会考虑这荒唐的处境，还有我们凭什么跟德国人一道为第三帝国工作。看来我们是“元首忠诚的法西斯战士”的传言也传进了他的耳中。

第二天，奥尔加和安娜去军营的炊事帐篷干活儿，我去了司令部。他们向我保证说，在那里各种各样的工作中，他们会为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尽管我身体不好。我走到门前，轻轻敲了敲，但里面嘈杂得很，没人听见。

我又等了一会儿，就打开门走了进去。当看见墙上挂着的一幅巨大的照片时，我停下了脚步。画中人直视着我的眼睛，比真人还大——是希特勒。我无法移动脚步，双脚就像钉在地板上一样。大厅里烟雾缭绕，我要去的那间办公室位于它的另一头。我看见士兵们坐在桌子周围，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我站在那儿，还是没人注意到我。我深吸一口气，尽量挺直身子，昂首穿过大厅。我的心跳得厉害，但每往前走一步，我就增加了一分自信。耳边传来他们的声音："看那姑娘"，"一个黑发美女"，"典型的匈牙利人"。我什么也不需要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乐于被认为是匈牙利人。以前我很自豪自己是捷克人，但这次却因被误认为匈牙利人而逃过一劫。通过这第一道测试后，我高兴地走到大厅的另一头，敲了敲军士长办公室的门。听到一声"进来"后，我走进了房间。就算我事先设想过一千次，也绝对想像不到他的办公室里等待我的是什么：我面前坐着个鬓发灰白的军官，他的双肘撑在桌上托着下巴，神情十分沮丧，然后他竟然哭了。我在一旁等着，他却继续低声哭泣。过了一会儿，他坐直了身子，擦干眼角的泪水，向我倾诉他的痛苦。他很担心柏林，那里每时每刻都在响着警报，而他的独生女和外孙就在那儿，不停地钻防空洞。形势令人绝望，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完这些，又接着抽泣起来。





这时我自己也哭出声来了。我的眼泪已经忍得太久，从不敢让它们流出来，而现在我也可以哭了。不是夜里在床上抱着枕头小声啜泣，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放声痛哭。我的眼泪像决堤一样流下脸颊。我是真有值得哭泣的事情的。

工作结束后我们互相讲述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我跟朋友们说了那个军官，她们也从士兵那儿听到，德国人是多么绝望，多么憎恶这场无休止的该死的战争。但使我们真正感到恐惧的是村里穿军装的人越来越多。路上挤满了载着村民和他们行李的马车。大多数马车被军队征用了，只有极少比较幸运的人还有马车。其他人只能推着他们的手推车，拖着行李蹒跚而行——最重要的是逃离日益逼近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方向，俄国坦克在不断推进。而我们处在真正的危险中——尽管俄国坦克的炮火已经使我们的窗户都在震动，但万一他们突然撤退了怎么办？要是德国人回来了，他们肯定会杀了我们的。

那个德国军官安慰我说，我的工作不会太多。他说仓库差不多已经空了，最需要的物资还没有配好。将要发给士兵的是一些罐头、香烟和火柴，也许还有其他东西，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很惊讶地看见一个背着枪的德国士兵在那儿等着我。他向我鞠了一躬，说：“Bitte，fraulein（小姐，请吧），

请让我护送你。”我大吃一惊，深吸了一口气。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不应该拒绝他，我便同意了。“请。”我用耳语般的声音低声回答说。每当遇到令人惊讶的事情，我都会回想起家里，我的父亲和亲戚，这次也是如此。如果他们是我，他们会怎么做呢？要是他们看见我和一个德国士兵一块儿走路，又会怎么反应呢？我还没来得及细细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就走到了我住的房子。我那忠诚的护卫举手向我致敬，说了一声“Auf wiedersehen”（再见）后离开了。

回去后我告诉朋友跟德国兵的故事，她们认为我的反应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时刻表现出可信的样子，而这种场合下年轻的姑娘是不会拒绝一个士兵接近她的。第二天，那个德国兵又在那儿等我。这次显得亲密得多了：他把步枪往左肩一背，用右手挽住我的胳膊。我微微颤抖，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尽管天气寒冷，可我还在出汗，热血涌上脑门，两颊通红。他可能把我的反应理解为一种兴奋，而他很喜欢这样。我对他的举止十分惊讶，但他并没有恶意。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麦克斯，可我已经忘了他姓什么了。他告诉我他应征入伍之前是一名律师，他爱好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但一有空他就会读书，主要是诗歌。他说，没有比一首好诗更能吸引人的了。他能够背诵歌德和海涅的诗歌。

两天后我们见面时，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要我晚上



跟他约会。他补充说，等他值完班以后，他会敲三下大门，叫我出来。同伴们看我回去时挺活泼，我便把这个德国追求者的事告诉她们。她们都觉得我应该继续和他见面，否则我们可能会引起怀疑。一个士兵业余时间找些消遣理所当然，而我要是拒绝了，弄不好他们就会怀疑。夜幕降临后，我听见三声低低的敲门声，心里怦怦直跳。我抛却杂念，穿好衣服离开房间。麦克斯很高兴看见我，幸运的是黑暗中他没看清我的脸上的表情。两种情况使得我战争阴影下这强制的"爱情"稍微容易一些：一是晚上十分寒冷，不可能在室外呆很久；二是麦克斯必须在8点钟之前赶回营地。

麦克斯做梦也想不到8点钟以后我们屋里发生的事



1946年，撒母耳·卡茨制作的新年贺卡，塞浦路斯。

情，他对来我们这儿的俄国年轻人一无所知。屋里很暖和，那些俄国人脱掉他们的羊皮夹克，像剥洋葱一样除去身上一层层衣服。他们是躲在附近森林里的游击队员，白天来到村庄，晚上就跟我们呆在一块儿。他们问我们是谁，但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只是告诉他们我们是越狱的囚犯。从他们的眼睛里，我们看出了怀疑的神情，最终我们决定把真相和盘托出——我们是怎样被赶出家门的、奥斯威辛、强制劳动——所有这些事都一股脑儿说出来了。他们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发现他们还是半信半疑。于是，奥尔加领头，我们都除去了头上戴的头巾，给他们看我们的短发。在奥斯威辛被剃光以后，头发刚刚重新长出来。他们吃惊地看着我们，从这一刻起我们之间的障碍完全消除了。他们拥抱我们每个人，不停地请求我们原谅。我们不懂俄语，但是可以用家乡人说的捷克语和罗塞尼亚语和他们交谈。

村子里很安静，德国人走之前宰杀了所有家畜，做成肉制品带在身边。老百姓已经走得一个不剩，只有军队还在这里，而士兵的数目也在日益减少。宁静的夜晚，我们能听见炮声离村子越来越近了……朋友们鼓励我继续和那德国士兵约会，她们希望能从他那儿听到重要新闻。奥尔加和安娜在部队厨房工作，也听见士兵们公开谈论目前的局势。他们已经受够了战争，可还是看





不到尽头。他们诅咒着战争，甚至毫无顾忌地咒骂希特勒。他们也听到了不断逼近的炮火声，知道末日不远了——这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来。

一天晚上，麦克斯第一次跟我谈起局势。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看我的，但他非常信任我，严厉地批评了节节败退的德国军队和政权。我们分别时，他久久地拥抱我亲吻我，告诉我说，如果几天后无法见面，也不要太惊讶。他对此非常难过，他认为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看起来他别无选择。我眼里也流出了泪水，要我哭是很容易的。我为自己亲爱的人哭泣。我不知道她们的下落，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告诉麦克斯我很担心他，希望跟他再见短短一面。他笑了，说已经有警报，军队随时准备撤退。第二天晚上，空中挂着一轮满月，天非常寒冷。麦克斯把我搂在怀里，比以往每次时间都长。他吻着我，而我仍在告诉自己，他吻的是莉莉，而不是我本人。

下一个夜晚，我听见篱笆门被敲了三下，赶忙穿好衣服出去见他。每次我出去时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约会了。麦克斯非常悲伤，他没说几句话便抱紧了我，看着我的眼睛，说他必须教我一首歌，作为对他的纪念。他用优美的男中音动情地唱道："Ich liebe die sonne, Die mond und die Sterne, am meisten doch liebe Ich dich"，意思是："我爱太阳，我爱月亮，我

爱星星。但我爱你胜过这一切。”

这可能是一首有名的情歌。我们一同歌唱，充满了感情。他梦想着和我的爱情，而我想的却是我的亲人。

又一个晚上，麦克斯兴奋地赶来，两眼放光地看着我，说这次必须把见面时间缩短，因为最后一批士兵即将离开村庄，有消息说就是今天夜里。如果是这样，他就会敲三下大门，这是我们约会的记号，说明德国人离开村子了。他急匆匆地吻了吻我，把一张折好的纸片塞进我手里，喘着粗气跑了。我的朋友很奇怪我这么快就回去，我告诉她们这是最后一次约会了。我打开麦克斯塞给我的纸片，奥尔加大声读出来：“……我爱你，莉莉小姐，我希望一生一世陪伴你，我亲爱的莉莉。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这该死的战争。保重你自己，战争结束后我们将在下面的一个地址相见。抱你，吻你。爱你的麦克斯。”纸片下面写了两个地址，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巴黎，是他希望我们战后重聚并且结婚的地方。

我们个个惊恐万分，静静地躺了很久。我们都不知道早晨醒来后会看到什么。村外大路上的坦克和其他重型车辆把我们的床震个不停。德国人的车不够多，很多士兵不得不步行。

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听见三声敲门声，这是麦克斯向我道别，他和其他士兵一道走了。我们一直醒着，听着汽车逃跑的声音，还有骚动声、咆哮声和命令声。这





一切都渐渐离我们远去。突然，周围完全清静下来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时，面对的是全新的世界。帐篷、士兵和他们那闪闪发亮的皮靴都从院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德国人已经离开村庄，而俄国人还没有到来。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我们心里忐忑不安，感觉如履薄冰。我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那是二月里一个寒冷的日子。如果有一点阳光出来，同伴们就让我坐在椅子上到门口晒太阳。我身上盖得严严实实，但我喜欢那冰冷新鲜的空气。村子里一片寂静，鸡犬之声早已绝迹——所有的家禽家畜都被杀光了。

突然，我们听见马达的响声。声音从大路的方向传来，离我们越来越近。一个俄国侦察员开着一辆摩托车，停在村子中央。那些俄国年轻人像老鼠出洞一样，从各自工作的德国人的房子里冒了出来。他们亲吻着那个侦察员，紧贴在他身边，好似藤上的葡萄。男孩子和女孩子们拥抱着他，喜极而泣。他下了车，和其他人一同走进最近的一座房子。奥尔加和安娜也跟着他们。侦察员打开一张地图，边界和战况的发展都在上面做了标记。男孩子立刻被动员起来了；而女孩子，包括我们在内，被告知几个小时后将被带往后方。但俄国女孩儿很坚决，最后和男人们一块儿走了，而我们留在了村里。

第二天我的同伴去遗弃的房子里找东西吃。她们回来后告诉我一个故事，令我想起我们离开家的那个早

晨。她们走进一栋房子，桌子是摆好的，食物还没有吃完。那些村民是在吃饭吃到一半时离开家的。他们和我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是自己离开家，而我们是被人强行赶出家门的。村庄里一片沉寂，只有乌鸦的叫声偶尔打破宁静的空气。同伴还告诉我，她俩见到一对四五十岁的德国夫妇，他们看见她俩时，很自豪地向奥尔加出示证件，证明自己过去是共产党员。他们向我的同伴微笑着，对自己的安全很有把握。后来我们找过他们，但已经不可能找到了。他们见到的第一个俄国人对他们的证件毫无兴趣。在愤怒情绪的支配下，他杀死了他遇到的每一个德国人。

装甲车和运送士兵的卡车浩浩荡荡开过村庄，路上的交通一刻也不停息。这次是俄国人。有时，运送士兵的车辆会开到我们的房子前，我们热情地欢迎他们，给他们送食物和饮料。这些东西我们还有不少。有个士兵留给我们一本小册子作纪念，那差不多是一本“行军祈祷书”，每个士兵都配备了。小册子的封面上印着斯大林的照片，下面是粗体字的口号：“为了斯大林，为了祖国。”小册子里是一些鼓励的诗歌。我们夹杂着捷克语和俄语跟他们交谈，每当一个捷克语单词使他们联想起俄语里的某句脏话时，他们就会爆发出一阵笑声，但每次都能听懂。他们很乐意解下子弹袋，脱下沉重的大衣，坐下来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好客之家”的传闻通





过士兵之口很快在行军路上传开了。每当他们走进我们的房子，烟囱里就会冒出炊烟。一开始他们是一个一个地来，后来是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过来。

一个高个儿士兵悄悄走进来。他必须低下头，否则就会碰到门楣。他的肩上有军官徽章，胸前挂满了勋章。他走进来和我们一道吃喝，每时每刻都郑重地看着我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没有急匆匆吃完就离开，而是坐到桌子对面，问我们是谁，在这废弃的村庄干什么。我们已经在这种场合经历过太多的艰险，这是第一次我们不用害怕说出真相，大家都急于讲自己的经历。奥尔加首先开讲，我三言两语地补充，就连一向寡言少语的安娜也不住插嘴。我们不能等了，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争先恐后讲了些故事。军官让我们冷静一点，不要着急，他没听完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是不会走的。“谁年纪最小，让她先讲。”他说。我便开始了我的故事：从我们被逐出家门的艰难时刻到奥斯威辛和强制劳动营，我说得很慢，确保他都能听懂。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变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突然他站起来，走近我们，拥抱着我们三人，用意第绪语动情地说：“Ich zend dach Yiddishe meidelach.”（原来你们都是犹太姑娘。）我们抱成一团，心情激动万分，直到冷静下来才止住泪水。大家重新坐下，他开始向我们讲述他自己。就因为是犹太人，他在部队里受到歧视。我们倾听

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那种政权下怎么也会有歧视呢？他看见我们有所怀疑，便指了指他的军装，给我们看他的勋章。他说，他完全可以当一个高级将官了，但他谢绝了晋升。这是由于他的那些部下：他们公开对着他的背后指指戳戳，不忘加上一句“犹太佬”。

我童年以来就一直梦想着的世界突然倾覆了。我曾经多么向往它，信任它，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信仰上帝。可现在，这一切似乎都已消失在空气中，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尽管那军官看上去不会撒谎，但我还是难以接受他所说的一切。他知道他的话在我们身上产生了效果，引起了我们的疑惑和恐惧，便索性把事情和盘托出——这也是为我们好。他说一次偶然，他救下了两个必死无疑的犹太姐妹。当时他看到一个俄国士兵一边举枪向她们瞄准，一边骂道：“你们这些犹太贱货，能把身子给德国人，就不能把身子给我？”这时士兵看到了军官，不得不放下枪，她们这才得救。我们的惊讶显而易见，我们不能相信一个俄国士兵会这样做。那军官说他不是有意吓唬我们，但他有责任向我们描述这场悲剧，这样我们今后才能特别小心。他还给我们一条忠告：“……俄国军队和捷克军队有良好的关系和全面的合作，但不要告诉任何人你们是犹太人，最好说自己是捷克人，直到你们到达安全的地方。捷克姑娘在哪儿都





会受到欢迎。”我们欣然接受了忠告，后来才发现这是多么正确。

士兵们继续来我们这儿做客，我们像往常一样邀请他们一道吃饭。一天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来到了村庄。他们占据了所有的房子，带走了所有能带的值钱东西。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的屋子。我们邀请他们进来坐下，像对待先前其他人一样做饭给他们吃。这伙人很快乐，不断开着玩笑，我的两个同伴也加入了他们。后来安娜和一个士兵离开了房间，奥尔加跟着另外一个走了。他们也邀请了我，不过我谢绝了，我生着病，这是个好借口。他们一看见我全身溃烂的伤疤，就急匆匆地离开了。他们受到过疾病的警告。大约过了1小时，我的同伴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她们两眼放光，双颊泛红，告诉我说她们和士兵度过了一段销魂时光。

第二天士兵回来，吃完饭以后他们又和我的同伴离开了。……她俩没有回来，我从此再没有看见过她们，也不知道在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一个人在屋里，躺在床上。天色已晚，夜幕开始降临，我的同伴却没有回来。她们就这样消失了。我一次又一次呼唤着她俩的名字，但一个也没回来。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我冻得瑟瑟发抖，脚实在疼得厉害，下不了床，我无法往炉子里添火，在寒冷和恐惧中蜷缩成一团。最后我安慰自己说，炉子熄了最好。因为如果士兵看见烟囱

里冒烟，就知道屋里还有人，很有可能进来。这是我极力避免的。

坦克、重型车辆和卡车昼夜不停地开过村里的那条马路。一天，一辆满载士兵开往前线的卡车在村里停下了。士兵们抖落身上的雪，走进屋子。我指了指桌子，夹杂着捷克语和俄语让他们吃。他们看到我胳膊上的溃烂的伤疤，吓得退了两步，想起要远离疾病的警告，赶紧离开了屋子，甚至没尝尝食物。

突然，我听见沉重的脚步声，简直要把楼梯震碎。门被一脚踢开，狭小的门口被一个巨大的身躯堵死了，他的眼睛几乎把我刺穿。他穿的衣服肮脏不堪，混合着汽油、煤油和酒精的味道充满了整个小屋。我看见他已经醉了，一步步逼近我，眼睛从没有离开过我，我只有一个念头——逃离这儿。我就这样跑出了房间。

我身上只穿着睡衣，赤着脚在雪地里行走，到了大路上。在冰天雪地里，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泪水在脸颊上流过，就像冰水一样寒冷刺骨，我冻得瑟瑟发抖。一辆军车在路上行驶，当它开近时我奋力向司机挥手。司机命令我走开，但我像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他继续冲我咆哮，问我为什么在他向前线赶路时挡他的道。我无助地站在那儿，祈祷他从我身上轧过去，这样就可以彻底结束我的痛苦了。

我指了指刚刚逃离的那栋房子。司机见我没反应，





便下了车。他看我这么冷的天只穿一件睡衣，便脱下他的军大衣披在我身上，向房子走去。我看见他把那个士兵扔进院子，不断用沉重的军靴踢他的背，愤怒地咒骂他。司机回来时把我扶上车，让我坐在他身边。我渐渐恢复过来了，看着我的"救世主"，不住感谢他。"С п о с и б о"。他发动了引擎，我们出发了。司机在司令部附近一个停车场把我放下来。他们给了我一把椅子坐下，长桌旁坐着士兵和军官。我开始了一生中最长的一次"演讲"。我说的是捷克语，一个士兵翻译成俄语。我告诉他们，当他们推进时我兴奋极了，天天祈祷他们获胜。我甚至想，只要他们能打赢战争，我被炸死也在所不惜……他们仔细倾听着，向我保证说我会明白俄国人善良的一面的。

我走进一个红十字会医疗点，出来的时候从头到脚缠满了绷带，像具木乃伊。因为没法走路，我被抬上一辆马车，他们向我保证说路上每到一个医疗点都会给我换绷带。每次换过绷带，我的感觉都有所好转，可以走几步了。我很高兴自己正一天天恢复过来。战争很漫长，所有机动车辆都被征用了，只剩下一些抛锚的车辆。我们就坐着他们给的马车回家。

前线的战事还在继续，我不知道我们在哪儿。但不管怎么说应该离西里西亚的奥得河不远。在路上我们遇见其他一些年轻人。他们中有灭绝营、强制劳动营和监

狱的幸存者，有游击队员，还有从藏身的地方逃出来的人。有的孤身一人，还有的三两成群，都是回家的。他们把孩子放在马车上，而我已经不需要它了。我很高兴自己可以重新行走。我们共有大约30人，白天赶路，夜幕降临后男人和女人分别找空房子睡觉。在跟我们一块儿走的人中，有个名叫雅克的法国人。我渐渐了解了他。我会说好几种语言，但不包括法语。我很喜欢它音乐般的声音，梦想有一天能学会它，但这和我小时候其他的梦想一样，早已烟消云散了。我在中学学过英语和一点拉丁语，不知为什么我和雅克互相都能理解。一天雅克和另一个年轻人走进一座废弃的房子寻找食物和衣服，出来的时候他很兴奋。他拿着两本词典，一本法英的，一本英法的。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聊天了，甚至觉察不到时间的流逝。一天黄昏，我们停下来准备晚上睡觉，雅克用胳膊搂住我，让我陪他去一座小房子。他觉察到我的反应，看着我的眼睛，把我抱紧了一些，要我相信他：没有我的许可，什么都不会发生。我很喜欢他，他个子很高，头发乌黑，有些清瘦，而现在完全是皮包骨头了，但可以看出他曾经非常英俊。他的世界观和我的十分接近，他因为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被投进监狱，送进了集中营。我感到我们俩心灵相通。

但是，一条巨大的鸿沟把我们俩分开。我是犹太人，从小到大都是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知道





我永远也不能越过这个障碍，以弥补我俩之间的裂痕。他是个外邦人，我对他的反应似乎和我的思想相抵触。我拒绝了他，因为他不是犹太人。我内心的责任感不允许我找一个非犹太丈夫。[①]因为缺乏共同语言，我们难以自由交谈。我不知道当我拒绝和他发展更亲密的关系时他是怎么想的，但我们的友谊还在继续。

一天，雅克从一座房子找食物回来，给我带了一把大曼陀铃，这令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双手接过曼陀铃，用左手把住琴身，右手拨弄琴弦。我胡乱拨弄所有的琴弦，使它发出很大噪音。我想喊，想哭，想表达所有无法表达的情感——我终于回到生活中来了。但它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伤痛，让我回想起安息日之夜和家里过节时的情景：我们一同歌唱，演奏曼陀铃和其他乐器，直到第二天清晨。雅克看见我时而大笑，时而痛哭，但我没法向他解释。我调准琴弦，开始演奏那时欧洲流行的小旋律歌曲；所有人都伴着演奏，用自己的语言加入歌唱。人们唱着《伏尔加，伏尔加》和《黑眼睛》，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

我们听见火车汽笛的声音，知道已经到了一座城市。以前我以为它名叫陈司托克霍瓦，但几年后我在地

---

①犹太教规定犹太人不能与外邦人通婚。作者虽然不信教，但自幼深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民族归属感相当强烈，难以接受与非犹太人的爱情和婚姻。

图上找这个地方时发现自己错了，而它的真正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火车又开始运行，我听见汽笛声时立刻轻松了许多——这下不用再走路了。站台上嘈杂混乱，很多的大人小孩东奔西跑，有的拉着同伴的手，有的呼喊着走失的孩子的名字。我转向身边的人们，问他们从哪儿来，也许曾经听说过关于我家人的消息。但很遗憾，他们都不知道。我看见一块牌子指向去布拉格的火车，而去巴黎的火车在对面的站台。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嘈杂和匆忙中进行的。开往巴黎方向的火车机车警卫发出开车的信号，我把曼陀铃放在脚边站台上，跟我的朋友雅克告别。我双手向他挥动着，直到火车在转弯处消失。他和我共同走过了一段特殊的旅程，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现在我又只有一个人了。我还没来得及为离开这个好朋友难过，汽笛又响了，去布拉格的火车就要开了。我看见旗子挥舞出发的信号，兴奋极了，立刻从地上抓起包袱，匆忙挤进车厢。过道上十分拥挤，人们都在找好座位。我在一排椅子的角落找了个狭窄的地方坐下，十分高兴，尽管被挤压到车厢壁上，但我安慰自己说，毕竟有个座位了。

随着汽笛一声长鸣，车轮开始慢慢滚动，逐渐加速。我的心狂跳不止。我在车上，就要回家了。我闭目养神，想着将会发生的事情：我回去以后等待我的是什





么，我会先到哪儿去。突然，我发现曼陀铃不见了。我记得把它放在脚边的月台上的，当我奔向火车时就把它忘在那儿了。我伤心透了，这是雅克在路上给我留下的惟一的纪念。

像往常一样，我遇见一个人就问有没有看到我的家人。我坐在那儿，被邻座和车厢壁挤得够呛，只能看着前面的座位。我已经记不得当我看见她时是真的大叫了一声，还是只不过想大叫出声来。

第十章

失去记忆的日子

我不顾自己的位置是否会被别人占去，站起身走到那个吸引我注意力的女人身旁，来不及先寒暄几句，就很冒失地说："你，对，就是你。我认识你，在奥斯威辛。你跟我都在C营。你睡在上铺，是在我对面的第三个，我可以看到你。你肯定还记得那次大规模甄别吧，就是我们报数点名的那次。我跟一群女人一起被选中去做苦力了。也许你知道留下来的人怎么样了，就是在病号区的人。"她看着我，情绪很激动，回答道："你问我知道不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那些生病的女人带走。她们赤身裸体，就像刚出生的婴





儿一样一丝不挂。我们听到她们哭喊，然后我们看到火焰……”

我没听到她最后都说了些什么。后来我像做梦一般发现自己睡在长凳上，额头上搭着一块手帕，还在往下滴水。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她乞求原谅的声音。她说她真是罪过，一切都是她的错，要不是她告诉我病号区那些女人的事情，我也不会吓得晕倒。但是她，一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那些人中间有我的妹妹哈娅呢？

哈娅的死讯让我的精神大受刺激，我先是晕了过去，然后就陷入了一种似梦非梦的恍惚状态。那个女人一直在我身边，安慰我，照顾我。我在恍恍惚惚中感觉到火车已经到了布拉格。这之后她也没离开，到哪里都陪着我。我们一同走过伏尔塔瓦河[①]大桥的时候，我注视着河水。河水清澈见底，我的思绪也陷入记忆的长河中。我忽然记起了埃利泽去巴勒斯坦前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了布拉格恐怖的情形。那时候很多学者，最好的作家和艺术家，还有各行各业的精英，为了免受德国人的铁蹄践踏，在这里毅然投河自尽。

那个女人跟我都是第一批被遣送回国的难民，也就是捷克人说的“第一批战争幸还者”。捷克人非常坦诚，欧洲各国中，只有他们给了我们这些身无分文的战争难

①拉贝河支流，流经布拉格，被称为“捷克的母亲河”。

民一本援助手册，凭那本小册子我们可以到饭店免费吃一顿，在旅馆免费住一宿，可以免费理发，甚至还能免费搭乘电车。这些细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因为我当时完全神志恍惚，那个女人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身边。她陪着我，直到我们遇见一个来自穆卡切沃的我的同乡，她让她照料我回到家乡去。

回忆起来，那几天真可称作"迷失的6天"，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那6天中发生了什么。好像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6天。直到现在我还只是记得我醒过来的那个时刻，就像重回人世一样：那天我跟我的妹妹哈娅重逢了，就是在奥斯威辛病号区的妹妹哈娅。她在战争中死里逃生了。当火车上遇到的女人告诉我所有的生病女人都被送进了焚尸炉时，我昏厥了过去。而我妹妹躺在奥斯威辛病号区时，一个女看守（那种负责1000个女人的）来看望她一个朋友。她贴着那朋友的耳朵说第二天所有生病的女人都会被送进焚尸炉，她特地来报信救她的。哈娅是个聪明的姑娘，她听后毫不犹豫地扯下了一块被单，当做围巾裹在头上，然后手持一个水壶离开了病号区。一个守卫看到她，大声吼道："你不知道这个房间不允许进出吗？"她把水壶向他扬了扬，说她只是来给一个朋友送吃的。守卫用鞭子抽打她，威胁说如果再看到她就毙了她。她赶忙离开了，逃到另外一个房间，就这样保住了命。





我对迷失的这6天实在没什么印象，只有些零散的记忆还比较可信，再有一些就是梦境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片断记忆。我在穆卡切沃度过了两个月，但我一点都记不得回来以后谁问候过我，我住在哪里，谁照顾我，还有我穿着什么。当我想到自己神志这样恍惚，也许有人给我穿衣服，碰触我的身体，甚至可能趁机轻薄我的时候，我就不寒而慄。

似梦似醒的记忆里有一段是我躺在一张吊床上，吊床吊在溢着气泡的浴缸里，温暖得像是在母亲的子宫里一样。我感到一个男人抱着我，一个儿时好友轻柔地跟我说话，安慰我。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的拉海尔，最重要的是你已经回家了。

这样类似的记忆还有一些：我听到“达、达”的马蹄声，还有一个男人的低沉的声音：“我的锯木厂里有几十个工人昼夜不停地干，我的财富每时每刻都在增值。我还有一栋大房子，我们很快就到了。那里的厨师已经忙活了好几个小时，就等着为我们献上一道盛宴啦。”我睁开眼睛，找寻声音的出处。是谁在讲话呢？我发现自己身上盖着羊皮，我的脚上裹着羊毛毯子，鞋子没有脱。我的手上还套着皮手笼，那是以前寒冷的冬天里我们经常戴的。我转过身去，可是什么人也看不到。声音来自坐在我身边赶车的那个人，他手持缰绳，马鞭就在我头上嘶嘶地飞舞着，时不时地叫着“驾——

驾——”。马儿在疾驰，马蹄“达、达”地敲在鹅卵石路面。这时我看到他脱下手套，从怀里掏出一个装着戒指的小盒子。他用欣赏的眼光看着那戒指，纯金在冬日的阳光中熠熠发光。他对我说：“答应我吧，这个戒指就属于你了。我们立即就可以去见拉比[①]。”“这可不行，我只能在以色列结婚。”这些话就好像脱离了我的思想而自己存在一样，就这么从我的嘴里蹦了出来。话说完了，四周又是一片黑暗，将我和拿着缰绳的男人一起吞没。我就这样又陷入恍惚之中。

有一天我在玫瑰街上散步，我们以前就住这条街。我用一根小棍子敲打着花园周围的尖桩栅栏，就这么一个人走着，因为孩提时代我常沿着这条路上学回家。我停下来，回头看栅栏从哪里开始的，但是一眼望不到头。我又转过身来，栅栏一直延伸着，直到消失在视野之外。忽然，所有的栅栏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倒了下来，我站在一条铁轨边上，铁轨蜿蜒不断。我意识到未来完全是不确定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忐忑。

每天都会有年轻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们熬过了这场战争，如今从各种不同的地方归来了。我后来发现我是第一批回来的，因为我逃离了死亡行军，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回来了。回来的人数都有统计，我是第

①指结婚。犹太人结婚时需要到拉比处登记，方被认为有效。





37个回来的。当年有17000个犹太人住在市中心，那时候隔都还没有建立。现在有37个人先回来了。先回来的人肩并着肩，在主干道上迈开大步欢迎那些新回来的人，喜悦中混合着泪花。他们看到了我的状态，有个人建议带我回她家去，这样有助于我恢复记忆。我的朋友们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我，我们踏着乡间小道来到我曾生活过的地方。当我们靠近老房子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楼梯，可以通到地窖去的楼梯。那上面覆盖了一层尘土。我后来发现直到战后，我们有的非犹太邻居还在挖来挖去，指望找到那些传说中犹太人藏起来的财宝。

我站在那里，就好像看到母亲站在我面前一样，她把围巾裹在头上，金色的头发从边上掉下一些小卷儿，父亲死后她就一直戴着那条围巾。她摘下那对我很欣赏的耳环，放进管子，然后对我们说："这样，你们，我亲爱的女儿们，回来以后就可以用这些开始新生活了。"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过去，亲爱的母亲在对我说着这些话。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里的希望，她要我们好好地活下去，她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坚强的鼓励的神色。我忍住眼泪，不让自己泣不成声。我一个个房间地走过来，每个房间里都有很多非犹太人找寻财宝所挖的洞。

房子里已经被洗劫一空。厨房边上有个通风的壁橱是我们以前储存奶制品的地方，壁橱里有架梯子可以通

到阁楼上去，我们曾经把埃弗拉藏在那里，躲过匈牙利宪兵的搜捕。在梯子下我看到了一块白色的东西，把它捡起来，拂去上面的灰尘——那是父亲从布拉格写给我们的一张明信片，他去那里检查身体的时候寄回来的。我们曾经把所有的信保存在阁楼上，现在找到这张明信片让我如获至宝，这是父母亲留下的惟一纪念品。但是让我异常伤心的是，在我去巴勒斯坦的途中这张明信片不幸遗失了。我收到哥哥埃利泽的几封信，他也幸运地逃过了这场战争，他的信里附了一些父母当年写的信。我把这些信收在一个抽屉里，经常拿出来看看。我为他们自豪，同时我也很感激他们对我的教育，他们教我的



1948 年，亚库姆基布兹的第一场婚礼。



东西让我享用终生。这些美丽的回到老房子的梦很快就被另外的恍惚所替代，我深陷其中。

一天，我们照例肩并肩从主干道上走，欢迎那些新回来的朋友们。回来的只有年轻人，大多数都是二十出头，孩子和老人们没有一个生还的。那天我恢复了神志，终于清醒过来。大街上两个青年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听说哈娅也回来啦，正在路上呢！"

大家听了都很兴奋，只有我毫无反应。我以为他们说的肯定是哈娅·玛麦尔斯坦，我的好朋友，我前面曾经提到过她的好嗓子，她常在犹太社区唱歌的，她和我妹妹同名。我想到了她，于是又退缩到自己的梦境里去，继续保持着沉默。我的朋友们了解我的心理，对我说，"拉海尔，我们说的是我们的那个哈娅，哈娅查克啊"。这是我的妹妹的昵称，他们在青年运动和在学校里就这么叫我的妹妹，因为她总是笑盈盈的，生性活泼顽皮，跟我刚好相反，他们都说我严肃。他们一遍遍地重复这个名字，我的头脑里终于云开雾散，渐渐听清楚了他们在说什么。每一个字我都听到了，听懂了，我站在那里，对他们摇着头，喃喃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妹妹怎么样了。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两个朋友陪我一起到站台上等我的妹妹，他们一见面就告诉她我的状况。我们一同走过到大火车站的街道，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一个小火车站。我记不

得哈娅和我在那里站了多久，我们互相拥抱，彼此擦去泪水，我们都哽咽着，说不出话。哈娅擦去我的泪水，我盯着她的眼睛仔细看。她在对我微笑，她总是这样笑盈盈的，就像我记忆里的一样。我真正意识到我终于找到妹妹了！我们走到市中心，走进过去的犹太会堂。哈娅很细心，怕我看到那时的建筑心情会不好，于是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她给我看她的手表，告诉我说，当美国人解救她们那个营的时候有个大兵送了她这块表。她发誓要把这块表送给她第一个重逢的姐妹，她的小诡计成功了，我们走过那些曾经度过美好时光的地方。但我的目光却盯在了这块小小的金色表上，表带是红色的，编成麻花状。当哈娅把它戴到我手腕上的时候，她的嘴巴也没有停，给我讲这讲那，不允许我的脑子里想任何其他的事情。她说道："你不记得了吧？我的拉海尔，我们在巴勒斯坦还有个哥哥呢。埃利泽跟帕尼娜结婚了。他们还生了个儿子，叫雅亿尔[1]。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比较陌生，对吗？我们以前还从来没有听过哪，不过很有象征意义。我们都觉得他会让我们前途光明的。拉海尔，我们在家的时候是怎么梦想将来有一天要去巴勒斯坦，在那里建一个基布兹的，你真的不记得了吗？"我渐渐地开始听懂她在讲些什么，神志开始

①意为"他将照亮前程"。





清醒起来。

我听说布达佩斯已经开始组织阿里亚。于是有一天我们离开家到那里去，希望从那儿去巴勒斯坦。但计划是一回事，行动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人有句谚语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布达佩斯，青年运动非常活跃。为阿里亚作了各种方面的可能的准备，我的内心充满了梦想成真的希望。

我想听妹妹讲，她是怎么死里逃生的，而且就这样活生生地在我的身边。要知道，大家都对我说她已经死了，我再也看不到她了。前面我已经提过她如何逃脱，但我忘记还有一点——当她告诉守卫她不是病号区的犯人的时候，让守卫相信的决定因素是她的长相。她有张圆脸，双颊因为发烧而显得绯红，掩饰了她实际的健康状况，因此逃脱了。她没有回到病号区，而是到了另外一个营。我问哈娅她的胆结石怎么熬过来的，在奥斯威辛她可吃了这小石头的大苦头了。她于是给我讲了她的幸运遭遇。她逃进的那个营里的女人都相对年轻健壮，第二天就通过“甄别”，被装上卡车运到附近城市的军工厂劳动。那个军工厂对于德军非常重要，因此她们也享受了比较好的待遇。她们住在一栋两层的小楼里，虽然没有暖气，但是也足可以遮风蔽雨，免受苦寒，配给的食物也相对多一些，这样她们才有力气干活。哈娅跟那里的一个护士交上了朋友，她帮她搞了点合适的食物

和止痛药。哈娅的工作是清洗用过的子弹弹壳，这样弹壳就可以重新利用了。我亲爱的妹妹在那种环境下还在写诗（她写的儿歌在儿童刊物上发表过，经常能在电台里听到），她用悲痛的诗句描写她被迫进行的劳动，她是那么不情愿，但又那么无可奈何，她被迫为德国人制造武器，而这些武器将被用来对付她的家庭乃至全人类。

我们相见以后，一同去了匈牙利的医院。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哈娅送到最大的最好的犹太人的医院去。因为哈娅患了重感冒，手术不能立刻进行。我们等了好几天，直到她不再发烧，体温恢复正常以后才把她送上手术台。我还记得她病床边桌上的一只小碗里放着的那几块灰色的小石头——我一直以为胆结石只是口头上的一种称呼，没想到真的是石头，有大的有小的，裹在胆囊里。就是胆囊里的石头让哈娅承受了那样可怕的疼痛，让她的生活那么悲惨。在隔都第一次胆囊疼痛的时候，她是那么坚强地忍耐着，一声都没吭。在那样暗无天日的岁月里，谁能来给她医治呢？我在医院里看过哈娅以后，在回住所的途中遇到了一个同乡。我们都喜出望外，互相询问了各自的家庭成员团聚了没有。我很惊喜地听他说起他曾经在布拉格遇见过我哥哥什洛莫，他看到他站在一家军医院的门口，拄着一副拐杖。因为这位同乡行色匆匆，我们约好下次我再去拜访他，然后告





别了。我再去医院看哈娅时，她的精神状态很好。手术过后她恢复得很快。我把什洛莫也将从战争中回来的好消息告诉她，她非常高兴。她说她觉得好多了，一切都正常，我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所以最好立即去找什洛莫。自从他在家里被匈牙利宪兵抓走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我拥抱了哈娅，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把她一个人扔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觉得非常不放心，但她强烈要求我立刻去找什洛莫。

手袋里装了纸巾和几件必需品，我告别了布达佩斯，穿过站台上拥挤的人群，坐上了去布拉格的火车。火车开动之后，我处于兴奋之中，耳边火车隆隆行进的声音似乎也变成了喃喃私语的声音："什洛莫还活着——什洛莫还活着。"就这样，我一边为即将见到哥哥而兴奋，一边为离开妹妹而担忧，哈娅仍躺在病床上呢。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幻想着跟哥哥团聚的场景，车厢里的拥挤并不能影响我的心情。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位置，但过了一会儿，一个几乎站立不住的女人走进了这个车厢，我便把位置让给了她。我为自己的幻想所激动着，并没有注意到火车经过了哪些站，直到忽然听到一声长长的汽笛，隆隆行驶的列车缓缓减速，开进了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的首府）车站。车厢门开了，只有几个人下了车，而许多人又挤了上来。我被挤到两排位置的中间，看见站台上一群俄国士

兵正从人群中推推攘攘地挤向我们车厢。他们在地上和走道上坐下来，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不停地跟同伴粗俗地大声说笑着。在布拉格我曾听说过他们都有收集手表的嗜好，便赶忙察看了一下手表是否还在手上，转念一想又把表摘下来藏到文胸里面。这块手表是哈娅送我的珍贵礼物。

俄国人四处查看，看到有人戴着手表就凑过去，伸出手粗鲁地嚷道："Д а В а й　ч а с ы！"（手表拿来）他们整条胳膊上都戴满了手表，沾沾自喜地欣赏着。我默默地站在边上，心里很害怕。在我身旁的地板上坐着一个老农，穿着羊皮袄，身边放在一篮咯咯叫着的小鸡。我靠近他，在他身边坐了下来，装成好像是他的孙女一样。我相信我如果遇到麻烦的话，他会保护我的，就像保护他自己的亲孙女一样。因为恐惧，我有些气喘。我能感觉到一个士兵的身体紧贴着我的后背，他粗重的呼吸就在我脖子后面。我觉得后背被他顶了一下，脊背上顿时蹿起一股凉意。我非常惊恐地移开了，挥着手臂推开一条路，越过那些坐在地上的士兵，就好像逃离火场一样。直到我挤出了车厢，踏到连接两节车厢的铁板时才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牙齿仍因为恐惧而打颤。一股冷风迎面吹来，我几乎难以呼吸。随着火车高速前进，冷风吹得更猛了，但是我的心里却充满了胜利逃离的欣喜。又一次成功逃脱了，可是两手空





空，装着东西的包早已不见了，最糟糕的是，我的外套也落在刚才的车厢里了。但我很清楚，绝对不能再回我刚才逃离的地方去。

我就抓着车厢连接的铁链，站在铁板上面度过了我的旅程。长长的鸣笛响起，有规律的活塞撞击就缓慢下来，火车终于到达了终点。我抵达了布拉格，但两手空空，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我默念着此行的目的，出发去寻找我的哥哥。我来到一个挂着红十字的建筑前，辨清楚是一家医院就走了进去。一个护士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听我说明来意以后，在一张名单上查找我的哥哥的名字：什洛莫·弗里德曼，捷克语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但是没有找到。我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动摇继续找哥哥的决心。战后的布拉格几乎每一所学校都飘扬着红十字旗帜，都是临时的军医院。我挨个寻找，疲惫不堪，情绪也很沮丧，我怎么才能找到哥哥呢？后来我几乎不抱希望地来到一家临时医院，接待的人却告诉我什洛莫就在那里，而且我很快就能看到他。终于达到了此行的目的。一个护士将我带到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门口，然后离开了。我抬手敲门，心狂跳起来。我站在门口，在房间的那一边，一个拄着拐杖的士兵站起身来——一个年轻的瘦削的士兵，制服不合体地搭在身上。但他的卷发和凝视我的绿色的眼睛立即让我确信他就是我哥哥——他的笑容多么熟悉啊。我们拥抱在一起，一边流

泪一边亲吻。我还没有从见到他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就又大吃了一惊。他用捷克语对我说："见到你真是太好啦，洛珊可。"洛珊可是我名字的捷克语叫法。"我亲爱的妹妹，我知道你在这场战争中吃了不少苦，你能够挺过来，而且我们还能团聚我真是高兴啊！"

他用捷克语说话，用外语而不用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可是我们的母语啊，我们在家里从来都说希伯来语的。从他开口开始，我们之间的对话就好像是在两个聋子之间进行的，因为我说希伯来语，而他坚持只用捷克语跟我说话。他仍然坚持他的左翼信仰，甚至比过去更为狂热。他努力对我描述他的信仰，说要实现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平等。他是一个激进的共产主义者。

我发现很难让自己相信他的那一套信仰，因为久别重逢，我差点都忘了告诉他我们的妹妹哈娅的情况。他听说哈娅也逃过了战争，平安归来，非常高兴。我脑中灵光一闪——也许让他跟我去布达佩斯看看妹妹能让他改变人生道路。我对他说我必须得回去照看哈娅，希望他能跟我一起回去。我希望兄妹三人的团聚能够唤起他以往的家庭记忆，从而让他放弃共产主义的计划跟我们在一起。

什洛莫对我微笑着摇了摇头。"就回去看看她吧，"我坚持说道，"这样她会康复得更快些的。"但是他固执地不肯答应，我非常心痛。他说如果哈娅要看他的话，





随时可以来看他。过了一会儿，他就像洞察我的心思一样对我说："拉海尔，你看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法西斯一败涂地灰飞烟灭，我们还去巴勒斯坦干什么呢？试试说服我吧，我亲爱的妹妹。我为什么只关心犹太人呢？捷克人，俄国人，其他国家的人会怎么样呢？我相信一切人类都是平等的。你也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就像父亲一样。现在就是为全人类战斗的时候啦。"有人轻轻地敲门，一个肤色略深的姑娘探进头来。她穿着一件红十字护士服，头上戴了一块方巾。"进来，安娜，让我介绍我心爱的两个女人相互认识吧！来见见我的妹妹拉海尔，你以前也听我说过她很多啦！拉海尔，你来见见我心爱的安娜！"

这个姑娘把手里的托盘放在桌上，很温柔地拉了拉我的手。她跟我哥哥互视了一眼，友好地跟我点点头就关门出去了。什洛莫看起来挺大方的。他以前就在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中间很受欢迎，看来在这里也一样，即使他现在看起来不那么英俊，健康状况也不好，姑娘们还是喜欢他。虽然我很为他的健康担忧，而且为我们之间的疏远而感到痛心，但看到他身边至少还有个女人，我还是感觉挺欣慰，至少还有一个人爱他，能够悉心照料他。我跟什洛莫约好明天再来看他，然后就离开了。晚上在旅馆里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怎么会说服不了他呢？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吗？我相信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一定能够说服他跟我一起去布达佩斯看哈娅的。不巧的是我第二天不得不回去看哈娅，我承诺说我会很快回来看他的。

我别无选择地离开了。离开什洛莫两周后，我回到了那家医院，直接到走廊尽头的那间小房间，敲了门，没人应，于是走了进去。安娜蜷在椅子上，没有发觉我进了门。过了一会儿，她缓缓地抬起头来，我看到她脸上悲戚的神色。她看着我，慢慢地说："……我那天晚上在医院值班，他来的时候发着高烧。我全心全意地照料他，就这样他来到我的生命里，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爱我。我以前也有人追求，可是他的爱把我整个都融化了。可是在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却忽然走了，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他是那么爱我，我们一起睡觉——原谅我，但是感觉的确很好。我遇到他以后就离开了我原来的男朋友，我把一切都给了他，我惟一的梦想就是跟他，我最爱的亚历山大一起生活。你可以看到我这个简陋的房间，我没有什么东西，但我们说过我们拥有的一切已经足够。我梦想有一间带花园的小房子，我们说过就算什么都没有，我们至少还有爱情。爱情……"她泣不成声，夺门而出。她再回来的时候还在擦着眼泪。她给我一张卷着的纸："我做了那么多的梦，他给了我那么多的承诺，看看他最后给了我什么。我那天早晨起来就发现这个，卷在他平时喝水的杯子里。"我展





开那张纸，开始读："安娜，我亲爱的，当你读到这张纸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我的声音颤抖起来，我说不出话只默默地读下去，"我想让你知道，我年轻时曾经有很多像你一样的姑娘，我爱她们就像爱你一样。她们也跟我心心相印。你知道我有一个挚爱的梦想，我必须继续去行动了。除此以外我什么都不爱，当你思念我的时候，想想我们曾经的幸福吧。直到我死去，我都会在心里记着你。爱你、吻你的　亚历山大。"

我艰难地读完这张纸条，眼泪掉出来，浸湿字迹了。我们抱在一起，彼此安慰着。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描述当时的感觉，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我的哥哥，可是见了他一面他却又消失了。

我坐在安娜身边，听她讲哥哥从家里被匈牙利宪兵抓走以后的经历。他先做了伐木工人，后来又逃跑了。他逃过边境到了苏联。他相信到那里他们就会张开双臂接受他，因为他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当他到达以后，他受到了刑罚折磨，还被判做苦力。他跟其他一些囚犯一起，站到没至肩膀的冰冷河水里干活，把木材运到河对岸去。跟他一起工作的朋友很困惑地看着他为一个折磨他的党派卖力地干活。他的身体饱受摧残，变得很虚弱，他的同伴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时还那样狂热地追求他的信仰。他被送到布拉格休养，但就是在布拉格他也没有休息。虽然医生禁止他外出，他还是溜出来向人

们作激情洋溢的演说。

在这以后的很多年，每当我和哈娅还有埃利泽见面的时候，我总会谈起跟什洛莫见面的经过，提到我跟他那短短的对话和他忽然的失踪。我觉得很内疚，我是全家人中惟一一个在战后跟他见面的，可是我没能说服他跟我一起回到巴勒斯坦。我认为他逃避再次跟我在布拉格见面也许是因为他的信仰。但是埃利泽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们兄弟俩感情很好，埃利泽深信如果什洛莫还活着的话，就算他远在俄国或者西伯利亚群岛上，他也会给我们送信的。埃利泽在我们到达巴勒斯坦之后找到了我和哈娅，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找寻什洛莫的行踪。埃利泽保存着什洛莫写给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写于1945年6月28日。那时候什洛莫在布拉格，托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士兵带来了这张明信片。

埃利泽一直跟布拉格的一位女士保持联系。他会给她寄一些她急需但在捷克斯洛伐克买不到的药品。那些药我们在以色列也买不到，他因此甚至为她从瑞士或者美国订购，她自然心怀感激。很多年以后他们重新联系上，埃利泽告诉她什洛莫的事情，关于他如何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事情。这位女士的丈夫是位退休的捷克将军，应妻子的请求，他查找了地下室里的一些军事档案。他找到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上面说什洛莫请求从捷克转移到俄国的军队中去，并且于1945年6月28日离



开布拉格去了俄国。在那张明信片上他说，他途中会在穆卡切沃停留，看看家里人是否回来了。几年前，我们去斯洛伐克皮士切尼温泉度假前的两周，埃利泽收到一封来自布拉格那位女士的信，信中说什洛莫最后葬在了斯洛伐克卡洛米尤莰公墓。我们后来发现什洛莫乘坐的列车出发了，但是永远都没有抵达目的地。在战争即将结束的那些日子里，那列火车被遗忘了。我们抵达宾馆以后，打了电话给公墓，请求跟管理公墓的女士见面。我们恳请她延迟时间关门，因为我们可能会迟点到。那个地方是完全陌生的，我们根本不认识路，也不知道那里会是什么样。我们离开旅馆前租了一辆的士，在上面



1959年，丹尼和伊狄特在亚库姆基布兹下象棋。

装满了工具和各种清洗材料。我还在一家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些花、花盆还有蜡烛。我们行驶了不到1个小时，两个斯洛伐克的边境警察从路的两边抄到我们前面，他们问我们要签证，可是我们没有。离开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两个地方之间还有边境，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宾馆里呆一个星期等签证，更别说专程去布拉迪斯拉发签证了。我们必须得赶时间，因此我跟那个年轻的警察谈，而我丈夫泽夫在一边跟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警察争论起来。因为时间紧迫，泽夫没有耐心继续争下去，干脆把我们的护照扔给他们，他们看到我们居然舍得把护照留下，非常惊讶。他说边境在七点就戒严了，如果我们迟了的话必须得在那边过夜了。

我们又开了一段路，这才发现我们做了多么愚蠢的事情。每过一小段路就会有警察来查问身份，而我们居然早早把护照给扔了，看来这个假期得在监狱里度过了。我们不停地催司机快一点。他很紧张，因为他知道他是不是该载我们这两个没有签证的人。但在我们的美元利诱之下，他心甘情愿担这么一点风险。我们的车驶得飞快，终于准时到达了公墓。管理公墓的女士正在门口等我们，我们跟着她来到了她的小办公室，把所有从以色列带来的东西都交给了她。我们很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负责管理公墓，她带我们四处看了看。我们沿着一排高高的栗子树走，看到两边都是望不





到边的十字架。转过一个弯以后，走了一小段路就到了军方墓地。我们带来的东西都是多余的，因为这里很干净，管理得很好，一点都不比以色列的阵亡将士公墓差。

我很伤心地站在哥哥的墓碑前："亚历山大·弗莱德曼， 生于1920年，死于1945年6月。"我们将鲜花放在墓上，并把它们放到十字架顶上去，泽夫把花盆埋到墓两边的地里。负责的姑娘看到我们如此伤心，答应我们说冬天她会把花盆放到她的办公室里防寒，等春天再拿出来，如果我们需要的话她还会经常来察看一下。我们点燃了悼念的蜡烛，站在那里拍了一些照片。这件事也很了不起，因为只有我得到了在哥哥墓前哭泣哀悼的机会。我从各个角度给墓拍照，拍个没完，我们都知道我们再也不会有机会来看什洛莫了，所以很舍不得离开。我在心里跟他说着再见，然后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我转过头去看最后一眼的时候，看到一位身材矮小的弓着腰的女人在整理我们放在墓上的鲜花。她让我想起哥哥年少时的情人安娜。那一瞬间我又觉得她是安娜，我哥哥最热烈也是最后的爱人。我们回到办公室以后，负责的姑娘对我们说我们很幸运，什洛莫乘坐的那趟列车跟另外一列火车相撞，几百个士兵的尸体都撞烂了，难以辨认身份，随后他们都葬在了普通的墓地。什洛莫是能够确定身份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我们非常感

激她。

从布拉格回布达佩斯的路上，我情绪低落。我向哈娅讲述了跟什洛莫见面的经过。我们见面的时候是多么快乐啊，可是结果竟是他不辞而别，还给他的女人留了那样一封信。回来以后我们立即开始准备去巴勒斯坦的阿里亚。我的计划很简单，但运动的领袖另有打算。这一次，又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运动面临着很多艰巨的工作——成千上万的人盼望着阿里亚，而我们这些运动成员必须留下继续工作，等待自己的机会。我和哈娅再次分别了，但这次是主动积极的，我们觉得自己是去完成一项使命。哈娅被派往匈牙利一个省城米实考茨，那里有个犹太社区，但是他们已经被同化了，不会说希伯来语，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也一无所知。我跟一些资历比较老的运动成员一起被派到布达佩斯南部巴卡斯切克瓦一家孤儿院，有些孩子只有单亲，无力抚养他们。战争中这些孩子躲藏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修道院，教堂，还有布达佩斯的一些机构里。我们把他们从这些地方找回来聚到一起，又当爹娘又做老师，解决他们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负责带10个女孩，她们给自己的小组起名叫“家园”。她们的年纪都是12岁左右，我教她们希伯来语。她们觉得这门语言非常难学，于是我给她们唱歌让她们熟悉希伯来语的发音。早晨，我弹起曼陀铃，音乐同时也是她们的起床号。我顺着每一张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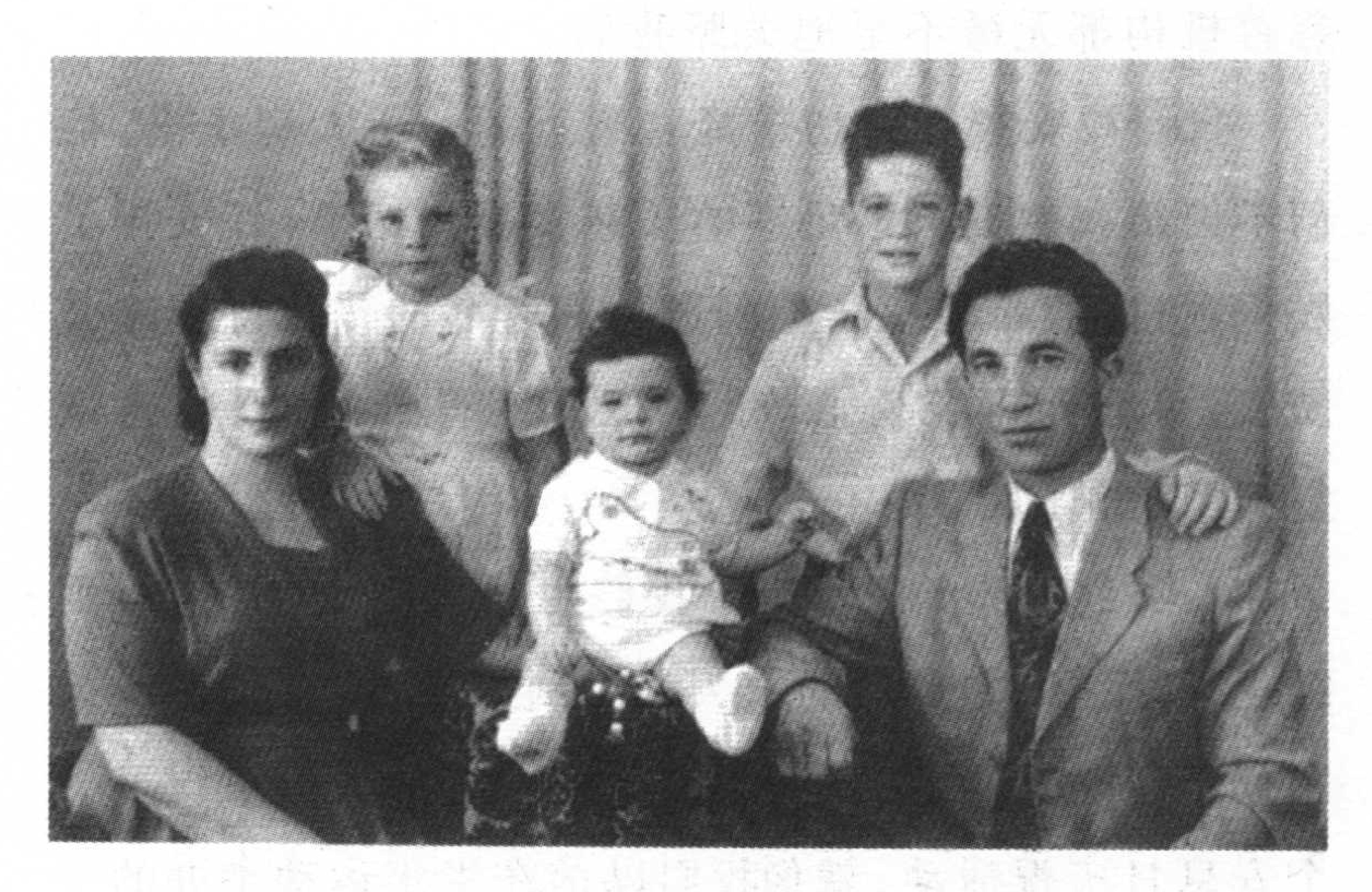


走过去，直到那些女孩子睁开惺忪的睡眼对我微笑。

我们跟孩子们一起等待着阿里亚，准备都是秘密进行的。由于孩子们忽然从学校里面消失容易引人怀疑，我们只能在家里辅导他们，但没有任何课本和书面材料。下课以后，孩子们帮我们一起整理家务，12岁左右的孩子每天从公共食堂给我们带来食物，小一点的孩子就帮忙清理厨房。

最小的孩子只有6岁，是我们的小“宠物”。他非常讨人喜欢。虽然他是个小不点儿，我们都叫他“大比尔”。现在他跟他的妻子居住在耶路撒冷。大比尔有个哥哥叫约瑟夫·奇莱格，我跟他多年来一直有联系，而且因为他妻子的哥哥就住在我们这个基布兹，他也时常来拜访我们。本杰明·哈恩是我们的邻居，经常提醒我一些我已经忘记的事情。

我们就这样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一天晚上，一辆盖着油帆布的卡车终于来接我们了。我们先把孩子们抱上去，然后才爬上去，盖上帆布帘子。我们的目的地是维也纳，在途中我们告诫孩子们不能说话，这样在过边境的时候就不会被发现了。一个小女孩说：“这是多么美好！”另一个孩子说：“多么快乐！”还有人说：“在山岭上。”（这些话都是希伯来语歌中的）。我听到他们说这些话，很为他们的学习成效感到高兴。他们自己不懂得这些单词，所以也就认为别人听到了也不知道他们在



1952 年，哥哥埃利泽和他的家人在海法。

说什么。这次一共有42个孩子，连我在内一男三女负责照顾他们。惟一的男士阿瑞尔掌管财务。我们抵达维也纳，还没重新组织好的时候，阿瑞尔就带着所有的钱到城里去了。几小时以后他回来时，我们没有认出他来，他打扮成了典型的狩猎者，穿了件很高雅的皮夹克。他拿走了他的背包，然后就此消失了。他卷走了我们所有的钱。

在维也纳受到的盛情接待，让我们忘记了身无分文的现实。维也纳之行对我而言是一次美妙的经历，对于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他们觉得那里是伊甸园。我们是第一批到达的犹太幸存孩子，因此受到了格外热情友好的接待。犹太人联合会、圣地联合促进会和其他的一些





慈善机构都无微不至地关照我们。

我们被安置在斯切布隆宫附近的一所大房子里。他们不但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美味食品和糖果，还安排了娱乐项目，我带着孩子们到湖边和著名的普拉特趣味公园去。我过得非常舒心，我的双颊变得红润，身材也恢复到了战前的模样。

人类终要走出伊甸园，我们也得告别维也纳。告别维也纳前往巴勒斯坦的一天终于到来了。离开的前一天刚好是星期五，我们就为帮助我们的好心人们组织了一个安息日庆祝活动。就像我们以前在青年运动举办的一样。在发言致辞以后，孩子们开始了他们的表演。他们朗诵了比亚利克[1]一首诗的一段，还合唱了几首歌曲。站在台上的孩子们不明白自己背的单词是什么意思，很多坐在底下的观众也不懂，因为他们也从未学过希伯来语。尽管如此，表演结束后很多人仍然来跟我握手，为这个感人的夜晚致谢并祝我们旅途愉快。

第二天我们离开了维也纳，向北进入德国，到了一个叫做“安斯巴赫之争吵”的地方，那是安斯巴赫[2]附近一个小村庄。那里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学校，老师都是

---

①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873—1934)，杰出的犹太民族主义诗人，现代希伯来诗歌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希伯来诗歌的伟大代表”。

②德国古城，巴伐利亚州中法兰克行政专区的首府，以城内巴洛克建筑和葡萄酒闻名。

来自圣地的充满了奉献精神的志愿者。放学以后，孩子们照例还是被分成几个小组。我是学校的顾问，同时也负责一群小女孩。在学校所有顾问开会的时候，我说我已经尽力完成了我的任务，得去巴勒斯坦了。让我惊讶的是，事情居然就这么解决了。我跟一群说匈牙利语的年轻人一起迁居以色列。他们都在18岁左右，我比他们大一些，也冒了个险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中有个女孩叫托娃，我到以色列以后一直跟她保持联系，直到她猝然去世。她的男朋友是个红发男孩，叫埃顿。他乘船直接抵达了奈格巴基布兹，还参加了独立战争①。他参战仅几天，就在来回送枪支的在路上牺牲了。他没能好好看看他梦想的国家。

我归心似箭。一天我们爬上了一辆严密封闭的卡车。法国人知道我们的行动，要求我们必须秘密进行。我们在车上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在一个飘雪的寒冬离开了德国。夜里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已经困倦不堪，很快就睡着了。早上醒来，耳边一片鸟鸣，春天温暖的阳光照在我身上。到法国里维埃拉②了，我就像已经到了以色列一样兴奋。我们休息的房子周围有葡

①即第一次中东战争。根据联合国大会181（二）号决议，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成立，翌日便遭到5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战争共历时15个月，以色列扭转了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取得了胜利；但付出了6000人死亡的代价，占当时以色列国人口的百分之一。

②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港市。





萄园，还有果树林，都已经果实累累了。突然听到有人说希伯来语，我们循声而去，发现有一群跟我们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操练。他们摆了一个木瓶子作为靶子，一个精力充沛的卷发年轻人是教练，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我们加入了训练，为以后可能与英国人发生的冲突作准备，因为我们的移民是非法的。一天晚上下着讨厌的雨，我们站成阅兵式方阵，被告知以后如何继续保持秘密行动。我很高兴我们又开始行动了，站在队中时我手里还拿着一本希伯来语书，那是我随身携带的。那个时刻，以及随后的一些事情让我那么地感动，我甚至忘却了以前的一些性命攸关的时刻。很多年以后，约娜，我所在的基布兹的成员，告诉我说因为我手里一直拿着那本书，她觉得我跟那些说匈牙利语的女孩子很不一样。等到夜幕降临后，我们翻过一个陡坡，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跟着前面的人，走下一条狭窄的小径。我们到了拉苏特附近一个秘密集合点。那里是一片海滩，一条小船已经等候多时了。哈加纳[①]买了这条挪威渔船，重新粉刷了一下，在里面放上三层床位，将我们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塞了进去。这条船以前装载过几十个渔民，现在却在里面塞了800个非法移民。我们的船扬

①希伯来语意为防卫队，建立于1920年12月，是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地下军事组织，后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基础。

起了帆。

船上的气味实在难以忍受，几乎所有人都吐了。下海以后这条船更飘摇得像片树叶，大家都晕船。我从小就不呕吐，连生病的时候也不。但是船舱里缺乏空气，令人难以呼吸。我走到外面的甲板上，站在锚边。四周一片漆黑，我听到海浪拍打的声音，我呼吸着带着咸味的空气，黑夜很快过去了，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时光是如何流逝的，但是我看到了黎明渐渐到来的过程。我看到身边一个哈加纳成员倚在缆绳上，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匿名的。他把绳子系在一只桶上，然后打了海水上来，在水中放上一种特殊的肥皂，这样就消除了水里的盐分。我用这样的水洗头洗澡，感觉清爽多了。我跟船上的两家德国犹太人关系很好，他们在战争期间躲避到了英国，如今也辗转到了船上。他们现在住在马皮尔基布兹，哈娅也住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对我说，他们很羡慕我能在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而他们因为晕船已经动弹不得了。

我们的小船在风浪中摇摆，任何微弱的小浪都能让它左摇右晃。一天夜里一架英国人的巡夜飞机飞过上空，他们找的就是我们这样的非法移民船。在这次他们夜里巡逻以后，船上的男子重新油漆了船外部，但是徒劳无功——英国人还是认出了我们。我们航行到第10天





的早晨，船终于靠岸了，我看到了卡梅尔山[1]。金色的阳光洒在山顶上，喜悦的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睛。船上能够站起来的人都开始饱含深情地唱《希望之歌》。

英国人的王牌舰队从我们两侧包抄过来，就像两只螃蟹的钳子。我们曾经在法国里维埃拉操练过的战斗终于开始了。我们把手边的东西向英国兵砸过去，瓶子、易拉罐之类的，有些英国兵被击中了，但是这更激怒了他们。他们对我们施放了催泪弹。当我们手忙脚乱揉着灼痛的眼睛的时候，他们又架起了粗大的水龙头，冷水喷射过来。

①即圣经中的迦密山，希伯来语意为“上帝的葡萄园”。它横亘以色列北部海法市中心，风景十分优美。

第十一章

新的“拘留地”——塞浦路斯①

这场战斗以双方多人负伤而告终，我们这边还有个男孩被打死了，他在船上无亲无故。我们的船被称为“无名非法移民号”。

下船跟英国人面对面以后，他们立即表现得很有绅士风度，彬彬有礼地提出给我们提供热饮和食物，但我们骄傲地拒绝了。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更应该表现自己的尊严——我们唱起了《希望之歌》。他们并没有因此

①第二章注释中已经说明，1939年，巴勒斯坦的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发表《白皮书》，严格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超额移民被一律禁止上岸，并被押送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拘留营。



放弃劝说，因为他们毕竟不想看到我们饿死。有个士兵劝说一位怀抱婴儿的犹太妇女看在孩子的份上喝点东西，但是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转移到英国人的军舰上。人人都十分不情愿，故意拖着步子惹恼他们。男孩子们索性躺在甲板上等着英国士兵来抬他们起来。

船开了，我几乎没有感觉到移动。船头无声地切开波浪，不久就在一块废弃的海滩靠岸了。海滩上空荡荡的，什么植物也没有，也没看见任何港口设施。我们来到了塞浦路斯——这就是我们被“拘留”的地方了。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已经在这里搭建了很大的木屋，跟这里的英国驻军的营房一样。

我们船上大多是年轻人，抵达以后动手搭建了一个新的宿营地。我们一开始便称之为“青年村”，这样年轻人就不会用“集中营”来称呼它了——那个词会引起太多的惨痛回忆。青年村里的生活井然有序，整个宿营地就像一个小国家一样，自成体系，对于一切关于移民的问题都有解决方案，各个政党还选举代表担任不同的职位。青少年失学问题尤其引起了大家的特别关注。

塞浦路斯的生活就这样继续着。我们的宿营地外面安了带倒刺的铁丝网，在我们看来那是哀痛的警示。虽然铁丝网并没有通电，但周围同样布满了碉堡和岗哨，只是武装士兵不是德国人而是英国人而已。被铁丝网和



1972 年，妹妹哈娅和她的家人在马阿皮尔基布兹。

岗哨环绕的生活让我们想起了恐怖的过去，尽管现在看来那昭示的应该是黎明前的一线曙光了。

塞浦路斯有两大宿营地：一个叫做“夏营”，里面的人都住在帐篷里；另一个叫“冬营”，就是我住的这个。我们住的是木房子。两个区之间有座小桥，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桥头站岗。因为我会希伯来语又懂英语，所以被选为两个区之间的通讯员，可以自由地往返于桥的两端。站岗的那个士兵认识我，每次我过桥的时候他就对我微笑，我也回报以灿烂的笑容。有时候，我会把重要的信或者钱藏在浓密的头发里面，夹上发夹，就这样带过桥去。

有一次我走近小桥的时候，发现情况有变——站岗





的士兵换了一个人。我的心因为恐惧狂跳起来，脸上竭尽全力挤出最妩媚的笑容。但他一脸冷漠，连肌肉都没牵动一下，甚至都没正眼看我一眼，就转过身去命令另一个士兵把我带到法马古斯塔附近一座镇上，送到一个女军官家里去。法马古斯塔是塞浦路斯著名的古城。

我“享受”了一次免费的旅行，坐在舒适的轿车里沿街奔驰。我们在一座两层房子前停了下来，士兵押着我走向大门。他敲敲门，我进去后他就留在外面。爬上楼梯以后，我气喘吁吁地站在一个女军官面前。她没有让我坐，而是叫我脱光衣服。我脱下衣服，就穿着文胸和内裤。“脱光，我说的是脱光！”我只好把内衣裤也脱了——她这么想看我裸体就让她看好了。虽然我觉得很尴尬，但我还是挺直了身体站在她面前。“什么都脱掉，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懂吗？”她吼叫起来。我听懂了，完全听懂了。我缓慢地动作着，拖延时间，考虑着她发现我带的东西以后该怎么办。我解开鞋带，脱下鞋子，放在脚边，然后面向她。她又大吼起来，“我说的是什么都脱掉，包括你的袜子！”我没有动，死命地用力把脚钉在地板上。女军官弯下身来，带着厌恶的表情脱下了我的一只袜子，摇了摇，扔到一边。然后她脱下另外一只，那张字条被抖了出来。她捡起来，看了看纸条，让士兵将我带回宿营地。在回去的路上，法马古斯塔的街道和建筑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为自己的失败可能造

成的后果忧心忡忡。后来让我带纸条的人告诉我，他们早就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性，信息都是用密码写的，因此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一个人搬到了夏营，在那里遇到了另外一个基布兹的成员。时值春季，我们住在海边的帐篷里，身上穿的衣服少得不能再少。我们没事可做，每天就在海里游泳。以前我的家乡有条河，我们夏天也常在水中嬉戏，但我不太会游泳。第一次站到大海里时，我看着远方无边无际的海岸线，深感震撼。有时候海面上倒映着天空，有时候掀起几米高的巨浪。开始我在海里害怕得全身发抖，每个浪头打来我都要喝下几大口水，但后来我渐渐也学会了自由自在地游泳。

在塞浦路斯的移民中，有些人非常有天赋，而且从不知疲倦，他们总能找到事情做。有个人名叫杜楚，来自罗马尼亚移民营，他心灵手巧，用一把削笔刀做了一盒象棋。棋盒装了机关，一翻就能打开，而把盒子反过来就是一个棋盘。我的抽屉里至今还收藏着这副象棋，跟撒母耳·卡茨[1]寄来的明信片放在一起。在塞浦路斯时，杜楚还给我们做了很多精美的新年贺卡[2]。此外，他还是个音乐爱好者，会拉小提琴。

---

①撒母耳·卡茨是以色列著名的雕刻家，现在住在加阿同基布兹。——原注

②犹太新年一般在公历9月来临。过新年时，犹太人有互送贺卡的习惯。



我们常常在海边打发时间，一艘英国巡逻艇就停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纯粹是出于无聊，我们决定戏弄一下那些英国兵。有些人潜到巡逻艇底下，抓住船底使劲晃动。英国兵惊恐万状，对天鸣枪——也许还射到了其他地方，他们吓得瞄不准方向了——我们又沿原路游了回来。

有一天，我们听说一些“客人”要来看望我们。这些人将在海滩附近上岸，但他们的身份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暴露的。那天夜里我们集体出去拾柴火，在海滩上点了很大的篝火，然后围着篝火庆祝安息日，表演的节目跟我们以前在学校里和在青年保卫者运动表演的一样，有唱歌的节目，还有一幕哑剧。我们都拼命鼓掌，英国



1968 年，亚库姆全家福。

哨兵的目光就被吸引到这边，甚至不愿离开。这时，哈加纳的船送来一些成员。他们偷偷从海滩上爬过来，混进我们中间。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来组织我们向巴勒斯坦迁移。

第二天早晨，我们说他们是冬营来的足球队，过来打比赛的——这样就不会引起怀疑了，他们成功混到了我们中间。

我对足球从来不感兴趣，但是因为无聊，我们所有人都去观看了足球赛——饱食终日的英国兵对饱受摧残的移民，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两队都不公平。我为我们的队员手心捏了把汗，默默祈祷着。当我看到一开场英国兵就进了一球的时候，我觉得受到了伤害，非常气愤。结局当然也是预料之中的。

在塞浦路斯的日子里，有时我也感到绝望。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问题：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我何时才能通过这“还乡之路”呢？在我们的宿营地，塞浦路斯被称作我们通往家乡的路。

一张布告牌上贴着移民去巴勒斯坦的名单，我时常站到那里仔仔细细反复查看。安排非常合理——第一批到这里来的人也第一批走。我看着名单，发现有个人名被划去了。我甚至没有来得及细想，惟一的念头就是我必须得早点去以色列，于是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划去的名字的地方。然后我跟一个已经轮到去以色列的女人





在一起呆了两天。我想知道她是怎么到塞浦路斯的，幸运的是她很愿意告诉我一切的细节，从她怎么乘船开始一直到现在的经历。我很认真地听她讲，就好像重视考试的学生考前的复习一样。我还问她一些她没有讲到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船上吃什么食物，有多少哈加纳成员跟我们一起。这些问题后来果然都问到了。我费尽心思背下这些细节，还好我都记住了。我知道一切都看我能不能通过这次审核了，每个人都必须证明自己是那批移民的成员才能离开。审核时间大家的内容都很不一样，所以我的那场审核跟其他人都不相同。

每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组织都有它的移民限额，它们的代表都用极力维护自己成员的利益，帮助他们完成“阿里亚”。所有代表集中在一间大帐篷里审核我们。我走进去，他们问我问题，我就用从朋友那里套来的信息回答。“请告诉我们你来的时候天气怎样？”我心想完了，我被问住了。这个问题我可没有想到，但是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回答下去。“我们离开德国的时候天气很冷，然后就开始下雨，或者是雨夹雪……嗯，冰雹，又好像是雪吧。”居然被我猜中了。我通过了审核，简直高兴得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我的兴奋没有持续多久。晚上一个年长的辅导员来看我，请求我把位置让给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她非常希望把孩子生在圣地。我能说不吗？我只能很失望很伤

心地但很心甘情愿地把机会让给了别人。这次等待变得更加漫长，但是实际上来得比我想像的快。

我加入了青年保卫者运动的一个组织，起名叫"五月一日"。后来有些人到了亚苏尔基布兹，其他人去了加阿同基布兹。

终于，我期盼已久的那天来到了。我们登上一艘英国船，经过短暂的航行，抵达海法。从港口出发，我又去了阿提利特[1]，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临时宿营地，是为新移民准备的。有些人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因为整个巴勒斯坦还没有准备好安顿新移民的设施。可我在那里只呆了两天，虽然那里的生活组织得很好，但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去找一个负责人，告诉他我哥哥住在马尼特基布兹，他得知我已经到达的消息，正在等我团聚。他们立即就让我走了，还给了我一个橘子路上吃。在阿提利特我们每天都发一个橘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橘子，以前从没吃过。于是我就挑了个最大的——它带来的激动最终被失望所代替，因为我没料到大橘子的皮通常很厚。

①以色列北部海滨城市。



第十二章

我的祖国——以色列

我乘坐公共汽车从阿提利特去哈代拉[①]，路上经过一个阿拉伯村庄。我平生第一次看见村里的孩子向我们砸石头。在哈代拉，汽车司机陪我找了辆出租车，把我的要求“翻译”给他听，让他带我去马尼特基布兹。刚到以色列时，我说的希伯来语和这里人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我在基布兹入口下了车。走了几分钟路，遇见一个社员。我向他介绍说我是埃利泽的妹妹。他对我很热

①这两个都是以色列北部的海滨城市。



1972 年，哥哥和妹妹——丹尼，伊狄特和卡米特

情，把包往地上一扔，过来为我指点方向。没走几步，我就停下了。“怎么了？”他问道。“你把包扔在路上，要是有人偷了怎么办？”这是我上的基布兹生活第一课——这里根本没有小偷，社员们甚至不知道“小偷”这个概念。我们走近公共食堂，我使劲揉了揉眼睛，确信我不是在做梦。食堂边上放着大袋大袋的橘子，有些橘子掉出来，落在地上。一个社员带我去鸡场，我嫂子帕尼娜在那儿工作。距今的 20 年前，她和她女儿阿达列死于阿拉谷地①的一场车祸。

①在以色列北部，离马尼特约 2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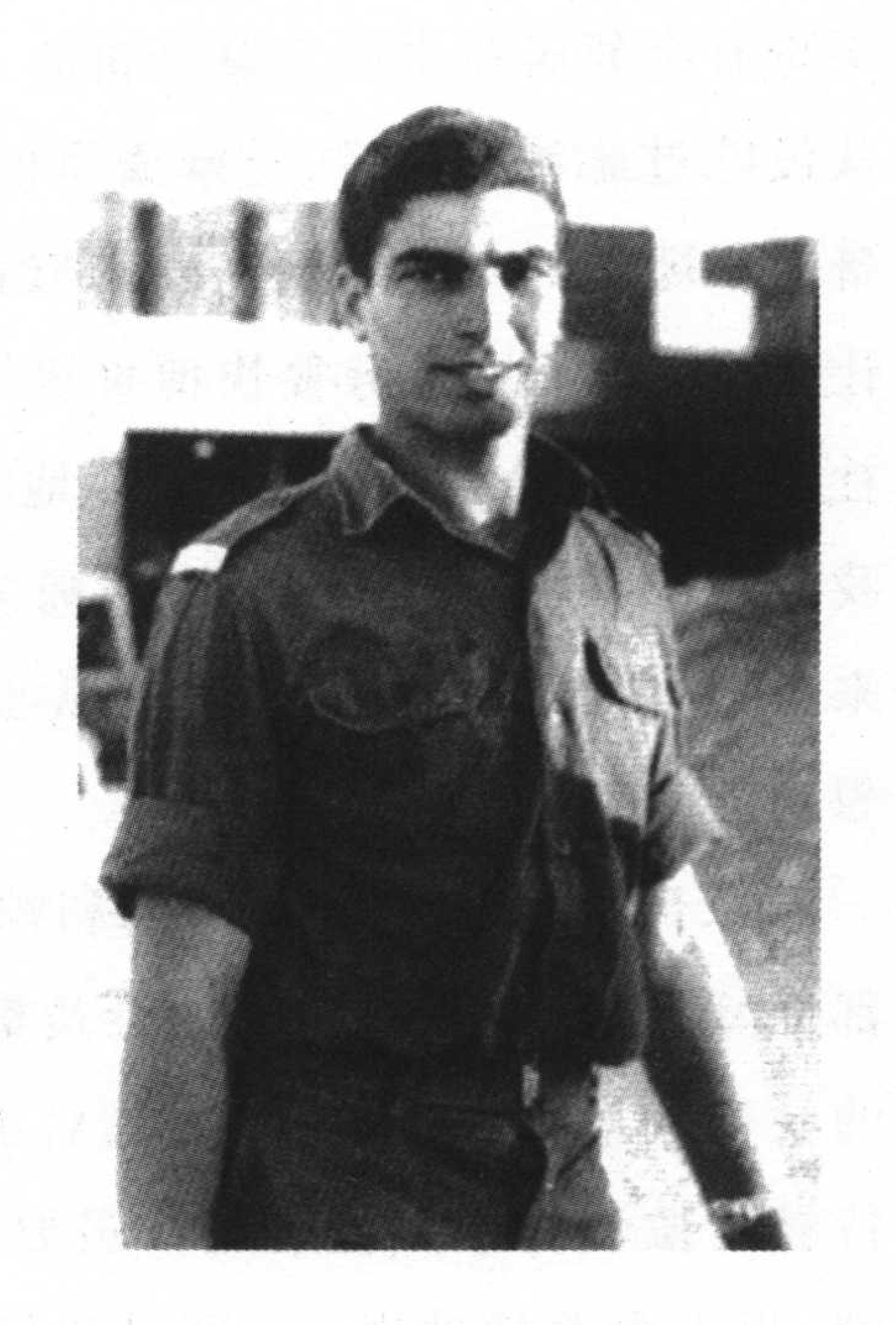


嫂子的头巾包住了薄薄的头发。她看见我，喜不自禁。当我们俩都平静下来以后，她告诉我埃利泽不在家，要到晚上或者深夜才能回来。他只有干完工作才会回家，而每天时间都不一样。我很高兴在他们家住下。

我随帕尼娜去了他们居住的小木屋，她里外张罗着招待我。过了一会儿，埃利泽回来了。那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形势非常紧张，谁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哥哥曾在布拉格学医，后来在帕尔马赫[①]的帮助下到贝鲁特完成了学业。他配有一辆吉普车，还有个司机，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跑，诊断病人，提供急救。那时这里的紧张气氛每天都在增加。

当他晚上回来时，我们终于团聚了。他请我一块儿上桌吃饭。我的眼睛盯着一个大大的绿“鸡蛋”，看着埃利泽把它分成两半。他从里面取出一点绿白相间的东西，熟练地涂在面包上。“吃一点，拉海尔，吃点我们天堂的水果。你肯定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从一开始，这种“水果”就引起了我的怀疑——你能把什么水果涂在面包上呢？我以前吃面包的时候也会同时吃西瓜或葡

①希伯来语PALMACH，是“突击连”一词的缩写。1941年在英国统治当局的默许下建立，准备在德军占领巴勒斯坦后开展游击战争。它可以说是哈加纳的特种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帕尔马赫一度转入地下，官兵隐蔽在农村，一边训练，一边参加劳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中，帕尔马赫部队成了以色列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中坚力量。1949年军队整编中被解散。



1969年，丹尼在军官训练课中。

萄，但用这种不甜也不酸的东西涂在上面不是糟蹋面包吗？这到底是什么水果？过了段时间我才决定尝尝它，鳄梨[①]从此便成为我最喜欢的食物。

除此之外，我还吃过其他各种各样的食物。尽管时局紧张，基布兹生活尤其艰难，但社员们总是欢迎我到他们家去，我很难用言语表达他们的热情程度。虽然是在困难时期，可第一个星期他们一直没让我工作。他们告诉我，我需要休息，还拿出各种各样的食物招待我。

---

①鳄梨是一种椭圆形或梨形水果，果皮坚韧，果肉黄绿色，口感和味道与黄油有些相似。鳄梨在以色列非常流行，人们喜欢把它的果肉涂在面包上吃。





哥哥有个邻居在生产芝麻蜜饼的工厂工作。当他听说我从没吃过这种东西后，芝麻蜜饼便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哥哥的小屋。每个基布兹社员都带给我一种不一样的食物让我尝，嫂子的厨房很快便堆满了这种饼。一天，几个社员邀请我去参观那家工厂。地方不远，我就走去了。我看见一些大桶，芝麻蜜饼在桶里被烘好，从边上掉下来，一群苍蝇在周围乱飞——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不想吃芝麻蜜饼了。

由于紧张的形势，哈加纳和帕尔马赫把基布兹社员都征募走了，这使得工作的社员数量急剧减少。马尼特的社员从早到晚辛勤工作，然后出发保卫基布兹。马尼特被阿拉伯村庄包围着，社员要在基布兹周围站岗放哨。男人拿着枪站岗——那时我们只有几杆枪——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任务是在壕沟间巡逻（那时基布兹之间有壕沟连成的网络），一有情况就向坐镇在基布兹中心食堂的负责人报告。

来到基布兹的第一个晚上，我刚准备睡觉，嫂子把挂在他们家附近的一面铜锣和一根棒槌指给我看。她解释说，危险来临时会有人敲这面锣，这就是警报。如果晚上听到警报声，我们要赶快跑到他们儿子雅亿尔的幼儿园的防空洞里去。我想都没想就对帕尼娜说，颠沛流离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我才不管阿拉伯人呢，他们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我是不会下床逃跑的。

第二天，我深深为自己的话感到羞愧。那是我在基布兹的第一个早晨，我走出房间，看见一队孩子跟着照顾他们的老师排队走路。我很生气：我怎么那么自私，只考虑自己一个人？

白天我在厨房工作，晚上出去站岗。很多社员要求安排他们跟我站一班岗。他们大多数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来的，跟家里其他人失散了。他们想从我这儿听听大屠杀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我必须平静下来，把一切都告诉他们。

一天晚上站岗时，我看见一些黑影，我立刻告诉守卫。他一看见就端起枪，一面要我去食堂报告负责人。我赶快冲进壕沟，全力奔跑。我救下了一群训练回来却没有通知负责人的哈加纳男孩。我把他们从悲剧中救了出来，简直是个奇迹。

我是1948年9月到达以色列的，一来就被推进了独立战争[①]。马尼特靠近一个阿拉伯村庄。一天早上，哥哥在公共澡堂洗澡，我在另一头的女澡堂洗澡，我们突然听见阿拉伯村庄的方向传来枪响。子弹穿破了澡堂的门，哥哥叫我丢掉所有东西，从窗户逃出去，跳进壕沟。

哥哥十分理解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他带我跟他到处走。和他在一起时我很惊讶：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

---

①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年5月正式全面爆发，但在此之前阿犹双方的暴力冲突已经非常激烈。





那么熟悉。他在帕尔马赫的时候走遍了这个国家，尽情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他向我介绍我们经过的每一个犹太定居点的名字，还有邻近的阿拉伯村庄的。我听着，却一点也没记住。我一直非常紧张，只是盯着他的手看。每当我们接近英国警察时，他就把枪藏起来，而当走到阿拉伯村庄时，他又赶忙拔出来。

气氛日益紧张。儿童和他们的母亲被转移到帕德斯汉纳[1]，留下的人则听从安全军官的指挥。基布兹之间通过通讯壕沟连接起来，但壕沟的深度不够掩蔽我们，必须弯下腰行走。

白天我在厨房工作，但那时我们并不生火做饭，只是为前线的将士和站岗的社员做三明治。一天我们正在做三明治，一发炮弹在厨房外爆炸，把墙轰塌了，炸出一个大洞。好在我们在厨房另一端，没人受伤。我们赶紧跑进壕沟。就在这时，另一发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在我身边不远爆炸，把壕沟旁的石头炸得粉碎。所幸这次也没有伤亡，但我的脸、眼睛、鼻孔和头发全被黄色的火药盖住了。

我来到马尼特时，我就知道这只不过是我人生的一个驿站；我将从那里寻找我自己的基布兹。我的理想是从住帐篷开始，白手起家盖一座基布兹。

---

①在以色列北部，离马尼特不到10公里。



今天的拉海尔和泽夫。

虽然离开了马尼特，但我多年来一直和它保持联系。它是我到以色列以后的第一个家。直到今天，我都十分感激马尼特和它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对我这个新来者的欢迎和帮助。每次去哈维瓦[①]讲课，我都设法推掉一两次讲座，赶去马尼特看看我的老朋友。

在鼓励声中，我离开了马尼特。我充满了力量，希望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想找一个社员年龄都和我差不多的基布兹。

---

①在以色列北部离马尼特不远的地方。那里有一座教师进修学校。作者经常去那里为教师讲课。





我来到了哈奥根，这里看起来很适合我，但我后来还是离开了。因为在这里到处听到的都是匈牙利语。我对他们说，谢谢，再见——我来以色列是为了说我们自己的语言。

我还听说在哈代拉有些人想建一个新基布兹，名字暂定为“圣地D号基布兹”。成员中有约娜和梅尔·布鲁斯丁。我对他们有美好的回忆。在塞浦路斯时，我们经常在辅导员会议上见面，后来又乘同一条非法移民船来到巴勒斯坦。约娜邀请我去他们基布兹试着住几天。

我到达巴勒斯坦一年后，来到了亚库姆基布兹。在这里，我遇到了自己的爱人——我亲爱的丈夫泽夫，生命中同甘共苦的伙伴。我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庭，像基布兹内外大多数人一样生活着，品尝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每一天都令人高兴。

当我谈到或者想到亚库姆基布兹的时候，我必须提提汉娜和费斯卡·撒母耳·费斯腾伯格。我到达这里时，费斯卡是基布兹的秘书和建设部主任。他们邀请我到他们的小屋居住。他们有个孩子名叫露希，现在也当奶奶了。而我那时就像他们的大女儿一样。只有多年无家可归的人才能理解这样的感情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多年来我们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只是因为泽夫和我

相濡以沫，我们才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我们惟一的儿子丹尼在赎罪日战争[①]中牺牲了，年仅24岁。听到消息后，我们几乎要晕厥过去，不知道如何聚集力量面对未来。我们的两个女儿和刚刚11个月大就失去了父亲的孙女塔尔是我们继续生活的动力。

我们的孙女塔尔和她母亲奥弗拉住在贝尔谢巴[②]，离我们很远。每个月我们搭基布兹的车去贝尔谢巴看她们。每次我们回来时，都焦急地盼望下一次。我写了不少故事寄给奥弗拉，让她念给塔尔听。塔尔渐渐长大，开始识字了，我就直接给她写信。我写这些信时眼里总是噙满了泪水，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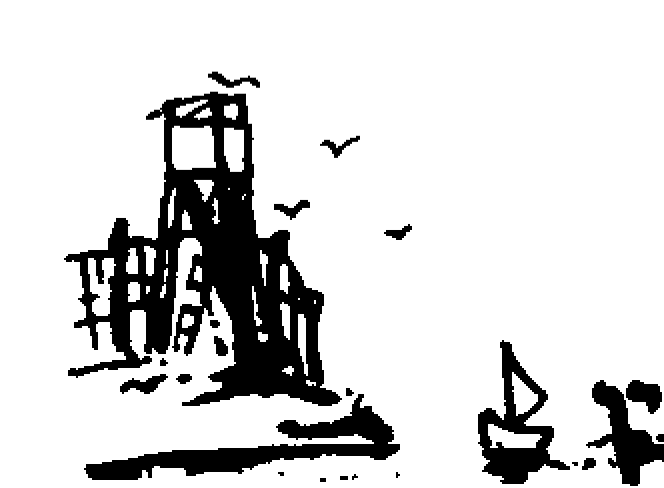
有次回来的路上，我拿出一本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了三行字：

给塔尔：
当她长大，
问起她父亲时。

---

①即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人称斋月战争。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教一年中最重要的赎罪日，以色列全国所有活动都基本停止。埃及和叙利亚在这一天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战争初期取得很大优势。但之后以色列发动反攻，扭转了颓势。到10月下旬停火时，双方基本上打了平手。战争中阿拉伯方死亡20000多人，以色列死亡5000余人。

②圣经中译为“别是巴”，位于以色列南部。





我在本子里写了她从来不认识的父亲。泽夫和我知道，在他们短暂的婚姻中，丹尼从没有向奥弗拉讲述过他的童年。我在本子里写道，丹尼小时候很淘气，但很爱动物。有一次他看到一只受伤的小鸟，便一直照顾它直到它痊愈，然后把它放飞到天空中。我还告诉她丹尼对两个妹妹来说是多好的兄长。我把笔记本给女儿们看，她们都往上面加了自己的东西。我决定等塔尔满18岁时把笔记本给她看。

我们在贝尔谢巴为塔尔庆祝生日时，我把笔记本交给她，她很想知道父亲的一切，我就把本子留给她了。这是她拥有的关于父亲丹尼的一切。那本书实际上是我写作的开始。

塔尔第一个生日前1个月，丹尼在赎罪日战争中牺牲了。他是个军官。当时一发炮弹在一辆装有火药的装甲运兵车旁爆炸，很多士兵受伤了。他跑去救他的士兵，帮助他们疏散，但自己却不幸被打中了。他被授予奖章，嘉奖令送到他的遗孀奥弗拉和女儿塔尔那里。

丹尼热爱周围的人，也热爱自然。他和基布兹紧紧连在一起。孩子们都很喜欢他。有段时间没有女人做幼儿园老师，丹尼便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一任务。在家里，丹尼是可爱的儿子和妹妹亲爱的哥哥。我们的女儿伊狄特小时候把不愿跟我们说的话都跟他说，而对于小女儿卡米特，丹尼就是她的上帝。

有一次丹尼在军队参加工兵课程培训，培训结束之后，他收集了一些樱草带回家，种在基布兹里他家旁边。他牺牲以后我们取了些樱草，种在我们家附近泽夫的雕塑园里。每到冬天，丹尼的樱草就会开花。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父母的记忆刺激着我的写作。当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觉得无法继续写下去时，我就会写一个爱情故事轻松一下。我一共写了17个小故事，由亚龙格兰出版公司出版，书名叫《塔拉兹》。这本书的大多数故事是关于爱情的各个方面的。有两个故事是我个人的：一个是我失踪的哥哥什洛莫；还有一个名叫《基布兹的第一台收音机》，写的是我在这里的生活。

现在，我正在结束下一本也就是第四本书。之后我会休息一段时间。我写的是我自己一生的故事。我选择“地窖里的耳环”作为标题，以纪念我和母亲在家中最后的时刻。

译稿于2003年5月完成于耶路撒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地窖里的耳朵环：在毁灭的世界里成长
作者=（以）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著　　孟振华译
页数=215
SS号=11359732
出版日期=2005年03月第1版